

《炎黄春秋》新春组稿座谈会会场剪影



会场



方实



杜导正



杜润生(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



宋木文(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



张文彬(原国家文物局局长, 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李锐(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朱厚泽(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钟沛璋(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



曾彦修(原人民出版社社长)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李普(中国著名记者)



于光远(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冯征(原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



胡绩伟(原《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

炎黄春秋

专 稿

- 2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 丁龙嘉

春 秋 笔

- 10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 何云华
17 我所知道的建国后制宪修宪经过 于光远
22 南汉宸为我国金融制度奠基 杨培新
27 我参与讨论胡乔木论异化的文章 薛德震

亲 历 记

- 28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 曹治雄
34 空袭中路遇宋美龄 沙 浪
36 我的右派劳改生活 季 音

人 物 志

- 41 易礼容一生不寻常 杨 翊
46 我见到的陈伯达 甘惜分
50 孙大午访问记 周 勃

一 家 言

- 56 甲申再祭 章立凡
58 以史为鉴 继续清除封建专制传统 陆亨俊

怀 念 集

- 62 忆赫洵同志 刘导生

求 实 篇

- 65 再谈项英与皖南事变 李维民 王辅一
68 管文蔚与新四军东进 潘祝平

文 荟 苑

- 70 宋亦英的诗书画 江鲲鹏

古 镜 台

- 74 明朝李东阳暗斗阉党 颜秋桦

编 读 窗

- 78 对《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
一文的补正建议 陈耳东
读者来信摘登

文 配 画

- 80 官员无小节
——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二 陈四益文 丁聪画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周 惠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一鑫
李学勤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宋文茂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钟沛璋 凌 云 曾彦修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李 晨 徐庆全

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底先华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陈 渊

理 事 单 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010)68522852(办公室)

(010)68534879(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 真：(010)68532569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 E-mail 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 价：4.80元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

● 丁龙嘉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73岁的田纪云,不再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74岁的田纪云从第一副委员长的职位上退下来。

自此,这位在中国改革开放25年历史中,担任长达10年副总理、10年副委员长、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年中共中央委员的人物,走下了政坛。然而,他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作为,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入中枢,呕心沥血推进改革

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3月,田纪云出任四川省财政局局长。早在“文革”前,他就任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

“文革”中的重灾区四川,在粉碎“四人帮”后,与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同时,率先进行城市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

这时,省委主要负责人一再指示田纪云和财政局,解决财政困难必须从发展经济入手,广开财源,不能就财政论财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强调财政管理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依靠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田纪云深知,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管理、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从共和国建立以来一直从事财政工作的田纪云,对传统计划经济下财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十分赞成并积极支持省委改革的思路,和财政局的同志们一起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国民收入献策

尽力。他提出“扩大企业财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中,田纪云领导省财政局出台了使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上交利润相挂钩的一些具体政策,使企业有了利润提留权、自筹资金扩大再生产权、多提留固定资产折旧费权、销售部分产品权和计划外生产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等自主权。由于这些政策初步解决了长期以来“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问题,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积极性,企业经营状况迅速好转,省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对亏损企业,田纪云和省财政局提出,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实行定额包干或计划包干、节约分成的办法。这个办法调动了企业扭亏增盈的积极性,效果十分显著。

1979年7月,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喜讯传遍全国、传到北京。国务院副总理兼经委主任康世恩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改革现行的“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对打破“大锅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经委党组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全国工交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田纪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工作如何支持工农业生产和改革。在这次会议上,田纪云的名字从四川开始走向全国。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十年“文革”的大破坏,加之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在指导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所以中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建设面临着财政困难、资金不足的严重问题。1979年国家的财政赤字达到170亿

元,1980年为127亿元。早在1979年4月,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

就在调整经济、启动改革开放的1981年2月20日,田纪云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分管经济工作方面的事情。1983年6月,田纪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同时兼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协助总理处理经济方面的工作,并具体组织改革开放措施的实施。

田纪云刚到国务院,当时的总理就怎样解决财政困难问题给他出了个题目:如何生财、聚财、用财?他经过深思熟虑,很快就上交了一份生财、聚财、用财的意见。此后,田纪云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于1982年初发表了《解决当前财政困难的几点看法》。他认为,要解决财政问题,增加资金积累,最根本的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而当时的有效办法是挖掘企业的潜力。他举例分析说,全国财政收入占工业产值的20%,这个比例大大低于1957年的44%、1965年的33%的水平,如果将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财政收入的比例提高三个百分点,那么国家一年就可以增加150亿元的收入。他指出,要挖掘出这巨大的潜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合理调节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国家、企业同个人的经济利益,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田纪云认为仅仅依靠国家财政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是不够的,应该大胆利用外资,有计划地开发内资。他专门指出有的人关于银行储蓄存款不能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他提议发行适当数量的国债券。这些意见陆续被中央和国务院采纳。

由四川到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所以受到企业的普遍欢迎,很快就在全国推开了。在扩权中,“利润留成”是国家和企业一对一的讨价还价,这样不够规范,加之企业之间苦乐不均,难以形成平等竞争。还有一个问题,按企业隶属关系分配上缴利润,造成条块

分割,使中央和地方不能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源。所以,必须寻求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办法,既使企业间能够平等地竞争,又使中央和地方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于是,就出现了“利改税”,即把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按一定税率上缴税金。自1979年以来,国家就在有关省、市的部分企业和少数几个行业中进行“利改税”的试点,到1981年,全国参加“利改税”试点的工业企业已达456个。试点初步显示了优越性,1981年与1980年相比,这456个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8%,上缴国家税费增长13.6%。

田纪云到国务院工作后,积极推进“利改税”。在进国务院不久的1981年7月13日,他就与人合作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改革税收。其中提出“利用划分税收的办法,替代以划分企业利润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1982年6月,田纪云向国务院领导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财政



1999年3月9日,田纪云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宪法修正案的说明。

体制的建议。他认为 1980 年以来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需要完善。如何完善?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对现有办法加以完善,第二步向“利改税”过渡。对于“利改税”,他说:“这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它既有利于国家利用税收这个经济杠杆,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保证国家财政资金的稳定增长,也有利于真正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贯彻把经济搞活的方针。但由于目前实际存在的价格体系不合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盈利水平过分悬殊等客观因素,全面实行‘利改税’确有困难,可考虑采取过渡性办法,为逐步向‘利改税’过渡创造条件”。

自 1983 年 1 月,按国务院决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第一步“利改税”是“以税代利,税利并存”,即企业上缴 55% 的所得税,剩下的 45% 则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确定企业留多少、上缴国家多少利润。这时有些人心存疑虑。田纪云等著文阐述了“利改税”的优越性:第一,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国营企业的经济责任制,把企业的责、权、利密切结合起来;第二,有利于减少地方、部门由于自身经济利益强加给企业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逐步解决各级对企业因利益划分而形成的所有制观念;第三,有利于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分级财政体制。他同时针对有的人担心国营企业由上缴利润改为交税会改变全民所有制性质的疑问,回答说:“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仅仅是国家积累资金的形式改变,并不会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

1983 年实行一年的第一步“利改税”,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实行“利改税”的工业企业总户数占盈利企业总户数的 88.6%,完成产值比上年增长 9%,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 10.9%。这些企业将增长利润的 61.8% 上缴国家,38.2% 留下。实践表明,第一步“利改税”,既确保了国家的大头,又保证了企业的合理收入,而且初步控制了个人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这时,田纪云针对第一步“利改税”存在的缺陷,不失时机地推动实施第二步“利改税”。他从“利改税”这一政策出发,站在改革的战略思考的高度指出:“我国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尚处在探索阶段,总体改革模式和走什么路子,尚

未完全形成。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要注意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促进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从 1984 年 10 月 1 日起,按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二步“利改税”没有进行到底。

田纪云到国务院后,很多时间是在第一线搞调研。仅 1982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8 日的 29 天中,他率领 12 个人的国务院赴鲁、豫、川调查组就跑遍了山东、河南、四川三省的 5 个地区、15 个县,召开各类座谈会 33 个,走访农户 76 家以及一批商店、学校,还请各地帮助他们对 100 个生产队长和 100 个专业户、重点户进行调查、征求意见。返京后,他们向中央和国务院写出了《关于农村形势问题》、《关于农村商品流通问题》和《关于供销社体制改革问题》等三篇调查报告。至今阅读这些调查报告,还会感到生动的语言、严密的分析、深邃的思想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后来田纪云谈到自己在国务院工作十余年的感受时,伸出两个指头说:“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田纪云在国务院工作期间,走遍了全国的省、市、自治区,至于考察了多少地、县,就难以统计清楚了。

1985 年 9 月 24 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央政治局由 22 人组成。全会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时中央书记处由 11 人组成。56 岁的田纪云进入了中国核心领导层。

田纪云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后,担负的责任更重了。除原来分管的经贸工作外,政治局确定由他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不久后的 12 月 25 日,胡耀邦在召开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确定胡启立主持书记处会议,田纪云协助万里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1986 年 1 月 6 日和 9 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机关干部大会,号召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做全

国的表率。6日这天,在胡耀邦作了《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讲话后,田纪云作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讲话。这是一篇代表他个人观点的讲话。他首先论证了中国“经济形势的主流很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的论断。他引用了老工人的话说:“没有想到经过十年动乱之后,国家能这么快地安定下来;没有想到‘文革’留下的经济的烂摊子,能这么快地被收拾好;没有想到十亿人口的大国,人民生活能提高得这么快。”这三个“没有想到”,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巨大社会变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接着解释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新的不稳定因素解决的情况及发展前景,又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物价和价格改革、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对外开放等情况和看法。他最后讲了对进一步搞好改革的几个问题的认识,鲜明地指出,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正确处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中国在长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忽视价值规律,忽视市场的作用,价格体系很不合理,一是管理太死,价格不能灵活反映市场变化,二是价格结构严重扭曲。中国经济体制一开始改革就呈现出两条主线,一条是价格改革,一条是企业改革。从1979年到1984年9月的价格改革,实行“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方针,以初步改变特别突出的价格扭曲状态,同时试行放开一部分小商品和农副产品价格。

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决定》对价格改革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从1984年10月开始,价格体系改革以放开价格为主,让大部分商品价格在市场中形成,重点是放开大部分农产品和部分主要工业消费价格。这期间,为了稳妥,对工业产品实行了两种价格,计划调拨部分由政府定价,上市部分实行

市场调节。同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双轨价格”中的市场这一轨,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使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双轨价格”也带来了经济秩序的混乱,也为权力与市场的恶性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上出现要求改革“双轨价格”的呼声。

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召开,田纪云依然当选政治局委员。在此后1988年3月产生的新的一届政府中,田纪云仍然是副总理,分管农业、商贸和经济特区等方面的工作。1988年岁初,经过认真思考的田纪云对价格体系改革提出了建议:“我们必须在价格体系改革上有所作为,要千方百计突破这个难点,攻克这个堡垒。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这个问题越拖对改革越不利,越拖越积重难返,其结果只能是推迟改革的进程。”田纪云还提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个观点,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冲破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僵化的机制和思维观念的束缚,逐步将市场机制引进到经济生活中来,逐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为资本主义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说,这也是对中国改革能否成功地到达彼岸的考验。

1988年夏季,中央决定实行价格体系改革“闯关”。但由于种种原因,“闯关”未成,转入治理整顿。

中国农村改革到1984年,一时普遍出现“卖粮难”。当时,中央和国务院对粮食估计过分乐观,认识不够清醒,以致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加之其它原因,1985年粮棉等大宗农产品产量较大幅度下降。

田纪云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后,每年总是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走村串户,与农民交谈,与基层干部座谈,听取他们的呼声和意见。他每年多次主持召开各种形式的农村工作 or 专业工作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田纪云深知农业的关键是粮食,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当时中国粮食的需求量不断增长,但可供数量有限,而且增长后劲不足。他全力以赴抓农业

发展,抓粮食生产,着力抓稳定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努力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同时,发挥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推进农业综合开发。田纪云花费巨大的精力推进农业开发,提出“农业综合开发,一是对现有的中低产田进行改造,提高产出率,二是开发利用新的农业资源”。1988年安排黄淮海平原、三江平原、松辽平原等11片地区为综合开发区。1989年,又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宁夏、内蒙古、海南及黄河口三角洲等9片地区立项进行开发。这些项目,计划四年内改造中低产田近400万公顷,开垦宜农荒地67万多公顷,营造农田防护林网5.33万多公顷,治理草场10万公顷。建成后,将新增粮食近1250万吨,棉花近20万吨,油料50多万吨,糖料1200万吨,肉类30万吨。“七五计划”期间建设的第一批商品粮基地县,1987年和1988年粮食产量比建设前的两年增长近400万吨,而且绝大部分是商品粮。

自1988年到1992年的五年间,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结构逐步调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9%,粮食生产摆脱了一度徘徊局面,连续四年获得丰收。粮食储备增加,增强了以丰补歉的能力。

关键时刻,无私无畏坚持改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严峻的。国内因为人所熟知的那个政治风波,导致了严重的政治、经济损失,国际上受到抵制和制裁。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批判和否定的“左”倾思想又出现某种程度的回潮,他们针对中国的改革发出种种质问,说什么“政治上的自由化来源于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源于农村的家庭承包”“;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企图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些重大决策,扭转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田纪云针锋相对地反复讲这样一个观点“;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

路”,为坚持改革开放鼓与呼。

1989年10月,在讨论为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时,田纪云做了《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发言。他说:“十年来,我们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都是小平同志作的,也是向原来的中央常委汇报请示的,有些重要的措施都是集体研究的。当然由于各人具有的地位不一样,因此责任大小不同。但是,现在回头来看,不能说我们的基本政策,我们的重大措施好像都是出了什么多大问题。我的观点就是,成绩大家都有一份,问题呢,也都有一定的责任,责任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不能够采取下届否定上届,你否定我,我否定你的做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群众根本不信任你。现在在干部思想上,在群众心理上,有许多疑虑。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认真对待。”

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田纪云坦诚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农村的承包决不能动摇,八亿农民如果稳不住,一夜之间就要发生大的问题。企业承包,要采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方针,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完善承包的办法。关于财政承包问题,他说:“逐步地提高两个比例,是完全对的。但是,用什么办法,是从地方现在碗里的东西挖一块给中央呢,还是从今后的增长部分中中央多拿呢,在今后新开辟的财源当中中央多拿呢?这是两种思路,我主张后者。”关于乡镇企业和私营、个体企业问题,他说:“根本问题是如何加强管理问题,引导他们的资金向扩大再生产投入,限制个人的过度消费”“;乡镇企业垮下来,我们也就没有了速度”“;不能把乡镇企业视为私人企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允许适度地发展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方针还应当坚持,不要动摇”。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顶住了“左”倾错误观点,明确宣布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基本政策稳定不变。正由于这样,才安定了农民的心,稳住了农业生产,从而稳住了经济的全局。此后,田纪云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把发展商品经济放在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把依靠科技进步作为振兴农业的战略措

施,把进行的农业开发作为攀登农业新台阶的战略措施,把引导乡镇企业继续健康发展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加强县级工作作为推进农村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全力推动农业发展、农村进步。

“树欲静而风不止”。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围绕在农村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把农民重新纳入集体化的轨道的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有人攻击田纪云是‘新形势下的‘小脚女人’,犯了‘恐合症’”。199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为这场争论作了结论。这个有十大部分四十条的《决定》,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和基本经验,分析了当时农村的形势,明确了90年代深化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任务,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田纪云在全会上作了《关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这篇仅6600字的发言,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三个重大问题:(一)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是稳定大局,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三)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奔向小康、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这个《决定》,使田纪云一直悬着的心落了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不久后发表的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赞扬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

有些同志当时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的情况下,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

21日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后被称为南方谈话。南方谈话传回北京、传到全国,立即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巨大的震动。人们把谈话誉为“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3月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并以谈话精神为指导,全面思考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and 战略部署。田纪云看到南方谈话后,非常兴奋。他在山西,在国家经贸部,在广州,在深圳,畅谈学习南方谈话体会,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他高度评价南方谈话的意义:“小平同志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在关键的时刻,讲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是一个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历史的最强音”。他在讲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一百年都不能改变,谁要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时说,“小平同志为什么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呢”?我理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条路线是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是适合我们的国情、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深受广大人民衷心拥护的路线。只有沿着这条路线走下



1997年11月28日田纪云在福鼎市访问农民家庭

去,我们国家才能发展,国力才能增强,人民生活才能富裕;而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国家才能稳定,才能防止和平演变,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人不拥护,甚至采取各种办法,明的暗的,企图否定和改变这条路线。”他在谈到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告诫时,深有体会地说:“由于‘左’的积习很深,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如果不真正解除“左”的思想束缚,那么就很难长期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1992年4月25日,田纪云应中央党校之邀,作了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著名报告。整篇报告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回顾了80年代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分析了90年代面临的新形势;阐述了如何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指明了在20世纪末中国农村实现“小康”的潜力、路子与保证。当他讲到“简言之,农村的改革使农村得到了‘自主’、‘自由’、‘实惠’。‘自主’、‘自由’、‘实惠’,这是我们农村改革最基本的最实质的东西,也是被农民视作命根子的东西”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他列举了“左”的种种表现后,尖锐地指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不去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在讲到“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时,会场上寂静得几乎能听到一根针落地的声音。这篇报告,为新的思想解放注入了强音符,很快传出党校,传到北京,传到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人大十年,竭尽全力推动依法治国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最主要的功绩之一是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田纪云在十四届一中

全会上再次当选政治局委员。翌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召开,田纪云当选为第一副委员长,乔石当选委员长。五年后,田纪云在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并在第二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第一副委员长,李鹏为委员长。田纪云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除了继续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外,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探索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方面。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加快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目标是在任期内大体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良好的基础。田纪云十分重视立法工作,他认为立法工作还不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他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规范化的经济,既要加快立法的步伐,使立法的进程同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又要注重提高立法的质量,使制定的法律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主张加快立法步伐。如何加快立法?他说,要以改革的精神立法,一是明确立法的指导思想,即立法同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适应;二是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三是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立法程序和经验。他将很大的精力倾注在民主法制建设和推动依法治国上。

田纪云主张人大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加强监督职能。他说,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地区和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贪赃枉法等现象,人民群众对这些问题很有意见,所以,人大要加强执法监督,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对“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

田纪云对许多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开展的对“一府两院”工作的评议、对人大选举或任命的干部的述职评议,给以充分肯定,大力提倡。他称赞浙江省的“两项评议”工作有成效,而且积累了经验。当有的人提出对干部的述职评议与“党管干部”的原则有矛盾时,他反驳说,人大对选举或任命的干部进行述职评议,仅仅是对其执法、勤政等工作表现做出评价,这种评价一般是很全面的,对被评议者是一种鼓励和鞭策,这种反映人民呼声的评议,比纪检部

门、组织部门找干部谈话作用大,而且也为党委正确使用干部提供了一个重要方面的根据。他指出,对人大选举和任命的干部进行监督,是人大监督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人大的监督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他进而指出,监督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主要支柱,它对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是不可少的。1995年12月31日,田纪云在汕头视察工作时,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实施监督权方面把腰杆子再挺硬一点!

1997年11月7日,田纪云在上海市同人大常委会领导人举行座谈,当谈到“两项评议”工作时,他的一段话,入木三分,语惊四座。他说:“现在看,这个评议是成功的。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能够评议国务院的一两个部长,评议你的成绩、你的缺点和提出对你的希望,那影响就不小。评议不等于就要罢免,一般地说都是鞭策多,有些问题是防微杜渐,提出来要你注意。这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应该说这是置公仆于主人的监督之下的一个很重要举措。不然,公仆就离主人太远。有一年,欧洲一个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他们的官员怕议员,议员怕选民。然后问我,你们的官员怕什么?我说,我们的官员怕领导,这样对外说虽然不是很得体,但这是事实。我们的有些官员离人民太远,应该让他们离人民代表近一点嘛。如果我们对有些高级官员真正有点监督,让他们接受点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的监督,就不至于离人民很远,像陈希同,如果有点监督,不至于这样。”

田纪云针对许多人大代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意见说实施监督不够这一情况,坦诚地说:这有思想认识问题,比如在人大工作的同志本身勇气不足,怕得罪人,怕越轨,不敢进行监督;被监督者的承受能力弱,只能听赞扬的话,不能听批评的话,这种积习根深蒂固。也有工作问题,主要是缺乏经验。恐怕还有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而监督问题的根本解决,则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他针对每次代表大会都有不少议案要求制定监督法,诚恳地告诉大家:监督法研究、起草工作从第六届人大即彭真同志任委员长时就着手进行,七届人大万里同志任委员长时也在继续

努力,八届人大乔石同志任委员长也花了不少工夫,但至今仍难出台。从我个人来讲,对制定监督法也作了一些研究和考虑,现在看,在目前条件下,要制定一个名副其实的监督法,也难。

田纪云一再指示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他深刻体会到,加强法制教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缺乏民主法制传统,“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来说,显得更为重要,任务也更为艰巨。

2002年9月,即将离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岗位的田纪云,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畅谈了自己对依法治国的思考。他告诫说:“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的法制建设特别是执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当前,从不少地区的情况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实可堪忧。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将成为空谈。”他回顾了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治”的历史,告诉人们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他一语中的地指出,民主、法制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政治体制问题;当今中国,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而不是治老百姓。

2002年盛夏《中华儿女》刊载了田纪云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文。这篇文章,是田纪云根据自己的亲历、体会,总结中国近25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之作。他科学地概括了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五个抛弃,五个确立”:

抛弃唯意志论和“两个凡是”,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路线;抛弃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确立走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抛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的模式,确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抛弃重“人治”轻“法治”的错误倾向,确立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

研究这“五个抛弃,五个确立”,瞻望未来,我们坚信,中国将在“破”与“立”的改革中继续前进!

(责任编辑 杨继绳)

1984 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

● 何云华



邓小平为深圳题词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发展航程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重温这次历史事件，仍然使人深思，获益不浅。

当年我是新华社深圳特区支社社长，曾经有幸亲历见证了邓小平踏足深圳这块当时被视为是非之地的情景。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虽然历史已经悠远而去，然而留在脑海里的珍贵记忆，却是我的记者生涯中最值得深深缅怀的一页。

（一）

那是发生在 1984 年 1 月 24 日的事情。这天

清晨，我突然接到深圳市委接待办主任张荣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任务，要我在中午 11 点半之前到达迎宾馆待命。电话中我问他是谁来深圳，张荣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到时候会给你们交待任务。我依时到达迎宾馆六号楼，见到《深圳特区报》资深摄影记者江式高已早我抵达。他一面同我打招呼，一面在调校几部照相机。正当我们在猜测哪个中央领导可能来的时候，市委秘书长邹尔康和几位工作人员进来了。随即邹尔康告诉我们说，小平同志和王震、杨尚昆一行将在中午 12 点半左右抵达深圳，要我们一起跟着他们的参观活动。不久《南方日

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李通波，以及深圳电视台记者也来了。

中午 12 时 50 分，一辆白色中型旅行车徐徐驶入迎宾馆，来到桂园小别墅门前停下。当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健步走下车时，早就列队迎候在这里的宾馆工作人员，个个兴奋激动地鼓掌，热情欢迎贵宾们的到来，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周鼎、周溪舞、刘波、罗昌仁等快步迎上前去，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一一介绍他们同邓小平握手，气氛热烈而又简单朴素。

贵宾们步入会客厅以后，邓小平干脆地挥着手对梁湘等人说，你们都先回去休息，下午再来听听你们谈情况。大家走出桂园别墅，市领导乘车离开，工作人员各自散去，别墅顿时清静下来。

庭院中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红艳艳的杜鹃迎风摇曳,仿佛在告诉人们:春天来了。

(二)

1984年的深圳,迎来了特区大规模建设的第五个春天。特区建设者们早就盼望着倡导创办特区的邓小平,能亲自看看这片改革开放热土的一切。而今他们的心愿实现了,他老人家到来的喜讯,宛如温暖的春风吹拂着人们的心田。中午已经见到邓小平的市领导们,个个脸上的表情都在希冀着,能聆听到他老人家的指导,更渴望他老人家能来澄清特区创办四年来的的是是非非。

带领着深圳特区建设这支千军万马队伍的市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一批步入中老年的优秀干部,他们离开了原先的优越工作岗位,肩负着历史使命,来到左祸深重、人心动荡、田园荒芜、百业待兴的边陲之地,面对的是繁重的建设任务,他们不但要克服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物资、缺水、缺电、缺粮等重重困难,还要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那时国内外媒体和某些政经界人士,对深圳的各种非议指责沸沸扬扬,吓人的大帽子像紧箍咒,让人神经紧绷。1983年夏天,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突然登出一篇文章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与此相呼应又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及其失败教训,矛头直指深圳,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有的文章作者甚至危言耸听地告诫人们,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一批批已经退居二线的内地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其中一些人往往带着有色眼光而来,有的人视特区为异端,留下指责和骂名拂袖而去。甚至有的人回到内地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深圳经济特区这个刚刚在南中国大地降生不久的初生婴儿,被这些在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环境下生活惯了的人,看成是不祥的怪婴。

围绕着要不要办特区和办特区是对是错的争论,犹如来势汹汹的强台风向着深圳湾席卷而来。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邓小平脑子里一直装着的大问号,促使他南下广东来看个究竟。1984年元旦过后不久,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

陪同下,于1月24日上午到达广州火车站。在这里迎候中央领导的广东省几位领导,要把客人接去珠海宾馆休息,邓小平不顾旅途疲劳坚持要先去深圳,他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要去看一看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他那坚定的口气和话语中蕴含着对特区这个初生儿寄予深切关爱的急切之情,感染着所有在场的人。深受感动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原广东省省长、中顾委委员刘田夫等,随即和邓小平一行返回车厢陪同着他们一齐来到深圳。

(三)

1984年1月24日下午3时,深圳市领导班子成员和一些部门负责人,齐集到迎宾馆二楼会议室等候着。初春柔和的阳光透过白色的纱帘照进室内,使会场充满着温暖而静蕴的气氛。人们时不时看看表,时间终于到了下午3点30分,邓小平、王震、杨尚昆等来到了会议室。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梁湘把坐在前排的市委常委们逐一介绍给邓小平认识,手里拿着名单的邓小平一个个对号,亲切地询问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原来在哪个单位工作。随后他请梁湘讲一讲深圳的情况。

梁湘指着挂在墙上的深圳地图,介绍特区开发建设规模和办特区前的历史状况,汇报了办特区四年来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干部职工的收入生活现状。他说,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了10倍。邓小平听了后频频点头,这时他点上一支香烟,神态自若地靠着沙发慢慢地吸着烟,继续细心地听着汇报。接着,梁湘谈到特区建设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以及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他对邓小平说:“办特区是您老人家倡议的,是党中央的决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来看看,好让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梁湘请求邓小平给大家讲话。这时邓小平灭掉了手里的烟头微笑着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他的亲切诙谐的话语,使会场顿时轻松活跃起来,与会人员恍然而悟,不约而同地发出会意的笑声。这幽默和笑声,把高层领导者与身处特区建设第一

线的组织指挥者的心连在一起,融汇着相互理解的深厚情谊。这时,杨尚昆插话说:小平同志很关心特区,这次主要是来广东休息,有关问题我们回京后吹个风,让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随即他提议出去走一走。

(四)

如果说梁湘短短 40 多分钟汇报的许多有说服力的数字,开始使邓小平脑子里的大问号变小的话,而当他走出宾馆游览市容,以及此后两天他所到之处耳闻目睹的大量具体事实,更使这位智力超凡、判断精辟的伟大改革家,从中洞察到特区这个时代骄子富有的强大生命力,预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中,她将担当的重要角色。他老人家满怀厚爱,热切地期望她健康成长。

心情轻松愉快的宾主一行齐齐走出会议室,乘上旅行车离开宾馆去游览市容。下午 4 时 50 分,邓小平一行登上建成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来到 22 层的顶楼天台,从东南西北不同方向,眺望初具规模的罗湖新城区,呈现眼前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车流如梭,人流如织,远处的深圳河从新城南面蜿蜒流向深圳湾,望过河那边可以看清香港新界落马洲的村落;回望近处,只见许多正在施工的工地,高耸的机械塔吊伸着长臂不停地转动着。梁湘介绍说,罗湖新城区计划兴建一百多幢高层楼房,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已成为市区最繁华的金融商业中心宝地。邓小平指着西北角马路对面一幢被脚手架和安全网裹罩着的工地问梁湘,那幢楼要建多少层?梁湘回答说,那幢楼叫国际贸易中心大厦,设计要求建 53 层,顶部设有旋转观光圆形大厅,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而且是施工难度最大的建筑工程。邓小平听后满意地点着头。

转眼间已是时近黄昏,渐渐变得灰暗的天空现出一片橙黄色的彩霞。天台上北风劲吹,气温只有九摄氏度,袭人的寒风把旁边工作人员身穿的呢子大衣掀起了衣襟,身上只穿着深灰色普通便服的邓小平,两次挥手推开陪同人员要他穿上的大衣,站在天台上久久凝望着,展现在他眼前的新城区,在夕阳和彩霞映照下,景色绚丽灿烂;

特区建设者用双手和汗水建造起来的一座座高楼,犹如在南国大地上矗起了一个个巨大的令世人瞩目赞扬的“惊叹号”。邓小平目睹这些鼓舞人心的建筑艺术符号,脑子里原有的“大问号”一下被抹掉了。深圳短短四年间奇迹般的变化,激起他老人家的思绪,他对梁湘说,都看清楚了。深沉的眼神里闪亮着兴奋喜悦的表情。

邓小平一行离开天台下楼来到马路边,早在半个小时之前,已有许多市民意外地发现了他们,喜出望外的群众,一直在大楼外面等候着,消息传开后,人群越聚越多,当邓小平一行乘车离开时,满怀崇敬爱戴之情的群众用热烈的掌声夹道欢送。旅行车穿过商店林立的街道,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掀开窗帘凝望窗外,暮色中的罗湖新城,人流熙熙攘攘,一片繁荣兴旺,彻底告别了昔日荒凉萧条衰败的景象。

(五)

25 日上午 10 时,休息一夜后精神奕奕的邓小平,在市领导和随行人员陪同下,来到深圳河畔富甲一方的渔民村。一排排两层高的小洋楼在阳光之下耀眼光辉,使贵宾们眼前一亮。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特意穿上新买的拷花呢大衣,脚踏擦得乌黑发亮的皮鞋,早早就站在村口迎接贵客。邓小平一下车,他便快步走上前去,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久久不放,突如其来的惊喜使他兴奋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了好一阵子才说出“欢迎您,欢迎您”!梁湘提醒他说:你请小平同志到家里坐下来慢慢谈谈吧。吴柏森连声说好好好,兴冲冲地把贵客们领进自己的家里参观。入口大门挂着红灯笼,宽敞的客厅里鲜花怒放,大瓷花瓶插着浓绿的富贵竹,一套高级组合音响安置在客厅一角,长短皮沙发摆在主墙一边,春节前夕迎来贵宾光临,更加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气氛。

吴柏森领着客人走遍楼上楼下,两个客厅各有一台大彩电和其它家用电器,卧室里的家具被褥全是新的,10 多平方米的厨房里,冰箱、洗衣机、煤气炉、电饭煲、热水器一应俱全。邓小平参观完之后来到客厅坐下,他询问了吴柏森的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吴柏森兴奋地说:“我现在生活上什么都不缺了,家里什么都有了,真是连做梦

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些穷苦的渔民,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在村民都说: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不忘邓小平,感谢邓伯伯的好政策。”邓小平纠正说:应当感谢党中央。

吴柏森接着汇报了渔民村的变化。他说:60年代以前我们靠出海捕鱼为生,村民住的是茅棚,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十分贫困,公社化后渔民村也没有什么变化,那时没有资金买不起机械渔船,近海的鱼越来越少,收入越来越差。办特区以后,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使渔民村最先得益,我们利用与香港新界只有一河之隔的优越条件,同港商合作搞来料加工,兴办工厂,开办餐厅、商店和其它服务业,还购买了十多辆泥头车搞土石方运输。几年来渔民村集体经济发展很快,1981年全村户户收入过万元,成为全省第一批万元村;1982年全村由集体统筹建房,每户建一幢两层六房两厅小洋楼,资金由集体负担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由集体先垫付,村民分期付款,不到两年家家都还清了;1983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300元,吴柏森还向客人亮了家底,1983年他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达500多元。坐在邓小平旁边的女儿邓榕怕听力不好的父亲听不清,便大声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哪。

走出客厅,邓小平等来到村里的花坛假山前面,高兴地同吴柏森等村干部一起合影留念。告别渔民村时,邓小平沉思着说:全国农村要达到渔民村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有陪同人员表示异议认为用不了那么长时间,邓小平却坚持说: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至少要到本世纪末,还要再努力奋斗50年时间。后来,邓小平又提出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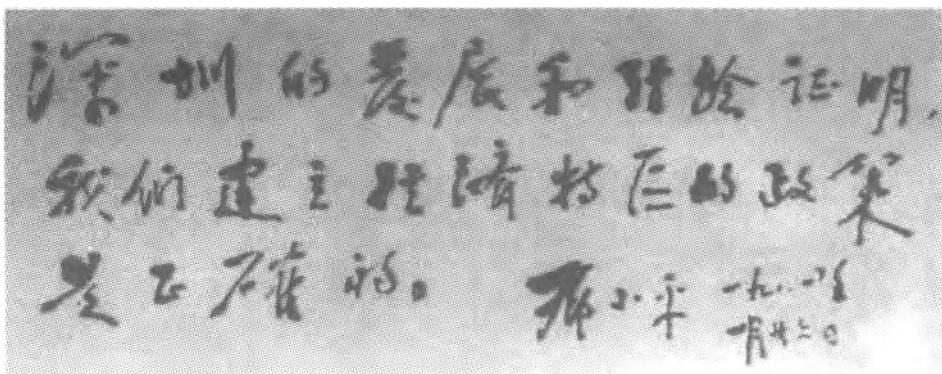
80年代初的中国恐资病流行,还是留恋平均主义,以美化穷光荣、穷革命为时髦的年代。邓小平这些深刻而又富有远见的重要思想,正是医治这种时代病的一剂良方。今天重温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可以启迪激励人们更加奋发努力。20年后的渔民村,与时俱

进,乘上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快车,面貌焕然一新,当年令人羡慕不已的小洋房,而今不见了,原先的城中村被改造后成为闹市中的一个花园式居民社区,重建的设施现代化的11幢小高层楼房,错落有序地矗立在深圳河畔。渔民村这个名字只是记录着昔日辛酸历史的象征,原先的村民现在的生活水平,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内容,都已经升级换代。这里的巨变再一次提醒人们,要牢记邓小平当年提出要再努力奋斗50年的预言,特区之外远在穷乡僻壤的内地农村,这20年里变化了多少?重温这里的历史,人们将更有紧迫的历史使命感。

(六)

一个新兴城市如果没有新兴产业,即使高楼林立,商店再多,灯火再辉煌,也只是一种表面繁荣。深圳从特区创办开始,就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把发展电子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新产业。不到四年的时间深圳办起60多家电子企业,1983年产值已达到2亿多元,占当时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使几年前只能生产铁钉、酱料的深圳,一跃成为广东省电子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基地。

邓小平对深圳的电子工业十分关注。25日下午,他参观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服务公司最早在深圳办的电子厂,几年间这家工厂集中力量开发电脑软件,产品已经打进了港澳市场。邓小平听后高兴地称赞他们的做法,他说,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的人许多都是学生娃娃,中国有那么多学生娃娃,学校重视起来,完全有条件搞电脑软件。今天重温邓小平这些话,对于教育部门考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对于考虑电子行业发展方向的思路,仍



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26日清晨,桂园别墅花香四溢,清风撩人,初春和熙的阳光洒满庭院,格外显得暖和温馨。神清气爽的邓小平步履轻松稳健地同家人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又同家人一起用早餐。工作人员发现,两天来他和家人有说有笑,尤其和孙子们在一起时,兴致特别高。按接待计划,这天的行程将前往蛇口工业区参观一个上午,然后从蛇口前往珠海。

9时30分,邓小平一行驱车来到深圳湾滨海的蛇口工业区。主持创办开拓工业区的闯将袁庚,把贵宾们领到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这里居高临下,背山面海,视野开阔,邓小平看过工业区全景的模型之后走到窗前,他指着蛇口港码头问袁庚,这个码头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靠多少吨位的船?袁庚回答说:1979年春天创办工业区的第一项工程就是移山填海兴建码头。我们花了近一年时间建成了600米的码头泊位,现在已使用快四年了,可停靠5000吨以下的货船,与香港互通的航班客轮,也已营运了两年了。邓小平听后称赞说,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袁庚汇报说,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工业区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办工业区之前,这里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经常有外逃人员被淹死后的浮尸漂上沙滩,这些荒野陈尸大多数是农村的年青

劳动力。自从办特区以后,我们不但制止了外逃风,而且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资金回流。四年多来,蛇口工业区投资兴办的工厂已有46家,产品包括集装箱、铝材、油漆、食品、家用电器、服装等。接着,袁庚重点介绍了工业区实行的体制改革。袁庚说,这几年我们冒了点风险,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实行招聘和合同制,工资实行职务工资加效益挂钩的浮动工资,住房商品化,职工不吃大锅饭,不端铁饭碗,各类干部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律通过考核培训后才上岗,工业区的领导干部不坐铁交椅,从去年开始实行由职工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实行任期责任制,上任满一年还要进行群众信任投票,不超过一半信任票的班子成员要及时更换。

袁庚说,我们还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这时袁庚在犹豫着……他知道邓小平在市里听完汇报后不讲话,也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蛇口工业区一开始就实行官商分开,政企分开,这个做法虽然曾经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蛇口经验、蛇口模式,被媒体广为宣传,扬名全国。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有人就贬责蛇口是个“要钱要命”的地方,想到这些是非争论,他脑子里闪着顾虑,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

继续实践试验。”袁庚这个不给客人出难题的聪明高招,使邓小平和在场的都笑了起来。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等参观了港商独资的华益铝材厂,登上工业区引进国外设备兴建的微波通讯楼,从高处浏览了工业区全景。中午11时30分,主人把贵宾们领到“海上世界”作客就餐。这是一艘由退役的万吨豪华旅游船明华轮改装成的旅游景点。船上设有酒店、宾馆和娱乐服务



邓小平在深圳视察

设施,邓小平兴致很高地参观了船上各项设施,还到总统套房里看了看,然后走上甲板观赏深圳湾海景。

中午12时30分,袁庚陪同贵宾们在顶层中餐厅就餐。餐桌上宾主热烈交谈,话题轻松,王震、杨尚昆等不时发出了笑声。应袁庚的盛情敬酒,邓小平高兴地干了一杯茅台酒,宾主举杯相碰的瞬间,融汇着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与改革开放闯将之间的深厚情谊。

上完最后一道菜,餐厅女经理领着几名服务员也走上前来给邓小平敬酒,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邓小平脸上露着慈祥的笑容端起杯子答谢了她们。袁庚趁机风趣地说:她们都是不大懂事的年轻人,如有不合适的要求,请您不要责怪她们。袁庚的话音未落,几个年轻人拿来了事前准备好的笔墨和宣纸摆上桌面,女经理鼓着勇气走上前去请求邓小平题字。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邓小平高兴地欣然挥毫写下“海上世界”四个苍劲的大字。全场热烈的掌声,像春潮般回荡在平静的深圳湾畔。

(七)

下午两点多钟,邓小平一行登上一艘海军炮艇离开深圳前往珠海。从26日下午到29日上午,邓小平在珠海逗留期间,听取了珠海市领导的汇报,参观了工厂,会见了一批港澳人士。珠海这座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有山有海、繁花似锦的旅游城市,给邓小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离开珠海之际,邓小平应主人的请求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辞,使珠海特区的建设者深受鼓舞。

珠海题辞的消息立即传到了深圳,梁湘等市领导深深感到了压力,他们焦急得坐立不安,都在猜测着、自责着:深圳工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挨批评也好,到底他老人家怎样想?怎样评价深圳?难道一句话都没有?一连串的疑团像兔子钻进了心窝捣鼓得让人难受。梁湘焦急之中打电话向省里求助,询问到的消息说,邓小平29日下午离开珠海回广州,将在广州过春节。深圳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派人到广州请求邓小平给深圳题辞。任务落在接待办主任张荣身上。梁湘对他说,你同省委接待办关系熟,人头也很

珠海经济特区好

邓小平

熟,方便见机行事,我把市领导和全市人民的重担都交给你了,一定要完成这个重任啊。

张荣心里掂量着此行任务的重要性,深知它的难度很大,却二话不说承担了下来。他急匆匆地赶到省委珠海宾馆,先找到杨尚昆说明来意,拜托他安排。杨尚昆要他住下来等候消息,表示会尽快找机会转达深圳市的要求。一天过去了,张荣没有得到回音,第二天仍然没有消息。深圳方面不断来电话催问,张荣的心情十分沉重焦急,两天都睡不好觉,吃不好饭。第三天一大早他再也耐不住又去找杨尚昆,得到的回答仍不十分肯定。杨尚昆说,这几天小平同志回到广州休息后心情很好,今天早饭后是个好机会,他要张荣作好准备。果然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邓小平散步之后,来到会客厅,看了看张荣早就在这里摆好的笔墨和宣纸,亲切地同张荣打招呼。他老人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早已胸有成竹,这时客厅里异常安静,在场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铺在桌面的宣纸上,只见他提起手腕悬肘挥动手中那支蘸满墨汁的毫笔,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25个浓墨遒劲的大字跃然纸上,最后的落款,他特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表明还在深圳时已经有这个评价。张荣机灵地及时用照相机拍下这一历史性的宝贵镜头。在场的人看到题辞都向张荣表示祝贺,让他转达他们对深圳市领导和特区建设者们的敬意。

激动兴奋的张荣如释重负,立即跑去打电话给深圳报喜。接电话的市委秘书长邹尔康逐字记下张荣口述的题辞。一直在盼望消息的市领导纷纷赶到会议室听邹尔康连续重复念了三遍题辞内容,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鼓舞,深刻体会到邓小平对深圳的评价,寄托着一份大海般深沉的厚爱。振奋人心的喜讯,就像乍春季节的一股巨大

暖流,激荡着特区建设者的心。这天正逢春节大年三十,往年的除夕夜市区显得冷清平静,这时却洋溢着异常热闹欢腾的气氛,四面八方传来的爆竹声,经久不息;腾空升起的烟花,喷出五彩光芒,把夜空染得斑斓缤纷,人们欢庆双喜临门的激情,使这片热土释放着无穷的活力。

(八)

邓小平给深圳的题辞,是他老人家此次南行考察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的答案,他澄清视听,力排众议,给深圳作了公正的评价,从而使围绕着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对是错这个长达四年的是非之争,有了旗帜鲜明的结论。深圳、珠海的巨变,使他决心更大,更坚毅果断,他敏锐地把握着当代世界经济脉搏,思考着中国发展战略目标的设计部署。回京后不久,邓小平以超凡的胆识和勇气作出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英明决策,大大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然而,对特区的争议远未结束。邓小平对深圳所作的带结论性的题辞,只是平息了第一场争论,接踵而来的是对市场经济和特区姓“资”姓“社”等问题展开的争论,一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叶持续到90年代初,都在纠缠不休。这期间国内经历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继而是东欧动荡,苏联解体,面临着国际风云剧变的复杂形势,国内“左”的思潮又有抬头,这时从理论界里冒出了所谓“和平演变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的论调,严重干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和改革开放国策的贯彻实施。这就是邓小平给深圳题辞八年之后的猴年(1992年)春天再次南巡视察深圳的重要背景。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老人家的长篇南巡谈话,使长达12年之久的关于特区的争论得到平息,纠正了偏离基本方针的错误倾向。邓小平的谈话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告诫全党要警惕防“左”,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等等,批判了把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和平演变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澄清理论是非。

邓小平两次视察深圳,时间虽然相隔八年,

然而他老人家的思路是连贯的,两次视察对于中国何去何从,对于实现中国发展战略目标,都有着无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1984年的深圳题辞,没有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被推迟,甚至历史要重写。

抚今追昔,时光飞逝,快速的时代步伐,容易使人淡忘历史。今天重温深圳这20多年被许多人陌生了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必然是会珍惜过去,尊重历史,从前人那里吸取养料,总结经验;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同样也会懂得尊重历史,珍惜眼前的一切,在享受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深深缅怀一代伟人邓小平和他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当年冒着风险顶着压力,艰苦奋斗,从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走过来的老一代特区建设者们,在深圳这块土地上洒下的汗水和付出的心血劳动。

(责任编辑 李 晨)

《中华老年光彩人生》(第二卷)

征稿启事

《中华老年光彩人生》大型纪实文库由中国老教授协会、北京五洲华夏文化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编纂,第一卷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回忆录的方式深入反映社会各界老同志难忘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人生感悟等,将作为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留传给子孙后代。第二卷已全面征稿:

● 征稿栏目:难忘经历、峥嵘岁月、美好回忆,献给爱人、怀念父母、纪念朋友、创业历程、老有所为、作品成果,成功经验、康寿之道、人生感悟等。

● 文稿体裁:限人物通讯、回忆录、散文、诗歌及非文字作品的照片等。

● 撰稿要求:作者根据所选栏目,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自拟题目深入描写。内容事迹要求主题鲜明、真实生动、有代表性。篇幅控制在2000字左右,并附100字以内的作者简介。来稿请注明投稿栏目,可附珍贵照片。

● 截稿日期:2004年4月25日。入编者颁发荣誉证书,欢迎参加首发式和出版座谈会。

来稿请寄:北京西客站邮局100055—1041信箱 征文办

邮编:100055 联系人:张先超

电话:(010)66808499 68179369

我所知道的建国后制宪修宪经过

● 于光远

两会即将举行,修改宪法会是这届两会议事日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学术界在这时候,理应多提出一些问题、多写出一些文章,供代表和委员们参加讨论修宪问题时参考。现在的状况是由于种种原因学者们在这方面研究得少,报刊有关修宪的文章发表得也少。

我对宪法——乃至整个法的问题,过去没有给予必要的注意。近几个月才认识到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才开始收集资料,特别对建国以来制宪修宪的情况查阅了一下,做了一些思考。

现在我按时间次序,一部一部宪法来作介绍。

第一部宪法

我说的“第一部宪法”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我的这个说法可能是唯一的,现在写关于宪法文章的人,通常都是把1954年制定的宪法作为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因为用宪法这个名称的,它的确是第一部,也有人把《共同纲领》算作第一部宪法的,但是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合在一起才称之为第一部宪法的我还没有见到过。

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部宪法在三天前已经制定成功,等着这个日子的来临。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根据这部宪法成立的,由此我们可以说建国与制宪同步。

人们对《共同纲领》讲的多,其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共同纲领》。在《组织法》中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

会议全体会议拥有“制定或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本身,除规定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它们的职权外,还规定“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国家”等最高原则。但是没有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没有关于人民自由权利等规定,而这些在《共同纲领》中都有了。所以这两个文件合在一起就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的宪法大纲。因此我在这里就称之为建国后第一部宪法。这是建国开始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应该说是一部很好的宪法。

这部没有宪法名称的宪法,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共同制定的。各党派合作得非常好。从那两个文件本身,就可以看得出这一点。民主党派中也不乏优秀的法学人才。后来被划为大右派直到最后没有平反的罗隆基,在起草这部我称之为建国后的第一部宪法时,他就是作出了贡献的人中的一个。

当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才组成,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的确很好。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就放弃在这以前拥有的职权,一心欢迎全国人大。这就可以证明各民主党派和我们党之间的良好关系。

我手边还保存有一个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干事会印的、题为《关于讨论“唯物主义几个基本特征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试答》的资料,上面记有委员们的意

见,有名有姓的就有章乃器、陈铭枢、凌其峻、千家驹、李相符、章克善、吴觉农、沈志远等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李维汉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且同全国委员们一样积极发言。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合作得很好。在这里我还可以讲一下这样一个情况。有一天,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派他们机关姓朱姓钟的两位专职工作人员到中宣部机关找到了我,要我帮助他们政治学习,要我担任“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的顾问,所以这份《试答》的记录就到了我手里。

第二部宪法

我说的“第二部宪法”指的是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是这一年的9月20日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它是第一部正式使用“宪法”这个名称的宪法。

它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间相隔整五年,在这五年中我国发生的主要变化,是批判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的长期性。这部宪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指出要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对待各种所有制的具体态度是“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且以发展生产合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它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

也是在这部宪法中到处可见使用“依照法律保护……”、“保护合法……”的手段保护一下子还不能消灭的非社会主义财产。如“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国家

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其实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谈不上普选。这第二部宪法的社会基础我以为比第一部狭小许多。

总的说来,这部宪法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相比有某些退步。

关于这部宪法,中国人民大学萧北声写了一篇《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文章中告诉我们1954年宪法制定的过程大体如下: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前夕,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到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的问题。随后在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面时,斯大林提出,“为了驳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和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建设事业”,中国应该尽快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出自中共权威机构之手的《刘少奇年谱》也透露,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在出访苏联前夕曾给斯大林写信,谈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的问题,而且刘到了苏联以后,于10月26、29、30日先后3次打电报将两次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了汇报。在此之前,中共原来是打算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再着手制宪的,但是斯大林既然这么说了,于是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随即是一连串快节奏的“落实”动作,先是在第一时间由中共中央做出尽快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宪的决定,并由主持政协的周恩来在随后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公布中共中央的决定,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接着,在1953年1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出决议,决定当年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宪法。会议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随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选举法就被制订出来并获得通过。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制宪进程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停顿,直到1953年的下半年才又重新启动,不过这次却进入了“快车道”。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从1953年的下半年到1954年夏天,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范围的异常繁难的人口普查、选民登记和基层选举全部完成。相对而言,宪法的起草工作起步则要晚些,1953年底毛泽东率一干秀才组成的起草小组到杭州,算是启动工作,1954年1月才真正开始动手。1月31日就完成初稿,中间经过几次复议之后,到5月1日就可以将宪法草案向全国公布了。实际进度差不多也是如此,只是宪法草案的大讨论被分成了两步,3月底先由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讨论,6月上旬才交由全国人民讨论。据说在3个月的人民宪法大讨论中,有将近1亿5千万人参加,到了这个地步,制宪过程已经有几分像一场颇有声势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讨论过后,1954年9月15日,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产生了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起主持选举工作的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至此,新中国的首次制宪过程全部完成。

萧北声文字是如此,我虽然没有参加1954年宪法的起草工作,但是我是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真实的情况还是能够了解和懂得如何判断。因此那时虽然作了人口普查、选民登记、基层选举、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讨论及据说有将近1亿5千万人参加的“宪法大讨论”,但是我还是以为基本上是走形式的,还不好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所说的“普选”。

第三部宪法

这部宪法是“文化大革命”中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通篇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在序言中就

强调了“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搬出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

在宪法总纲里还写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第三部宪法条文中有一条值得注意的,就是1954年宪法第九十条中关于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条文被删掉了。

第四部宪法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依靠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当然不能容忍“四人帮”在位时制订的那部宪法。于是,在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部新的宪法。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我参加了。那次报告的起草小组由顾明负责,主持起草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的主笔是吴冷西。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情上立了大功,但是他有“两个凡是”的思想,凡是以毛泽东本人的名义说过的话,他就不愿动不敢动。

我是这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且是主席团成员,但是由于我没有参加修改宪法的工作,宪法修改的情况竟完全没有注意。直到最近查阅1978年的宪法,才明白这部宪法是怎么回事。

这时“两个凡是”的思想仍然在作怪,华国锋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在这部宪法中,这个说法依然保留。

毛泽东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搞几次,于是在这部宪法的序言中写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请注意这里的“第一次”三个字。他不敢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只敢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华国锋知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毛泽东提倡的,因此在这部宪法里面,仍然保留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内容,不过从1975年的宪法的序言中搬到了这部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四十五条,文字改成:“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还有这部宪法没有恢复1975年宪法中删去的迁徙自由。我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我不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且在通过这部宪法时我是举了手的。这真不应该。

第五部宪法和它的三个修改案

很特别,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过两部宪法。除了1978年这一届第一次大会这一部外,都还有1982年这一届代表大会的第五次大会通过的宪法。

上面讲过的四部宪法,每一部与另一部相比,都有原则上的不同,因此我们说它们都是“一部”。1982年宪法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同以前的四部宪法比有很大的进步。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修改了三次,这三次修改,都不

算重新制订宪法,因此它们合起来只算一部。

让我们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中的我国所有制的变迁。从1952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是想剥夺和消灭私有财产。从50年代初的三大改造、1958年到60年代初的三面红旗,一直坚决实行压抑打击私有财产的路线方针。1982年宪法,仍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文。整部宪法对私有财产只有一处说到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而这里所写的私有财产指的只是收入储蓄和房屋等生活资料,并没有肯定生产资料可以私有。后来我们国家又逐渐进步,可是1982年宪法在财产条款上一直没有修改。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改革逐步发展,先是突破包产到户这个口子。接着承认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财产制度上不得不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再进一步就是肯定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1982年宪法在1988年4月、1993年3月和1999年3月修改过三次,每次在财产条款上都有某些修改。

1988年对1982年宪法作了两处修改,在宪法第十一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在宪法中第一次出现了私营经济的提法,从只是生活资料前进到生产资料。另外一条修改,是把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就是说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这是和包产到户、大包干联系着的。

1993年宪法的修改是在党的十四大之后,十四大决定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除了在宪法序言中加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之外,在宪法条文中,也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加上了一些条文,

使得多种经济成分都有了规定。这次修改,最重要的是把原来所规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与这个重要修改相适应,宪法对原来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服从和接受国家计划的条文也做了修改,去掉了原来的规定,改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营或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宪法又作了修改,在宪法条文原来第五条基础上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82年宪法,加上它的三次修正案,就是我们现在准备修改的现行宪法。现行宪法应该说的是一部好宪法,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好宪法。但是我认为现行宪法也不是没有缺点。从方才的叙述中,我把事实都讲出来了,现在再归纳一下。我个人现在认为现行宪法的主要缺点,有以下几条,我建议大家多多斟酌一下。

(1)在第一章“总纲”中有这么两点:

第一,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使人得出结论,宪法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财产没有这样的规定,那就是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不平等,因为私有财产并不那么神圣,似乎可以侵犯。

第二,在第十二条当中,没有“合法”和“依照法律规定”的字样,而在第十三条的第一款和第二款都写进去了。

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

在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中,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在这里,没有说宪法是个基本法,把宪法和法律并列。

(2)我们的宪法没有宪法法院的规定,这样就没有更规范的办法保证宪法的实行。

2003年,德国宪法法院庭长恩斯特·本达访问中国,在中国发表了谈话,这些谈话整理成文字出版,作为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系列丛书,题为《法律与全球化》。书中指出:“根据德国的基

本法,宪法的捍卫者是为设立联邦宪法法院。只有通过它的宪法法解释,宪法现实才成为规范力量。很显然,在贯彻宪法及宪法变革的过程中,宪法司法审判体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普通”法规、“普通”的法律制度通过国家予以保障,国家通过司法人员,必要的话通过强制执行或刑事判决来贯彻法规。”但宪法的贯彻则不同。不存在一个位于宪法之上的保障宪法的国家权力。不是国家权力位于宪法之上,而是相反。唯有宪法法院作为国家唯一的宪法机构有权对宪法做出权威性解释,对它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有限的制裁。宪法法院决定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一个有效的宪法司法审判体系可以使宪法从文字转变为现实,避免与基本法相左的现实宪法的形成,从而避免与新法文字规定相左的现实的产生。宪法优先于普通法律只有通过宪法司法体系对宪法的应用才能得以体现。”

(3)没有分清楚法律和纲领的区别。纲领同法律之间的关系,纲领可以用一个字来表明自己的特征,那就是“要”。“要”这样,“要”那样。“要”的结果就是“得到”——客观上出现希望出现的事物。法律也可以用两个字来表明自己的特征,那就是“不许”。“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不许”的结果就是“避免”——客观上不出现不希望出现的事物。纲领对愿意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是鼓舞。法律对犹豫动摇的人是警戒,而对阻碍社会前进的人则是惩罚的手段。

总的说来,我们是向前看,但是也需要向后望一望,记取教训,不做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情。教育那些对推动社会进步犹豫动摇的人明白和坚定起来。对那些阻碍社会前进的人,那就要对他们大喝一句“法律不许”!

宪法作为广义法律中的一种,它与其他法律的共同点都是“不许”,但是又有与其他法律相区别的本身的特点,那就是它“不许”任何机构制定与它有任何抵触的法律。它是最高法,是根本法。我赞同这样的命题:“非法之法【能够否定其他法律的法律】才是法【后面那个‘法’字说的是宪法】。”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即使这次修宪之后有了宪法法院,也不能很好地行使这种职权。

(责任编辑 叶晋)

南汉宸为我国金融制度奠基

● 杨培新

中国人民银行建行以来,曾经换了十几位行长。但是数百万金融工作者最难忘怀的是两位行长。一位是为新中国金融制度奠定基础的首任行长南汉宸,另一位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重建人民银行的李葆华行长。

我曾经担任南汉宸行长的秘书,在他的办公室同室办公,参与他制定政策的活动,他的人格魅力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深刻印象。那是1949年,我从香港《文汇报》返抵北京。南汉宸约我见面,开门见山就提出要我进人民银行。我原打算去上海看许涤新同志,因为那里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但他不容分辩,叫秘书立即把我的行李搬到银行宿舍。不久,又要我担任他的秘书,安置在他的办公室里,让我参与他的会议和谈话,要我为银行起草向上的报告和向下通气的文件,并主编公开发行的《中国金融》和内部刊物《银行月刊》。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南汉宸带我出席会议,见到陈云同志怎样主持会议,并见到许涤新、张执一、薛暮桥、千家驹等同志。为什么他会那么快信任我?据董必武秘书鲁明分析,当时领导南汉宸筹办人民银行的是董必武同志,董考虑到在他领导下我在重庆夺取《商务日报》的表现,嘱咐南汉宸将我吸收到人民银行工作。

南汉宸是我敬佩的革命家,我深为在他身边工作而高兴。

南汉宸幼年家庭贫穷,少年即参加革命。他阅历多次改朝换代,洞明世事,人情练达,历尽沧桑,最后服膺马克思主义。他不容易盲目服从,难于形成个人崇拜;善于独立思考,凡事问个为什

么;他忠于人民,熟知百姓疾苦,豁达大度,择善如流,敢于冒险犯难。

南汉宸对党忠贞不贰,他位居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曾义释刘志丹。他拒不接受蒋介石的升官拉拢,毅然亡命日本。在白色恐怖中,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支持冯玉祥、吉鸿昌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他从事财政金融工作,利用胡宗南封锁边区的部队,为边区运送物资。他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时,“康生抢救失足者”,要逮捕财政厅里曾在国民党地区任过高级职务的干部,要南签字,南说这些人我领导过,了解他们的历史。康生向毛泽东告状,说南右倾。

我到南汉宸身边工作以后,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往事,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是吉鸿昌将军殉难事件。南汉宸在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与他介绍入党的吉鸿昌将军在天津法租界旅馆召集会议,准备在冀东举行大规模的起义。会议以打麻将为掩护。南汉宸是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警觉性极高,身经百战而游刃有余,在国民党统治区如入无人之境。他发现旅馆周围有异常迹象,起身上厕所,借以查看情况。突然一声枪响,南回到房里,见到代替他打牌的同伴已血溅满地,吉鸿昌将军也已负伤。南主张立即隐蔽起来,吉鸿昌却认为法租界内国民党无能为力,遂住进医院治疗。国民党胁迫法租界允许其公开逮捕吉将军并解送北平。南即赴上海,向中央军委周恩来汇报。吉将军后来在北平光荣牺牲。

另一件是南汉宸1941年出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封锁边区,企图困死共产党。毛泽东约时任党中

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南汉宸谈话,提出要南担任边区财政厅厅长,解决边区经济困难,包括穿衣、医疗、电讯等问题。南说:这是无米之炊。毛说: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南就任财政厅厅长后,把边区的特产集中起来。当年辛亥革命时,孙中山要求结交帮会,渗入新军,从而爆发辛亥革命,南汉宸早年参加革命,为动员群众曾参加帮会,广交三教九流,资格很老。此时他到西安,帮会首脑奉之为老前辈。南要他们帮助,把边区特产越过胡宗南的封锁线,运到西安,再买成布匹、药品等必需品,运进边区。帮会动员他们在胡宗南等部队里的官兵,负责搬出和搬进,解决了边区的燃眉之急,从而打破了封锁。

到北京后,南汉宸广交有识之士,他在银行,聘请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为顾问,信任冀朝鼎、宁加风、郑伯彬,成立研究处。各色人等闻风投效。由于他善于用人,这些人出了不少好点子。南的讲话很生动,多讲事实,浅显易懂。我为他起草报告提纲,他常常只选择要点写几个大字,就去报告。例如1950年讲制止通货膨胀,他说这是火车爬八达岭,上去了就是康庄大道。为什么他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后来我才知道他天天记日记。这些日记现在他的儿媳手中,不愿拿出来,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南汉宸在货币稳定、货币制度、金融政策等方面,都有特殊的建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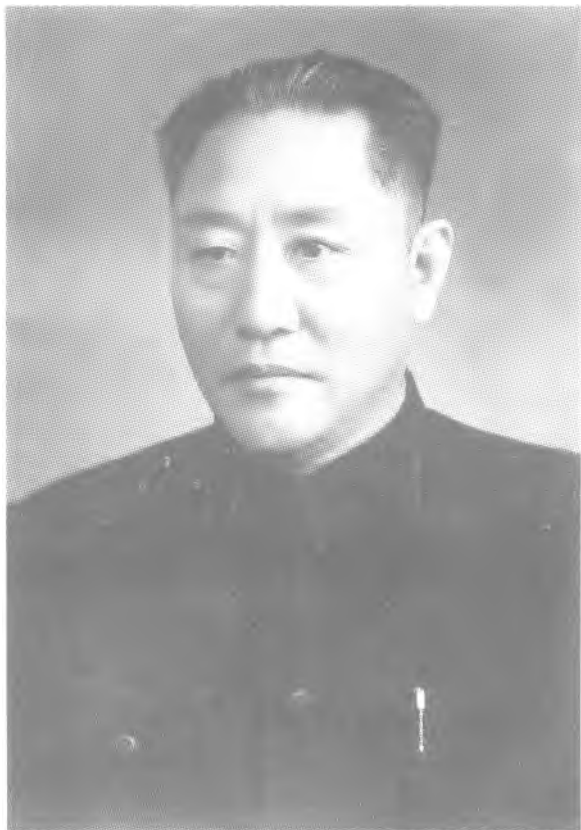
稳定货币三步走

我在香港时,得知南汉宸筹备人民银行,准备发行货币。当时,都以为会仿效苏联货币改革政策,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以旧币换新币,实行差别兑换,例如,用十元旧币换五元新币,乘机剥夺一部分人的货币财富,压缩货币流通量,从而实现货币稳定。但南认为苏联的货币改革政策不可取。中国的货币政策采取了三步走的步骤:

(1)1948年东北、华北、华东等解放区连成一片,冀南、北海、晋西北、东北各银行票子相互渗透。由于各地货币价值不一,规定了不同的兑换比率。这种比率变化使货币流通不畅,直接影响做生意。董必武同志指示南汉宸召集华北各解放区的经济、金融负责人交换意见,大家倾向于

货币统一。当时四野进关,包围平津,解放在即。各路部队都带当地发行的货币兵临城下。平津解放后将面临八种货币进城,这种“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局面,必将引发物价混乱。于是中央决定提前发行人民币,在1948年平津解放前夕,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货币。现在看来,这个决策是很符合实际的。

(2)平津解放后,希冀出现物价稳定的局面。但是大军南下,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陆续解放以后,物价却加剧上涨。1949年发生了四次大涨风。这是因为国民党败逃时破坏交通、掠夺财富,造成民穷财尽的局面。大城市解放后,交通要恢复,工商业要恢复生产,急需大笔投资。当时人民币发行由各大区中央局掌握。每座城市解放后,都要投放大量货币。这些货币便汇到先解放地区购买物资,引起全国物价大涨。事实证明,货币分区发行、分区稳定是不可能的,稳定物价,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统一措施。这就促使中央决定1950年3月采取统一财经工作措施,对财政、商业、银行乃至铁道部门必须统一管理。当时实行的是财政、贸易、铁路等的金库制度。这些部门的



南汉宸

收入各自汇入中央的金库,由中央各部统一开支、下拨款项,实行统收统支。银行资金则由总行统一管理,每一文存款都由总行支配。

“存款往上交,贷款看指标”。财政催收税款,发行公债,多收少支;贸易多售货、少收购;银行以市场利率吸收私人存款,暂停放款,多

存少放。为了把资金汇到中央财政部、贸易部、铁道部,要银行“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即建立发行库,灵活调拨到北京,以便统一支配。银行为此县县建行,并设立发行库。以至银行无人可派,东北银行曹菊如行长把警卫员也派出去当行长。各地的钱,由银行分支机构交给发行库,在当地入库,北京出库,不必增加货币发行量,以利于收支平衡。

银行在统一财经工作、稳定货币中,担负了重要的任务。为此银行学习苏联经验,派员赴东北。由于东北全境解放,中央保留东北货币,由曹菊如任行长,要求东北首先进行和平建设,学习苏联经验。我和赵志诚、杨哲省同志去东北,访问了东北的会计局和东北银行。当时东北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是朱理治、曹菊如和王企之,会计局负责人是李更新,东北银行领导人是王企之。当时东北大企业如鞍钢、本溪等处的大型企业之间的贸易均采用转账付款,由会计局扎账、相互抵消。银行主要是搞现金出纳。当时提出尽量多转账结算,现金限于对私营企业和个人的支付,这部分要编计划,限制数量。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发展国营经济网,限制和缩小私人经济。现金管理很严格,只准留三天的现金开支,以此控制货币发行量,求取物价稳定。东北银行有些人自称“高政委得了斯大林的真传,银行是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人民银行还派胡景云、尚明、韩雷赴苏联学习苏联银行的经验。

当时政务院颁布了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



当时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

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原来各单位有余钱就买些布匹、粮食,尽量把钱花出去,以免贬值。同时要求把各单位和个人的余钱存入人民银行,不准存入私人银行,因此人民银行存款开始猛增。

过去银行只印票子、发票子,似货币发行公司,款子拨给部队或机关后就有去无回,不知去向,银行没有存款。这时银行涌进来大量存款,成了有存款、能放款的名符其实的银行。

由于规定各单位之间不得借贷,必须通过银行转账付款,又由于各单位必须从银行提取现金支付工资和零星开支,国营商业售货所得现金必须当夜解交银行,因此银行也就成为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票子从银行出去,当月回到银行,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上一年达十二次,这就加速了货币回笼的速度,有利于减少货币发行数量。

(3)由于以上措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货币长期稳定。1955年时人民银行以一万兑一的比率收回旧币,换发新币,以扫除自1937年以来将近20年的通货膨胀残迹。我们采取了无差别兑换的办法,并事先广为宣传,要求风平浪静中换发新币。新币分一元、三元、五元、十元,色泽不同,图案不同,印有各民族文字,做买卖、记账都很方便,受到群众的欢迎。我国货币改革三步骤终于完全、圆满实现。

货币政策的“三紧三松”

在这个基础上,银行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节,这就是实行“三紧三松”。当时农村存在着汪洋大海式的农民个体经济,城市有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国营经济主要是国营商业,全社会属于市场经济性质。市场经济中货币主导一切,

没有票子就不能交易。人民银行掌握票子——银根,就牵动着市场的兴衰、物价的涨落。从1950年3月起,人民银行就开始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其间有过三次紧缩、三次放松。

(1)1950年3月统一财经工作,制止通货膨胀,这是第一次紧缩。银行暂停贷款并收回贷款,减少货币投放。没有想到这些措施发生的效力如此之快、如此剧烈,很快物价下落,存货山积,工厂停工,钱庄倒闭,私人银行破产,银楼关门,工商户萧条。总行检视七大城市分行的头寸电报,才发现银行货币发行额已有三分之一回到银行,称为银行的业务库存。过去我们控制货币发行量,增加发行要经中央批准。现在起作用的是银行业务库存之外的市场货币流通量,即货币发行额减去银行业务库存等于市场实际货币流通量。

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召集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决定调整工商业。为了防备增加工商业贷款后工商业的投机死灰复燃、再度哄抬物价,决定由银行贷款国营企业,扩大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收购。这就是所谓“垒墙政策”,让国营商业库存壮大起来成为稳定物价的物质力量。同时以收购农产品支持农民增产,以加工、订货、收购促进私人工商业恢复生产。陈云形象地说:一边是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一边是私人企业,国营贸易身居中间,跑来跑去,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形势。货币经由国营商业投放市场以后,银根开始放松,恢复了工商业的信心和活力,这就是一紧一松。

(2)抗美援朝开始后,我们为防备市场发生剧烈的波动,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当时银行存款主要是国家机关、团体、企业的,因此需要稳定这些公家存款,防止提取。我们采取公家存款保值的办法,安定人心,同时紧缩贷款,待安

定以后再放松。这是第二次紧缩和放松。

(3)“三反”“五反”以后,国家收购减少,工商业信心动摇。为了防止市场停滞,决定由银行贷款工商业,并亲自送贷款上门,使工商业知道共产党仍然需要并支持工商业。这是第三次紧缩和放松。

独立、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

我国革命战争中,把建立根据地作为重要的任务,而根据地又必须发行自己的货币。军队、政权、货币三者密切不可分。江西红色政权,拥有自己发行的货币;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陕甘宁边区先是发行光华商店的辅币,然后发行边币。同时发动货币斗争,把法币排挤出去。皖南事变后,山东先是割断然后排除国民党政府法币,从而实现了我币的独立和稳定。有了独立的货币,才能形成独立市场,并为根据地提供必要时发行货币弥补财政收入的可能。因此,各根据地均重视发行货币和从事货币斗争、驱逐敌币的斗争。

人民币继承我根据地货币的特点,形成独立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

(1)人民币是独立的。在发行之初,即申明人民币不与金银相联系,而以丰富的生活资料供应为保证。人民币的汇率主要依据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而定。

旧中国几千年来以白银为货币。先是以银两为本位,废两改元以后以银元为本位。金银是世界各国通用的货币。发达国家20世纪先后由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英国在中国推销鸦片,造成中国白银外流,形成货币紧缩,引起银贵物贱,使中国的银元价值动荡不定,动摇国本。实行法币制度后,发行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宣传车在街头宣传

纸币,依靠英国收购白银,换成英镑。法币价值以大条银在伦敦的市价为准。英国再将白银转卖给美国。美国为争霸而停止从英国收购白银,中国转而依靠美国,落入美元集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依仗美国贷款,购买美国黄金,运回国内,推行黄金政策,依靠出售黄金现货和黄金储蓄,以缓和法币通货膨胀。1948年“八一九”国民党改发金圆券,借以欺骗群众。因此,旧中国以金银为货币,始终摆脱不了西方的控制,是一种半殖民地性质的货币制度。

苏联的卢布,又是另一番景象。斯大林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强调货币是黄金的符号,并为卢布规定含金量,而且高估卢布的价值,在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汇兑中占尽便宜。其所以强调黄金,是因为苏联盛产黄金,约占世界产量的五分之二。苏联卢布含金量定的很高,远远超过卢布的实际购买力,据此,使东欧各国在汇兑中吃了大亏。人民币没有规定含金量,但货币购买力较高。人民币单位价值高于卢布。斯大林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的单位货币价值高于卢布,当时人民币单位价值却高于卢布。为此斯大林曾亲自过问,向中国提出质问。斯大林逝世后,东欧各国提出卢布定值过高,要求计算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改订汇率,并退赔过去占的便宜。此举连续进行数年之久。

(2)人民币又是我国统一的货币。发行之初,就收回了八种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市场,后来又陆续收兑了新疆和西藏发行的货币。原来保留东北银行货币,以利于首先恢复东北解放区的经济。1950年人民币稳定后,也收回东北货币,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统一。正因此,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东北市场得以保持稳定。

货币统一是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旧中国就是在蒋介石当政以后,也未实现货币统一。山西流通阎锡山的老头票,广东使用陈济棠的毫洋,李宗仁、白崇禧发行广西银行券,更不要说伪满洲国的纸币和台湾的台币了。

银行业务全面发展

人民币稳定以后,银行的信贷业务得到全面

发展。原来农村都是实物交换,马戏团在农村流动演出,观看者要交一个鸡蛋,货币稳定以后交人民币就可以了,这就是货币下乡。南汉宸提出把银行机构伸到农村去,发放农贷,发展信用合作社,打击高利贷,帮助土改后的农民发展生产,防止两极分化。1950年银行县县设行,1952年镇镇设营业所。人民银行贷款支持国营企业迅速发展,执行“垒墙政策”,使物价稳定得到保障,并发挥其收购农产品并转售出去的作用,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支持国营商业进行加工订货收购,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对私营工商业也广泛开展业务。

南汉宸之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银行作为头号反动学术权威挨斗。有一天,忽然听到大街上一阵嘈杂之声。口号声传来,原来喊的是“打倒南汉宸”和污蔑南的夫人王友兰的污秽词句。我是待罪之囚,不能上街去看,揪心不已。南汉宸自1952年发现高血压重症以后,就被迫休养。其后,他抱病出访古巴、日本,历经风险。他已届风烛残年,哪经得起在卡车上长时站立这种喷气式的游斗。

次日就传来南汉宸去世的消息。原来游街一天下来,南汉宸身疲力竭,病体难支。一个老革命家未丧敌手,却要经受这般肉体 and 精神的折磨。南汉宸提笔写信给党中央,陈述自己经受不住,请求党的谅解,服安眠药佐以白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周总理闻讯让王震前去探视。王震拳打脚踢,打开一条血路,发现南汉宸尸体已经僵硬。造反派说这是畏罪自杀。王震说这是蓄意谋杀。

南汉宸的好友王学文同志告诉我,是陈伯达唆使造反派逼死南汉宸,因为陈伯达天津被捕自首的情节,为当时活动在平津一带的南汉宸侦知,并向延安汇报。他害怕南汉宸公开这段事实,就先下手为强,先后逼死南汉宸和王世英。又有人说因为南汉宸、王世英和彭德怀、贺龙等曾联名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使江等人怀恨在心,导致了这一个个悲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南汉宸彻底平反。

(责任编辑 李晨)

我参与讨论胡乔木论异化的文章

薛德震

1984年1月,胡乔木同志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文章发表前,曾在当时中宣部在中南海内的会议室,召开了一个有二三十人参加的讨论会,参加者有胡绳、龚育之、邢贲思、卢志超、韩树英等著名学者、专家。我有幸也应邀参加。

会上大家发表了不少意见,我也发表了意见。我说,今天这是一个党内的会议,而且是个学术、理论讨论会。作为一个党员,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我想讲三点意见。

针对大争论初期有人公然声称马克思主义不能讲人道主义,凡讲人道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把人道主义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因此,我讲的第一点意见是胡乔木同志现在肯定了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一点我是赞成的。但我在习惯上爱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意即这种人道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的。我们讲的这种人道主义,既像社会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艺术学、道德学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一样,在内容上与乔木同志的讲话有相通之处。不过,我对乔木同志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能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说,有点不同意见。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现在我们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包含丰富的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内容的,只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伦理道德的意义,值得商榷和研究。后来我在上海《文汇报》1986年12月12日发表了一篇《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就是对会上这条意见比较系统的发挥和阐述。

第二条意见是针对会上个别人的意见说的。会上有人提出要埋葬“异化”概念,要为“异化”概念举行葬礼。我担心会把这种观点写进乔木同志的文章,所以我在会上说对“异化”概念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这不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几十次、上百次地使用过这个概念,而且因为马克思曾经对这个概念作过明确的界说,你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9卷第49页上查到这段话。当时可能有人不太相信我说的话,当即走出会议室找来马恩全集第49卷,翻开第48—49页赫然写着这样一段话:“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

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因为变成统治人的手段(但只是作为资本本身统治的手段)的商品,实际上只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产过程的产物。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情形。……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这是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过程。”我接着说,退一万步说,即使马、恩一次也没有用过这个概念,马克思也没有对之作过哲学上的定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人们改造自然界,还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种种异化现象。我在会上还列举了一些常见的这种现象。我说,“异化”概念实在是一个充满辩证思维的哲学概念和范畴。是我们非常用得着的一个哲学概念和范畴,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其他概念和范畴一样言简意赅,短短两个字却包含着如此丰富的辩证法内容。你如果埋葬了“异化”概念,不准人们使用这个概念,那么人们还会像马克思那样要用很长一段话来表述这种现象,那是多么的累赘和麻烦。所以我说,千万不能埋葬这个概念,不能为它举行什么葬礼。

第三,这场争论是一场学术上、理论上的争鸣。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国际上争论了几十年。在国内也争论了几十年。在对十年动乱进行理论上的反思、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的时候,周扬同志与一批理论工作者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这仍然属于学术上、理论上的争鸣,千万不要上政治纲,扣政治帽子。

在会上,我就发表了这样三点意见。这些意见是否汇报了乔木同志,乔木同志又是一种什么态度,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对于乔木同志来说,我是一个后生晚辈,在此之前同他毫无直接接触,但是在我担任了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后,我曾多次到他府上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他都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好像并没有因为我对他的文章提过不同意见,而产生任何芥蒂。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

● 曹治雄

1954年初春,我由中央团校调到团中央任胡耀邦的秘书,任职三年半,和他朝夕相处,对胡耀邦同志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原团中央的老同志约我写点怀念耀邦同志的文章,就应承了。执笔过程中,能否完全忠实于当年,尚请知情者批评指正。

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团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建立还只有两三年时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究竟如何开展工作,中共中央给予极大关怀,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同志都做过多次指示。作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当时还没有“第一书记”的称谓。1957年5月召开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团中央才设置第一书记职务,胡耀邦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耀邦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组织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反复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深入学习、讨论,取得共识,因而青年团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了。

工业战线上涌现出了许多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部分城市青年还组织了一支又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远荒僻的农村开荒种地。广大知识青年为响应中共中央“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的号召,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全国工作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团中央于1955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56年3月又在延安召开了陕西、甘肃、山西、内蒙、河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同月,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也在北京举行。几次大会都开得非常成功,耀邦同志全力领导、参加了大会,并作了多次热情洋溢的报告,极大地调动了各行各业的青年团员和青年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耀邦同志作报告有个特点,每次报告都要由他亲

自主持起草,广泛听取意见,一定要把报告写得非常好。1956年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会议,耀邦同志要在会议上发言,向党中央和党代表汇报青年团的工作,他对此非常重视,除了必须由他处理的日常工作外,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起草报告这项工作上。通过他和书记处起草小组成员多次议论研究,集思广益,最后形成初稿。他还不放心,两次亲自带了初稿向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征求意见,又让我去请《人民日报》的邓拓、新华社的吴冷西帮助审改,还请了叶圣陶老先生的儿子叶至善作了文字上的润色,最后送陆定一审定,这才放心了。从起草这份报告的全过程,足可以看出耀邦同志那种对工作“极端负责、聚精会神、深思熟虑、一丝不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严谨工作作风。这个作风贯穿了他的一生。

耀邦同志十分重视对青年的思想工作,十分重视青年团的舆论宣传,经常亲自抓团报、团刊、青少年图书的出版工作。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他每期必看,看得很仔细。1955、1956那两年,他定了一项制度,每周星期日晚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少年报》和中国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都到他住的关东店20号集中,由他亲自主持,或研究、或讨论、或广泛议论报刊、出版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找出工作中的缺点和毛病,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以便提高报刊书籍的质量,使之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耀邦同志常常发表一些新颖的、有独到见解的、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对他们做好工作很有帮助,思想上也受到很大启发。

深入群众 热爱青年

耀邦同志喜欢接近群众,喜欢到群众中去。由于这一时期他担负的主要是青年团和青年工作,所以接近

更多的是青年群众。

1955年冬,他出差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安徽等五省市,除了听取团委领导汇报工作外,必定召开团员、青年座谈会,直接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在上海座谈时,还特意邀请了一位青年女企业家(姓陶,名字忘了)、上海市青联委员参加,了解这一群体的青年人的状况和他们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每到一地,各级团委的干部和团员、青年们,都希望能听到胡书记的报告,耀邦同志都答应了。在南京、上海、杭州、南昌、合肥五个城市,都组织了少则千多人,多则两三千人的青年群众大会。耀邦同志的报告历来生动活泼,鼓动性强,青年人非常爱听,每次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安徽,耀邦同志专门去了梅山水库工地,看望那里的数千青年建设者,应邀在工地大礼堂作报告。挤满了大礼堂的听众,不只是青年工人,几乎全体水库建设者都来了。在偏僻的山区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他们还是第一次哩。

这次华东之行最重要的一项日程,就是到江西看望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这年10月,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了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江西德安县鄱阳湖畔,成立了“共青社”,进行开荒生产。耀邦同志从南昌乘火车出发,到达德安时已近黄昏,下车后直奔“共青社”跟社员们见面,耀邦同志鼓励队员们说:“现在中国还很贫穷、落后,我们前进的路上还横着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穷。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下决心闯过这两条‘大河’,也一定能闯过这两条‘大河’。”应垦荒队员们的要求,耀邦同志用山竹夹着棉花当毛笔,蘸着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直到皓月当空、银光洒满原野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向队员们道别。

1956年夏季,耀邦同志出差东北,主要是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去看望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途经沈阳、长春、延吉、哈尔滨等地时,每到一地,都要向当地团员、青年们作报告,然后从哈尔滨奔赴萝北县。萝北县位于黑龙江东段南岸,交通不便。先乘火车,中途换乘铁路上自用的平板车,再改乘大卡车,次日下午才到达萝北县。在萝北停留三天期间,耀邦同志跟垦荒队员们进行了座谈,询问了他们劳动、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到地里参观了他们耕地、播种,亲自为他们拍照。队员们受到很大鼓舞,纷纷表示要在萝北安家落户,一定要将北大荒建成“北大仓”(粮仓)。

1955、1956两年中,北京许多高校团委请耀邦同志

去做报告,耀邦同志都答应了。可是我们当秘书的心里很明白,他根本不可能分出那么多时间,到那么多大学去做报告,因此多次提醒他。可他总说,这两年同工农青年有接触,跟知识青年、尤其是大学生,接触少了些。这些大学生将来都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啊,青年团应当更多地关心和爱护他们,引导他们健康地成长。耀邦同志那种热爱青年,尊重知识,渴望人才,爱惜人才的心情,也感染、教育了我们这些年轻的青年工作者。

上个世纪80年代,从电视屏幕上可以经常看到胡耀邦总书记坐着面包车,走遍全国老少边穷地区,在炕头上,在饭桌边,在帐篷里,在田头地角……向群众嘘寒问暖、同他们倾心交谈的情景,联想到我在50年代接触到的那些往事,他被称为“人民的公仆”“大地的儿子”,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博览群书 好求甚解

耀邦同志喜欢读书,我早有所闻;而对他好求甚解的习惯,却是当秘书以后才知道的。

那是1952年秋,我在中央团校工作时,校部请了中宣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同志来给学员上大课。顺便写一笔,那时请中央高级领导同志给学员上课并不难,团校就先后请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讲法制建设问题,邓颖超同志讲《婚姻法》(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叶圣陶先生讲语法修辞,等等。当周扬同志讲到青年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应当多多读书、勤奋学习、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时,他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

耀邦同志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总是反复学习的。他的书架上放有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5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新翻译出版的《列宁全集》开始面世,他就叮嘱我务必及时买全。因此每出版一卷,我就立即去书店购买交给他,他拿到手就立即学习,买一卷就读一卷,决不拖延耽搁。第二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也是出一卷就买一卷,买一卷他就读一卷,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读。

他爱读文史书籍,买不到二十四史,就托人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借来一套解放前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二

十五史》,放在手头抽空就来读。其他的书,只要他认为是值得一读的书,都要千方百计的买来或借来阅读。50年代前期,中国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为配合印度尼赫鲁总理、印尼苏加诺总统先后对中国访问,出版部门翻译出版了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苏加诺著《苏加诺文集》,耀邦同志囑买了这两部书,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它们阅读完了。

1955年国庆节前后,香港出版了唐人的著作《金陵春梦》。此书当时在内地的一般书店里买不到,只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流传。耀邦同志自己借了一套来,这套总计160多万字的大部头,他也就是用了个把星期晚上的时间把它看完了。

耀邦同志看书,总喜欢对其内容琢磨研究,形成自己的见解,有时堪称独特的见解和心得。而每有会意,便欣然同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论一番,这也是他读书的一个习惯。

他说《列宁全集》中既有大部头著作,也有中短篇。而数量占相当多的是那些书信、电报、摘记、批示、命令等等。这些文献内容简短,语言犀利,往往涉及革命斗争中的重大问题,行文是“急就章”风格,本人未作多的修改,也没有经过别人加工,保留了“原始”风貌。这部分不能小看,它反映了十月革命期间,在那样紧张激烈、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列宁是如何领导党和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而《斯大林全集》里的文章,一般都写得很漂亮,文字有华彩,逻辑

也严密,看得出来是经过“秀才”加工的。

耀邦同志往往能从读书所得中,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他自己的看法和创见。记得他读完《印度的发现》一书后,发表感想说,印度原来完全是英国殖民地,中国是半殖民地;印度1947年独立,新中国1949年诞生;印度的面积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但可耕地的面积比中国大很多,人口却比中国少一些;它现在有5万公里铁路,500万纱锭;而“蒋委员长”留给我们的只有2万公里多一点的铁路,纱锭也比印度少,是民族工业家留下来的。美国的面积比中国略小,但根据列宁的调查,美国在20世纪头十年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国铁路的总长度已达20万公里。而中国现有的人口已大大超过美国,我们至少该有30万公里铁路才够用。所以我们得抓紧多修铁路,若干年后,比如到1980年,最晚到2000年,我国的铁路达到20万公里时,那我们的许许多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他还说,纺织业是关系民生的大事,也应该加速发展,使全国人民不光“足食”,还要“丰衣”嘛!

耀邦同志读书还有一个习惯,即如本节标题所示,“好求甚解”。读书时碰到搞不清楚的问题,他一定要搞清楚;不大明白的事理,他一定要弄明白;不大懂的关节处,他一定要“打通”。在学习上他从不拿“架子”,而是“不耻下问”,绝不强不知以为知。

1954年,团中央召开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少数大区

团委和省市团委书记参加,共约十来人。耀邦同志请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来讲话。邓老在讲话中说到治理黄河、淮河等水利建设问题,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



1956年,胡耀邦同志(前排右二)出差东北期间,和工作人员在黑龙江畔合影。后排右一为曹治雄

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手中，把黄、淮治理好。否则，他引用一句古语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耀邦同志问我：“邓老刚才讲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我回答：意思懂得，是谁说的，出自何书，都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他叮咛道。我在团中央图书资料室没有查着。到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来，答案见《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我回来立即向他汇报，他有点惊诧地说：“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产生的年代当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古老，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历史年代了！”他不胜感慨地说：一定要照邓老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这年，印度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访问结束前夕，毛主席在新侨饭店为他举行送别宴会。耀邦同志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小条，上面记着“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他告诉我：“毛主席在致词中讲：‘中国有位古人说过’，往下就是这句话，谁讲的他没指明，你晓得不？”我答：“是南朝梁·江淹《别赋》中的文句。不过，这里的‘暗’应为‘黯’，‘消魂’应写作‘销魂’。”啊，对了，就是“江郎才尽”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此时，耀邦同志简直就像中学生解答了一道什么难题那样，得到了莫大的乐趣。

耀邦同志学历不高，只在少年时代上过两年初中，不满15岁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可以静下来安心读书的时间恐怕很少。然而，他毕生勤奋好学，锲而不舍，见缝插针，孜孜不倦，且“好求甚解”、“不耻下问”，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成为一个具有渊博学识和很高文化素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生活简朴 不求闻达

耀邦同志生活简朴，在有关日常生活问题上，他从未无所求，完全听凭组织上、机关行政部门以及家里（指穿衣服）的安排。1954年我开始任秘书时，团中央书记处的九位书记，除廖承志、王宗槐和荣高棠外，其余六人都住在大甜水井胡同1号。这是一所有四进四合院

结构的大宅第，房屋都很旧，也没装修过。第一进三间正房是耀邦同志的办公室兼会客室、会议室，他的卧室在办公室的西头，面积狭窄，光线阴暗，地面泛潮。大半截为卧室，除了床柜别无长物，小半截隔成卫生间。总之条件相当差，一家老小更不可能住在一起。

大甜水井开了个小灶。书记们和办公室副主任黄天祥、书记处秘书余世光两位，以及稍后调来的《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张黎群，都在这里集体用餐。湖南人喜欢吃辣椒，但多数人不爱吃，耀邦同志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从未提出过另做点辣椒的特殊要求。

1955年，团中央决定耀邦和胡克实两位书记及余世光同志迁往关东店胡同“文革”中改为富强胡同，沿用至今）20号。关东店20号也是几进的四合院，但房屋较好，比原来宽敞，因此耀邦同志全家人才住在一起。按规定给他配了厨师，家里单独开火，一家人可团圆吃饭了。夫人李昭同志依旧如“大甜水井时期”一样，只是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赶着上班去了。耀邦同志有时陪母亲、岳母两位老太太吃饭，有时单独用餐，用托盘搁在办公桌或茶几上，边看书报边吃饭。逢年过节必定和家人吃团圆饭。零食呢？我见到的他只喜欢吃点葵花籽儿。警卫员李汉平熟知他这个习惯，总是按时买了给他准备着，但也有买不到的时候。

至于穿着，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未曾见他买过或做过新衣服。外出开会、出差、会见稀客和接待外宾，穿的都是那套旧的深色哔叽中山装，冬天外出时加件外套，这些衣服大概都还是从川北带来的。

耀邦同志和其他许多老革命一样，从来是手不沾钱。团中央每年的预算，由主管书记审核，交耀邦同志钤印，由我代他盖章后，上报财政部。至于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财务处的同志送到关东店来，由我代为签收，李昭同志也将她的工资的三分之二交我，一并入账保管。一应家用开支，都从我这里取钱。耀邦同志从来不过问这方面的事儿，他的衣袋里从来不装钞票，只带香烟。他的烟瘾很重，一天一包，有损他的身体健康，听说晚年戒了。

至于“行”，耀邦同志当然配有专用小轿车。不过他来团中央使用的第一辆专车，是从前任冯文彬同志那里移交过来的一辆美造“别克”，而冯也是接用的旧车，只是加了层油漆，又使用了四年时间，到耀邦同志这里，这辆专车之旧的程度，可想而知了。这跟时下有的地方镇党委书记出门坐的是进口丰田，村支部书记也要坐桑塔纳，简直是天壤之别。



胡耀邦同志为黑龙江萝北县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拍摄的照片

1954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向耀邦同志赠送了一辆吉姆牌小卧车,他这才更换了座车。

耀邦同志工作繁重,思维紧张,极少有“放松”的时候。他会下象棋,如有适当对手,偶尔对奕一盘。他也会玩麻将,只在两种情况之下才可能来几圈。一是节假日老朋友相聚,二是中央开会期间,他的一些老战友,如陶铸、曾希圣、张平化等约齐到关东店看望他时,往往就摆摆“方阵”,尽兴而返。一次,我们引用列宁的教导“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这句话连动员带撺掇说动了耀邦同志,同意到颐和园去逛逛。耀邦同志这一去啊,还真被颐和园内美丽的山光水色吸引了。他兴致很高,还给我们陪同人员拍了照片。回来他说,玩这么一趟,还真消除了疲劳,精神爽快多啦。我们为之高兴,认为往后动员他的理由更充分了。但后来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陶然亭公园,一次是北海公园。我当秘书期间,耀邦同志逛公园就这么三次。平时,我也没有见过他和李昭同志逛过商店。

1954年夏季,中央办公厅安排耀邦同志去北戴河休假,我陪同去了。住下后,听说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同志也来休假,住在不远的另一幢别墅里。因为工会和青年团都是群众团体,在工作方面有不少“共同语言”,于是耀邦同志就常去找刘宁一同志,议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加上处理公务和读书,十来天的休息,实际上他一天也没休成。

1956年9月中下旬,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耀邦同

志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开始时每次散会回家,都是喜形于色。可是到会议后期,进门后什么也不说,表情严肃,似乎有些心事。进办公室后,就伏在案上写,写完后亲自抄好,装进公文包,第二天去开会时一起带走。大会闭幕后公布了新选举的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耀邦同志当选中央委员,我们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依然表情严肃,心事重重地说:“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的将军,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只是候补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几次信,请求无论如何不能安排我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中委就足够了。但没有被采纳,我心情很难平静啊!”后来还听他说过,当选候补中委的邓拓同志,事先也向中央、毛主席写了“请辞报告”,但中央也没有同意。耀邦同志对邓拓同志一向很是尊敬和佩服,说他是既有才气又很有才干、为人正派的优秀人才。他给邓拓写信时,总称之为“邓大师”。

尊重人 团结人 爱护人 关心人

给耀邦同志当秘书三年多,就我所听到和见到的,突出的感觉是,他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待人坦诚、宽和、豁达大度,从不计个人恩怨,善于团结人。

1955年华东之行,在南昌向团员、青年作报告时,耀邦同志对台下一两千青年人说:“有同志问我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我可以告诉同志们:我是在家乡浏阳入的团,那时刚15岁,觉悟不高,懂得的革命道理很少,比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差多了。后来到江西苏区,正式参加红军,开始时,也只在墙上写标语、口号。而你们的邵省长(邵式平时任江西省长)早已担任领导工作了。”总之,不论是在千百人的大场合,还是在少数人

中间,他总是由衷地而不是虚假地称道人家。真是“平生不解藏人善”咧!

耀邦同志胸无城府,谦逊宽和,因此他有许多朋友,有的堪称挚友。据我观察,他们之间,既有战友之情,也有私交之谊。1955年和1956年,耀邦同志先后出差华东和东北数省,所到之处,分别看望了江渭清、陈丕显、江华、邵式平、曾希圣、黄火青、赵林、朱德海、欧阳钦等许多老同志,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当地的基本情况。同样,一些地方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时,都要来看望耀邦,来得最多的是陶铸。

迁到关东店20号以后,耀邦同志的办公室兼会客室的面积减少了,我的办公室倒是扩大了很多,这样他到我办公室就来得较多了:打电话,布置工作,安排日程,询问一些事情,等等。团中央机关一些部室的负责同志来,有时候耀邦同志也在这儿听取汇报,同他们研究工作。

我的工作不繁重,时间也较宽裕。我原本也爱读书,因此处理完工作后,就读了些书。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我读了些有关这方面的理论著作,心有所得,就写了篇《什么是自由》的文章《中国青年报》给发表了。接着,应《读书月报》约稿,又写了篇学习法共中央委员罗歇·加罗蒂的一部著作的读后感,在该刊发表。还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过几篇学习鲁迅风格写的杂文。青年报刊登载的几篇耀邦同志都看了。他鼓励我说:“文章写得还可以,有时间练练笔也好嘛!”总之,凡属于读书、学习、增长知识、充实和提高自己的举动,耀邦同志从不加阻拦,相反他还会营造一种宽松的气氛,鼓励青年人用功学习,发奋读书,求知。

这里要叙述一段家事:1955年,我母亲从长沙来到北京,被安排住在关东店1号院内。1号距离20号约30来米。我告诉母亲:那头住了两位湖南老太太(指耀邦同志的母亲和岳母),又热情又和气。不久,两位老太太也知道我母亲来了,欢迎我母亲去坐坐、聊聊。这样,三位湖南老乡相聚了,叙乡情、拉家常,很快就变得亲热、熟悉了,有时,周末晚上还一同到团中央礼堂去看电影。耀邦、李昭同志后来也认识我母亲,对我母亲给予关心和照顾。1958年、1959年我下放劳动期间,逢年过节,李昭同志还派人给我母亲送来肉菜食物等。其时我母亲已迁离关东店,住到团中央另一处家属大院了。对于一位孤身老太太,耀邦、李昭同志这种关心、照顾,真是雪中送炭啊!

1957年以后,我调离耀邦同志身边,先是下放劳

动,后分配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61年我参加编辑一套《中国历史小故事》丛书,出版后,请吴晗教授写了篇书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大教授为小朋友写书评,不但为社会读者所瞩目,也引起耀邦同志关注。他传话让我去“聊聊”,我如约到了关东店。他说我们送他的样书他看了,也看了吴副市长的书评。他还说:“给中小學生普及历史知识很有必要,你们的书也编得很好。”最后还说:“你做编辑工作我看是能胜任的,努力干吧。”这是对我的勉励、关怀,也是对我的要求、鞭策。

在“五七干校”的两次相遇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中央被定性“修透了”,第一书记胡耀邦被诬为“三反分子”。1969年开办“五七干校”,把以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的十来位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及各直属单位共一千多人,“一锅端”到了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耀邦同志被编入团中央机关一连,我们出版社是七连。两地约一公里距离。因此长时间我没见过耀邦同志。只听说他秋收打场时,同其他“五七战士”一样,扛着装满稻谷的麻袋包入库,我想他那瘦小的个儿,又是五十多岁的人,能扛得动吗,会不会压坏了!?但是有人说:“他干得挺像样儿、干得挺欢哩。”

干校里有一阵“解放”领导干部,原团中央各书记轮流下连队听取“革命群众”意见。一日,耀邦同志来到七连,偶然间我们在路边相遇,互道寒暄后,他问我母亲来干校没有,我答来了,他又问住在哪里,我告诉了他。后来母亲告诉我,耀邦同志特意去看过她,还问了她和周师母好,也问了“周同志好”!周师母是出版社资深老编辑周振甫的夫人,大家习惯称她周师母。“周同志”当然是指周振甫了。

对周振甫耀邦同志是知道的。1953年,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合并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胡耀邦被推举为董事会首席常务董事(邵力子等任常务董事),所以他知道周振甫其人。有时提到,尊称为周先生,在“五七干校”自然不便这样称呼了。

耀邦同志逝世已15年了。这位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奋斗不息、鞠躬尽瘁,将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集合于一身的当代中国伟人,借用太史公一句赞语:“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责任编辑 方惶)

空袭中路遇宋美龄

● 沙 浪

宋美龄已经作古。这位世纪风流人物，史书给她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近几年来，我在电影、电视中看过扮演的宋美龄，我不能说表演者不优秀，但她们塑造的宋美龄形象，也许受这样、那样的局限，无论是形似、神似，我总感觉不像或者不太像，这也许是我对艺术的苛求。

最近看到一条讯息，有人要拍一部宋美龄的电影。由此，唤回了我的记忆。

在我叙述这段往事之前，我必须回顾一下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

据《重庆大事记》1939年5月记载：

5月3日，日本飞机26架以密集队形空袭重庆，我飞机起飞迎敌。日机侵入市区，投弹1000多枚，陕西街、大梁子、仓坪街、左营街等地均被炸起火，居民伤亡近1000人。

5月4日，日机27架再度空袭市区。市区发

生大火，都邮街、柴家巷尽毁，居民死2000多人，伤3300多人。

3、4两日，市区房屋被毁1200多栋，驻渝英、法、德使馆均无幸免，人员亦有伤亡。我的记忆中，当时外国使馆、教堂房顶上为防日机轰炸，都铺着该国巨幅国旗，以示第三国。

5月3、4日，仅这两天日机对重庆市区的狂轰滥炸，几千人的鲜血流淌成河，漫天大火烧焦了湛蓝的长空！山城重庆啊，千百年来，日夜依偎身旁的涛涛长江和美丽如画的嘉陵江也被日本法西斯的残暴激怒了！

“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

“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

“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

这是重庆市民和滚滚大江的同一首歌，同仇敌忾！

1938年9月下旬，我们战时儿童保育会一百多名师生，从保卫大武汉的战火中乘民生公司轮船辗转宜昌、万县到达重庆，编入重庆临时保育院，住在朝天门临江半坡上一座叫万寿宫的小庙里。

5月3日下午警报解除后，街上大火还在冲天地燃烧着，院长、老师们带着我们，撤离万寿宫，紧急向外疏散。那时保育院难童年龄最大的约十三四岁，还有更小的。从万寿宫出发时，老师们领着走，我们的老师也多是流亡学生及自愿者。前一年暑假我小学毕业，在这个大家庭里我算是个大孩子。出发时，我原在队伍的后头，上了大街，有一边街的房屋大火还在燃烧，我们冲撞在长长的狼烟迷漫的街道上。那时重庆街道不宽，但逃难的人群和救护队、救火车混流，一些倒塌在马路上的墙壁和燃烧着的木头、家具又不时地横在路上。直到现在我也不完全记得清我们这



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和歌乐山保育院的孩子们

个非常弱小的队伍,老师们是怎样将我们拖带出火海的!但我记得逃难的人群中好些我们不认识的大人,不顾自己的安危,帮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奔跑。

大约过了几个小时,才到两路口。这里马路宽了一点,脱离了狼烟蔽天的街区,路上来往的人、车仍然很多,由于我们保育院的孩子都是穿着一色的青布衣裤,特别好认。到两路口时,我已从队伍的后头,跑到了队伍的前头,站在了老师的身旁,等待后面的同学上来。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从城外迎面缓慢开来,车子突然在我们的左前方,距我们很近的路旁停下。谁知,下车的是宋美龄,跟着她下车的还有洋人端纳。宋美龄身着深蓝色西服裙装,快步向我们走来。即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我们是重庆儿童保育院的。”老师答。

宋又问:“你们到哪里去?”

“我们去歌乐山保育院。”老师又答。

宋美龄环顾前后,果断地对老师说:“你们停下不要走了,等我……”

只见她立即转身到马路中间,伸开双臂拦住了一辆卡车,车子一停,她步履矫健地登上汽车踏板,手扶车门,大声对司机说:“我是蒋夫人,请你把我的孩子送到歌乐山去。”

我们几个同学也跟着到了车前,她对司机说的这句话我们听得特别清楚。

司机立马下车,打开后车箱,帮着宋美龄和老师扶着我们快捷上车。很快车子满载着我们向歌乐山驰去。时间已近傍晚,后头的师生也都乘车陆续到达歌乐山,直到深夜我们才吃饭睡去。

这个夜晚,重庆市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中,无家可归的人不计其数。宋美龄和歌乐山保育院长曹孟君和老师们也是一个不眠之夜。过后听老师们讲,宋美龄送走了难童,她的车子又向城内



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于汉口成立

被炸中心开去了。

从两路口到歌乐山,究竟有多少公里,要走多少山路、黑路、险路?如果只凭我们这群孩子徒步行走,将有多少艰险!

写到这里,我想补充一个情节:战时儿童保育会是1938年4月由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邓颖超、沈兹九、刘清扬、唐国桢、杜君慧、安娥、季洪等在大武汉保卫战中,鉴于许多流亡儿童流浪街头,在汉口发起成立的,宋美龄被推选为战时儿童保育会会长。

从此,成千上万的流浪儿童,从各个战区被儿童保育会接收后,运到后方转送各个学校上学。记得1938年圣诞节前夕,宋美龄来到万寿宫,还带来了好几大篓橘子赠送全院师生。还有一次视察保育院时,宋美龄和陈纪彝等走进庙里,在我们的地铺上,翻开垫在地上的稻草查看是厚、是薄,对院长、老师也有不少嘱托。

宋美龄的难童情结,我们那时并不理解,在上中学以后,有的同学与当地学生打架难解难分时,老师忠告我们,你们(保育生)在学校上学、吃饭、穿衣,一切费用,是宋美龄和妇女运动的领袖们募捐来的,来之不易!

我们年龄虽然不大,但战争中苦难的经历已经不少。几次见到宋美龄,她的美貌、智慧、端庄,还有她那特有的气质和典雅的风度,在我们小小的心灵里留下难忘的印象。(责任编辑 李晨)

我的右派劳改生活

● 季 音

从1958年到1961年,我在渤海湾边的一个国营农场里,度过了两年半苦涩的岁月。尽管历史已经翻过近半个世纪,但这段沉重的往事,至今未能忘却。

—

人们通常都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视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发端的,但到1958年并未停止。根据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仍继续大抓右派,一直延续到1958年,斗争规模比1957年毫不逊色,当时称为“反右补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是在1958年被“补”进右派行列的。

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又抓出了包括副总编辑黄操良(已自杀)、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骑等一批右派分子。我这个驻上海的记者,也名列其中。



1949年4月,随解放军突击队抢渡长江的三个战地记者在江边合影。中为季音

1958年深秋,我凄惶地离开北京,和青年作家蓝翎等一起被送往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思想。车站上凄凄清清,我的弟弟谷斯涌赶来为我送行,带来了亲人的一丝温暖。

柏各庄农场是在一大片盐碱荒滩上新开辟的一个规模很大的国营农场,我和蓝翎等几个同行者,被分配到农场的三分场,农场工人都是附近各县的青年农民。先后来到三分场的右派共有28人,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们都很淳朴,对我们这些老右毫不歧视,甚至还多少有些同情,在劳动中对我们十分照顾,使我很快消除了走入一个新环境的陌生感。

我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从小没有干过农活,虽说在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也种过菜,担过水,劳动量毕竟是轻微的。而农场则大不一样,那里主要种水稻,又是在盐碱地上大面积的种植,劳动量很大、很累。干了一天活,傍晚回宿舍,人就如同瘫了一样,倒在铺上不能动弹,连饭也不想吃。农场干部看我们实在不行,就把一些体

弱的人调去干轻活,比如稻子割完后让我们在后边拾散落在地上的稻穗。这在农村是妇女儿童干的活,看起来轻松,实则不然,整天弯着腰干活,一天下来,腰仿佛断了似的痛,只能一拐一拐地勉强走向回农场。我不但干活不熟练,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干活动作缓慢,这也让我吃了苦头。一次,队上的干部把我们带到一片新割的稻田里拾稻穗,他说今天拾稻穗要开展一个竞赛,一人一大块,看谁拾得又快又好。在农场劳动期间,谁不想力争在竞赛中获优胜?这可是关系改造前途的。于是,人们都争着往前赶。有一个同伴拾得最快,简直像小跑似的往前冲,把大伙远远甩在

后边,拾的稻穗堆起一大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向前追,腰酸痛得好像要断了似的,也不敢伸一下。可是这样依然赶不上,眼看距离越拉越大,被远远地甩到了后边。同伴中多数人已经把自己那块地的稻穗拾完了,站在地头擦汗休息,我还呼哧呼哧地在那里拾个不停,足足比他们晚了好几分钟才算拾完,走到地头,人都不能动弹了。队长走来逐块检查验收。我原以为冠军肯定属于那个拾得最快、手脚麻利的同伴。不料队长指出,那个最先拾完稻穗的人,快固然快可是拾得不干净,地里丢下了不少稻穗,光图快不顾质量,不能表扬,还要受批评。我拾的这块地,慢是慢了些,但拾得干净,没发现丢弃的稻穗,因此免于批评。这使我如释重负。

我们这些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来到农场以后,一些重头农活实在拿不起来,比如挖排水渠、割稻、插秧等等,怎么也赶不上那些年轻力壮的农工。有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农场的菜园劳动。在局外人看起来,在菜园里侍弄那些白菜、西红柿之类,是最轻松不过的了。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在菜园里劳动,一要懂技术,心灵手巧;二要有长时间蹲在地上不伸腰的功夫。这两者我都不及格。尤其是那“蹲功”不过硬,把我弄得狼狈不堪。我在地里干活,蹲上半个小时,腰就痛得支持不住,只好站起来喘口气,伸伸腰。如此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去,自己看看也实在不像样。带我们劳动的菜把式是个好人,他看着我这副模样,只是叹了口气,并不批评我。和我一起劳动的右派同伴里,有几个都是自小在农村长大,干过农活,既有久蹲不起的功夫,干活又麻利,我只能自愧不如。

二

说实在的,从事体力劳动固然累乏,但是倒头睡上一大觉,第二天体力也就恢复了。像我这种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人,在劳动中体会人



作者去农场劳改前与母亲合影

生,改造自己的思想,多少还是有些自觉性的。在农场里最折磨人的,是没完没了的所谓思想改造。

分工管理我们的干部在会上说:“你们到农场来是改造思想的,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罪行必须心服口服。”他给我们规定了几条制度,一个星期开几次学习会,汇报思想,月末要作改造小结,到年底写改造总结;要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反改造的言行要展开毫不容情的斗争。这样,干了一天活,已经劳累不堪,工人们都呼呼地睡了,我们还经常得硬撑着开会,尽管眼皮子打架,也

不敢打瞌睡。后来,为了开会方便,干脆把右派集中起来住在一起。

分到三分场的28个右派,大体上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来自各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民日报》、《中苏友好报》等单位。还有一部分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人数较多,其中很有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陈企霞,因《电影的锣鼓》一文而获罪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斐,著名作家与记者萧乾,另外还有《文艺报》的几个负责人杨犁、唐因、唐达成等。看来《文艺报》的头头几乎一锅端了。我在和他们接触中,感到这些人都是令人敬爱的好同志。钟惦斐贫寒出身,小时曾以拾垃圾为生,后来发奋自学成材,抗战初期就去了延安,曾任鲁艺教员。他写得一手好字,农场的大标语都让他写。唐达成温文尔雅,为人随和,谈起文学来滔滔不绝,仿佛忘掉了身在农场。其他如《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因,《文艺报》党支部书记杨犁等,都才气横溢,各有特长,皆深深吸引了我。

我到三分场,第一个认识的右派是《中苏友好报》的总编辑廖经天,他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来调到《中苏友好报》任总编辑,他们单位共送来三个右派,据说罪名都是反苏。在反右派斗争中,在“反苏”这顶吓人的大帽

子下,不知道有多少人罹难,其实他们只是说了一些完全符合实情的对“老大哥”的看法,这些话现在看来,只不过触及“老大哥”种种弊端的一点点皮毛,而在当时却成了弥天大罪。廖经天因为与我相识,背地里问我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我简要地告诉了他,他听了长叹一声:“真是不可思议!”廖经天是个入党很早的老同志,抗日战争年代一直在晋察冀等敌后根据地做新闻工作,矮矮的个子,团团的脸,一副忠厚相,看起来年龄比我大很多。对这样一个老同志,就因为这么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就开除党籍,送到这盐碱荒滩上劳动改造,这不同样是“不可思议”么?

在农场待的日子长了,渐渐听说了同伴间不少底细,有些事听了,真让人不可思议。在我们的同伴中有个最年轻的妇女,她姓姜,年仅20岁左右,是个现役军人家属,丈夫所在部队驻在外地,她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长期分居两地。大约1956年,报上曾刊出过一幅漫画,画的是牛郎织女隔着一道天河,两人遥遥相望,不能聚首。漫画道出了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苦恼。这位女难友看了漫画,深有同感,她对周围人称赞漫画画得好,再联系自己,不免发了些牢骚。反右派运动一来,经人揭发,认为是反党言行。于是,她被划为右派,送到柏各庄农场来改造。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右派必定一个个都是罪恶深重之辈。其实,情况完全不是报上所宣传的那样。在我们分场的右派,据我所知,他们获罪的根据,几乎都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听了只能让人叹息。

三

我们分场的28个右派,被编成一个大组,设一个大组长,下边又分成几个小组。农场干部规定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的制度,在会上我们翻来覆去地翻腾自己的“罪行”,挖掘思想根源,务必做到对罪行“心服口服”,大彻大悟,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现在想来,这就像是在演戏。谁都明白,对硬扣在头上的帽子,要做到口服心服,是办不到的,可是谁敢当面顶撞?于是不得不做出沉痛状,转弯抹角地进行自我批评。也有少数几个表现积极的人,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仿佛他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姓“右”。我听了大不

以为然,这分明是说的假话。但继而一想,觉得这些人也有情有可原,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为了早日跳出右派苦海,说几句假话也是被逼出来的。

被改造的右派,在内部被划分为口服心服、口服心不服和心口皆不服三类。我是属于口服心不服一类。我家里老小一大家子,都眼巴巴地盼望我能早日改造好回去,我在这里硬顶行吗?不行。可是要我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心里实在痛苦,我何尝有过一丝反党之心?每次写个人改造总结,我就转弯抹角地写上一大篇,左一个“错误”,右一个“错误”,就是绕开了“右派”这个刺人的字眼,我不愿意自己给自己扣上这顶帽子。我的文字游戏瞒不过明眼人,农场干部对我说:“你在劳动中表现还不错,还比较老实,思想改造进步不大,恐怕还是没有做到口服心服。”我回答说,我在思想改造上确实还要继续努力。

农场干部指出,对右派改造不能和平地进行,这是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严重斗争,对一切反改造言行必须展开无情批判。于是,在我们的思想检查会议上,斗争越来越激烈了。一些人把反右派斗争中自己吃尽了苦头的那一套极左、粗暴的做法,又搬到我们中间。批判的重点经常是三个人:陈企霞、钟惦棐、萧乾。陈企霞是一个资历很老的共产党人,抗日战争初期就到了延安。他坚持原则,对“罪行”是心不服口也不服,常常与批判者当面顶撞,反驳对方,看来他是横下一条心,坚守阵地到底了。有一回,有人揭发他曾背后发牢骚说:“同是右派,相煎何太急!”这种公然反改造的言行,岂能容忍!少数积极分子奋起痛斥,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在旁默不作声,我是其中之一。我从心眼里佩服这位年长者的硬骨头精神,自愧不能做到像他那样。

萧乾也是经常挨批斗的一个。其实他并没有像陈企霞那样硬顶,相反,他在会上一再表示“服罪”,平时寡言少语,小心谨慎,惟恐出错。在劳动方面他显得吃力,一则年岁大,身体又胖;二则不谙农活,干活时看起来笨手笨脚,为此不断受到批评。一次,我们下地割稻子,这是个累活,要不停地弯腰,他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干脆跪在地上干活。收工回来后,他受到尖锐的批判,说他是“丑化劳动人民形象”。批评者说,你看周围哪一

个工人像你那样干活的？俗话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在这里，起码是人道主义精神和同情心都荡然无存。

萧乾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两辈子》的一篇文章里，回忆了他在农场劳动的一件事：他的夫人文洁若十分关心老伴的健康，有一次，她在信里附来一小包灰锰氧，要萧乾吃生菜前用它消毒，免得生病。萧乾拆信时不小心，小纸包掉到了地上，被一个一起劳动的积极分子发现，报告了农场干部。那干部批评萧乾，说他是“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并为此专门开了个批斗会。萧乾在文章里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服，难道无产阶级就该让蛔虫在体内自由繁殖？在批斗时，能保持缄默，或者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季音在发言时却说：我看灰锰氧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劳动中避免生病，也是为了省得给组织上添麻烦。一席话说得那位复员军人也哑口无言了。”

萧乾说的这件事，我已经忘了，看了他的文章，却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

农场负责管理右派的是个转业军人，他原来是新四军6纵队的排级干部，我原是新四军4纵队的，我们有时倒还谈得来。当然他要站稳立场，不能和我套近乎。也许由于他知道我的根底，虽然对罪行口服心不服，在劳动中还比较老实肯干，就任命我为一个小组的副组长，萧乾就编在我这个组里。那时，农场把几个体力较弱的人分配到菜园劳动。菜园里的菜，经常在夜间被附近老乡偷割，队上为此就在园里搭了一间草房，派一个人夜间在那里住，看守菜园子。这份差使就落在了萧乾头上。萧乾年已五旬，在漫漫黑夜里一个人蹲在野外草棚中，万一遇到情况，叫他如何对付？他为此紧张得整夜不敢睡觉。他找我说，自己委实干不了这活。我觉得他说的是实情，就自己作主，把他换下来，另派一个年轻些的人去。这件事传到队上，领导上老大不高兴。他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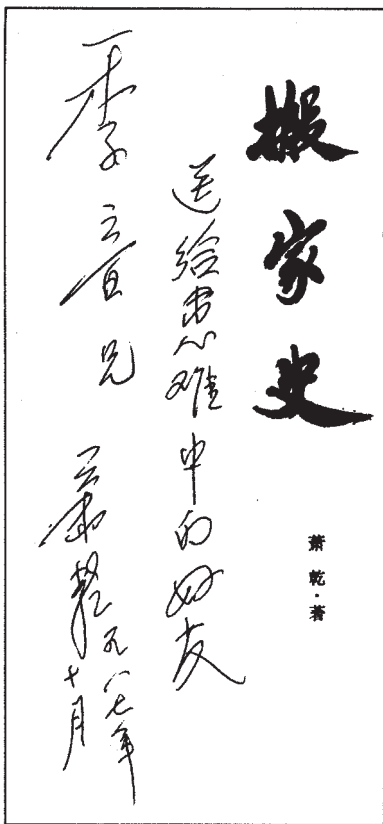
萧乾是重点批判对象之一，他干活叫苦，你不但批判他，反而护着他，是何道理？类似的事连续发生了几起，不久，我这个副组长就被撤了职。

萧乾是个老实忠厚的人，他压根儿不会投机钻营、看人下菜碟那一套。也许是被整怕了，有时候他甚至表现出过分的软弱与不必要的自卑。有少数积极分子也就“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欺，在欺侮别人中显示自己进步得快，改造得好。由此使萧乾又凭空多吃了不少苦头。手头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住的房子是一间大通铺，老萧的铺位在挨墙的尽头，他夜间常要起来小便，室内的灯早灭了，他在黑暗中挨着床摸出门去。有一次，他上厕所回来，黑暗中摸错了床位，摸到一个积极分子的脑袋，这位难友猛地坐起来，破口大骂，吓得萧乾连连赔不是。从此，萧乾为了避免再闯祸，就控制自己尽量少喝水。夜间是不再起来小便了，但由于喝水过少，日久天长，他便得了肾病，这个病痛在晚年一直折磨着他。我有时劝老萧，不要凡事过于软弱，该争的还得争，他听了只是苦笑。

1978年，萧乾在送我的一本书上，写了这样的话：“感谢你在柏各庄给我的温暖，在北极世界里的温暖，特别难忘，特别可贵。”其实，我在农场里，只是对这位长者表示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同情，谈不上什么温暖。况且，我那时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岂能有助于他？我只是觉得，在那个人性被扭曲的年代，作为一个正常人，总不能丢弃了应有的一点人性，别人要把你打倒，你怎么能自己打倒自己？

四

时间过得很快，到农场劳动改造已经一年多了。1959年9月，从北京传来消息，为庆祝国庆10周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特赦的建议。9月17日，



作家萧乾给本文作者赠书的题词

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接着,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这一天,即9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指示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国庆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指示》规定:“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

听到了上述两个消息,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摘帽子有了希望,固然可喜。可是把摘帽子与特赦战犯并列,作为庆祝国庆10周年实施宽大政策的一项内容,心中实在不是滋味。

柏各庄农场很快落实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庆节后不久,在总场的大礼堂召开大会,传达了中央指示的精神,宣布给第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全农场摘帽子的共10人,基本上符合中央规定的10%的比例。在宣读摘帽子名单的时候,下边都加上了“同志”二字,证明他们已经回到人民队伍,由此台下响起了一阵掌声。

摘帽没有我的份儿,这是我事先早就估计到的。我对罪行口服心不服,这正是中央文件中指出的不能摘帽子的类型之一。如何才能口服心服,真正改造好呢?我茫然。我被指责为“口服心不服”,又对在一起改造的右派中的重点人物批斗不积极,必然会被认为是思想改造不到家,没有彻底“脱胎换骨”。

1960年夏,农场又摘了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次摘帽子没有开大会,只由各分场分别宣布,摘帽的人比上回略多些。当然,人数还是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比例。

摘帽子仍然没我的份儿,这还是预料中事。

我原以为将无限期地在农场改造下去,但出乎意料,1961年6月,报社忽然发来通知,把我调回北京。在柏各庄农场改造了两年半,接到回去的通知,心中既高兴,又不免惆怅,因为右派帽子依然戴在头上,颇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苦。但能回到家中,和妻儿团聚,毕竟让人兴奋。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唐山火车站,车站上空荡荡的,什么食品都买不到,连开水也喝不上,幸亏我从农场带来几个馒头,只好啃着干馒头聊以充饥。

周围一片萧瑟的景象告诉我,人民共和国正

处在严重的困难中。

不久,在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陆续回到报社,经过人事部门负责人逐个谈话,大部分都调到外地重新分配工作。我幸运地被留了下来,分配到编辑部的工商部。要知道,当时我还戴着右派帽子,一个被指斥为“埋得很深的定时炸弹”的人,又让他回到编辑部,这件事当然非同一般。我不知道当时报社领导是怎么作出这个大胆决定的。

调到编辑部不久,报社机关党委就宣布给我摘帽子。部里一位好心的老同志认为我的问题属于错案,应当平反。她找到了报社机关党委。党委书记也同意她的看法,转告我要耐心等待。我遵照耐心等待着好消息的降临。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杳无音信。

平反的事始终没有下文,传来的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重大消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痛斥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指的是他认为许多人把三年困难的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一团漆黑”;单干风指的是农村不少地方试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等办法,以恢复农业生产;翻案风指的是当时不少地区和部门提出要为过去整错了的干部甄别平反。毛泽东在会上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这柄达摩克利斯剑,又高悬在人们头顶上了。

我在报上读了这则报道,不免大失所望。平反冤假错案已被斥为“翻案风”,自己平反问题肯定已无指望。我提醒自己,不要再存什么幻想,还是安下心来,努力工作,小心谨慎,以免招来新的麻烦。

不料,一等竟等了17年。直到1978年,在胡耀邦总书记的主持下,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平反冤假错案被提上议事日程,我在当年获得了改正。我被划为右派时是35岁,改正时是55岁,正好20年。

虽然好事来得晚了点,但我还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历史最公正。“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马克思语)

(责任编辑 李晨)

易礼容一生不寻常

● 杨 翊

—

易礼容生于公元 1898 年，那年是农历戊戌年，发生了开启中国民主革命先河的戊戌变法维新，也兆示了易礼容不平凡的百年人生。

1911 年，易礼容的老家湖南省湘乡县恢复驻省中学（设在省会长沙），他去报考了，国文考题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六经论》。他文章的结论是：“呜呼，汉武之罪岂在秦皇下哉。”13 岁的他已明确了反对统治人民思想的专制主义的立场。

在长沙求学期间，1915 年他积极从事揭露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宣传。1918 年易礼容作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领袖之一，投身于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暴政的运动。

易礼容在湘乡驻省中学念书时，即与毛泽东相识，从此追随后者从事革命活动。1919 年 6 月，他加入了毛泽东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一名干将。毛泽东后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到的学会八位知名共产党人中就包括了他。

1927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五大时，易礼容被选为正式中央委员。当他从候选名单上看到毛泽东只是候补中委时，断然将选票退还给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李维汉，并声明：“润之（毛泽东）无论如何比我强，这个候选名单不公道，我不参加投票。”随后退出了选举会场。

同年 5 月 21 日，湖南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爆发，原中共省委主要领导人被迫离湘。易礼容受中共中央紧急委派，立即返湘主持工作，先后担任省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九个月。1927 年“八七会议”前夕，共产国际两名代表（俄国人）

来到长沙，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要求省委书记带头签名打倒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易礼容等坚决反对。争辩持续通宵，不欢而散。两个俄国人回到武汉，在“八七会议”上说：“湖南省委书记代表地主阶级，遭到毛泽东当场严厉反驳。”

1928 年后，由于复杂的客观原因，易礼容失去了与中共组织的联系，在江西、安徽、江苏及日本等地流亡六载。直至 1934 年，鉴于民族危机上升，也为了养家糊口，易礼容开始在上海做些有益于抗日图存的工作。这一情况反映到中共中央后，毛泽东于 1936 年 8 月 14 日给易礼容写了封信说：“知兄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我听了非常欢喜……兄之苦衷，弟所尽知……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这封信表明，中央对易礼容 30 年代中期在上海的工作是理解、肯定和寄予希望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易礼容从上海回到湖南，后转赴重庆。在 1943 年中国劳动协会（劳协）第四届年会上，易礼容被选为常务理事，任书记长。因理事长朱学范经常在国外开展活动，劳协国内工作主要由易礼容负责。1945 年 8 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由延安飞抵重庆，出席国共两党和平谈判。9 月 10 日约见了朱学范与易礼容，并肯定了他们的工作。

1949 年 5 月，易礼容从香港抵达解放了的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刘少奇与其他一些熟人建议他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表示愿从旁协助。易礼容婉言谢绝了，他的想法是：在中共同国民党反动派及日本军国主义斗争期间，他很多时候未在第一线直接参战，现在“天下”打下来了，他再申请入党，不符合他的做人原则和中国读书人的处事传统。

二

易礼容出身于一户殷实农家。父亲聪明能干,但放荡不羁;母亲勤劳贤淑,刚烈正直。她的坚强豪爽性格,对易礼容影响颇大。

因家道中落,易礼容少年时代在乡间念私塾时,已是仰仗亲戚援手。他勤奋好学,聪颖超人,有独立见解,深得老师、长辈的赏识以及同学、朋友的敬爱。易礼容高小毕业后,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和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之一)学习,不止一次因无钱而辍学,只是由于亲戚和朋友的资助,才得以继续学业。其中出力最大、感人至深的是他的同窗好友李庠。

1916年,易礼容考入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商专),与李庠同班,且座位相邻,交谊甚笃。李庠发现每当学校要交费时,易礼容即愁眉不展。在了解缘由后,便每学期从家中带来两份学费,期期如此,从未间断。商专毕业后,李庠在易礼容领导下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庠仍在白色恐怖下的长沙城坚持斗争,不幸被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在商专,易礼容被选为该校学生会会长,并代表商专出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评议部主任。在以学生为主的湖南各界发动的“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彭璜和易礼容是三名主力。1919年夏末,易礼容带领商专同学30余人转学汉口明德大学,在武汉组织旅鄂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驱张据点,得到在湖北的湘籍学生及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的积极支持。这年冬天,易礼容掌握了张敬尧的部属张宗昌购买鸦片烟种子的罪证后,亲自去北京同正在北京从事驱张活动的毛泽东商议,除把情况向万国禁烟会与湘籍国会议员通报外,还和湖南请愿团代表向国务院总理靳云鹏请愿,要求撤换张敬尧与张宗昌。在湖南与其他各地人民的持续斗争以及湖南国民军的逼迫下,张敬尧一伙终于在1920年6月被逐出湖南。

三

当易礼容还在商专学习期间,毛泽东、蔡和森等于1918年4月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新民学

会,它最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易礼容于1919年6月正式参加了新民学会。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易礼容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目的之主张。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大多数赞成将它作为学会新的宗旨,使学会性质实现了质的飞跃。关于达到目的之方法,易礼容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22岁的易礼容那时已从一名爱国青年,逐步成长为以科学思想武装的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较早就提出要创办文化书社。1920年8月2日毛泽东在楚怡小学召开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推定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为筹备员,负责推进书社创建工作。易礼容任经理,全面负责;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主管对外联络。经过多方努力,书社规模逐步扩大,经营的书籍报刊达数百种,湖南各地设立了分社或代销处,长沙各校也有贩卖部与推销员。书社经营了七年,坚持到1927年“马日事变”后始遭反动派封闭。

在新民学会与文化书社的推动下,1920年初冬,约在11月25日至12月1日之间,长沙秘密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人。1921年8月毛泽东在上海开会后,回到长沙,跟易礼容谈了在湖南组党之事,易表示赞成。接着,毛泽东经中共中央领导人授权,召集何叔衡和易礼容开会,正式成立了湖南省第一个共产党三人小组。同年10月中共湖南省第一个支部建立,有党员十余人,推选毛泽东任支部书记,何叔衡与易礼容为支委。1922年5月成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的前身),毛泽东任书记,易礼容是委员之一。与此同时,易礼容还代表湖南工人和共青团员,分别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次代表大会。在国共合作实现后,易礼容与毛泽东、夏曦代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前往广州,参加了1926年1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

中共湖南党组织建立后,为培训党、团干部,经毛泽东提议,于1921年8月创办了湖南自修

大学,有住校学友30余人,包括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李维汉、李达、郭亮、夏明翰等,李达为学长。自修大学以“改造社会”为宗旨,学友们一面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一面参加党、团工作。1921年9月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目的是提高年轻骨干政治水准。自修大学于1923年11月被军阀赵恒惕封闭后,中共湘区委员会以补习学校数百名学员为基础,建立了湘江学校中学部与农村师范部,易礼容被委任为校长。在大革命失败前的

三年多时间里,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青年革命干部。此外,为筹措革命活动费用,易礼容根据党的指示,曾先后兴办长沙织布厂和从事煤炭生意,均取得较好效益。

从1922年到1927年,易礼容在毛泽东领导下,以很大精力投身湖南工农革命运动,并担任新成立的泥木工会秘书。在1922年10月23日争取营业自由权及调高工资的罢工爆发后,由易礼容和毛泽东先后任首席谈判代表。经过持续三天的激烈交锋,在长沙其他行业万余工人的声援下,罢工终于获得全面胜利。

1922年末易礼容奉党组织之命去湘赣边境的安源,创建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并任总经理,协助李立三、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运动及路矿工人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此时,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3000多工人也兴起了工潮,派人到安源请求支援。毛泽东决定由易礼容偕同安源工人俱乐部的蒋先云等人前往常宁。易、蒋在水口山铅锌矿工人领袖刘东生、谢怀德等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迅速成立铅锌矿工人俱乐部,由于领导得力,斗争坚决,铅锌矿工人的罢工赢得了胜利。长沙、安源和水口山三次斗争的成功,奠定了中共湖南省组织的坚实基础,提高了它在省内及全国的声望。



1995年4月30日,易礼容(右)最后一次参加政治活动,时年97岁。

1926年3月,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通知易礼容,由他负责湖南全省农民运动,秘密筹建省农民协会。根据此前毛泽东在韶山发动与组织农民的经验,1926年5月易礼容在柳直荀、李庠、陈伏泉、庞人侃等的协助下,制定了《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因为反动派的压制,当时还只能秘密进行工作,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入长沙后,省农协从地下转为公开。易礼容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的合法身份,下令撤消土豪劣绅操纵的旧农会,将其财产划归

新成立的农民协会。1926年8月20日,易礼容在湖南国民党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农民部工作的报告中,主张提出关于农民的最低限度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作为农运的政纲。在湘区委领导下,在约半年时间内,湖南75县中已有77%成立农民协会,成员由40万人扩充到200万人。在1926年12月举行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易礼容当选为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为了保卫农民斗争的胜利成果,易礼容积极组建全省农民自卫军。这支经过训练的队伍,后来成为毛泽东开展井冈山武装斗争的重要力量。

五

1927年4月易礼容赴武汉,出席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全国农协委员。此前,他已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七名委员之一。“马日事变”发生时,易礼容仍在武汉。几天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找他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要他回湘主持工作。易礼容临危受命,潜回长沙城,立即找到谢觉哉、李庠等得力干部,着手恢复党组织,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机警地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捕。在一次包围易礼容住宅时,他不在家,逮走了他最小的内弟许文杰。许文

杰为共青团员,是长沙市被押赴刑场的众多烈士中,沿途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的第一人,牺牲时年仅16岁。易礼容的好友李庠、省军委秘书李子骥均在这一期间遇难。

“八七会议”后,因易礼容等不同意见签名打倒陈独秀,湖南省委被改组,由彭公达任书记,易礼容仍为省委委员。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由于湖南省委未执行当时中央攻打长沙的左倾冒险命令,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等均被免职,任命王一飞为省委书记。这时,易礼容请求王一飞批准他去井冈山同毛泽东一道从事武装斗争。因敌人盘查甚严,易礼容等到1928年春节才找机会到达安源,同在茅坪整军的毛泽东取得联系。正当易礼容准备去茅坪时,接到湖南省委转来的中共中央两次电报,第一封调他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第二封调他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部长。中央还说毛泽东是搞军事冒险,不要去他那里,应独立工作。易礼容想向中央陈述意见,但这时湖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王一飞牺牲,已无法同中央联系。易礼容设法再次捎信给毛泽东,告知中央的决定,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回信要易礼容遵从中央命令,并说:“他们不要我们,但我们还是要他们。”

1928年3月易礼容从安源经九江、南京、镇江等地赴上海(当时江苏省委在上海),沿途多次被特务发现,幸赖轮船上英、美水手及南京海关职员的援助,才得以脱险。因缺路费,不得已在江苏埭城教了几个月小学,待抵上海,已是1929年初了。路上耽搁过久,失去了同党的联系。由于叛徒告密,易礼容于1929年9月东渡东京避祸两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始返上海,仍然过着艰苦的逃亡生活。直到1934年,他才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寻找职业,但明确表示:只做正面工作(指抗日性质的工作),不做反面工作(指特务情报工作)。从1934年至1937年,他先后出任朱学范当班主任的上海市总工会工运人员训练班的教务长、朱学范当总队长的上海市工人勇进队的参谋长、朱学范主管的私立民立中学的教导主任、潘公展任社长的“上海革命青年力社”的总干事。易礼容在上海工作时,利用职务之便联络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共产党员王凌波出狱后,曾在易礼容处居住数月才返回延安。张

洺(林育英)住在法租界霞飞坊时,也曾得到他的掩护和援助。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易礼容于1938年初取道香港回到湖南,在张治中任主席、潘公展任秘书长的湖南省政府任秘书。长沙大火后,他于1939年初前往重庆,1940年上半年又回到湖南,在新宁乡村师范(原衡山乡村师范)任职。1941年上学期,新宁师范迁至武冈,改名湖南省立第六师范(亦称武冈乡村师范),易礼容继续在该处任职,兼教国文。他在两所师范前后呆了两年多,很受学生欢迎,却因在学校倡导自由学风,为省教育厅长朱经农下令不许在湖南执教,于1943年春再赴重庆,开始在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

六

中国劳动协会1935年2月成立于上海,是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管辖的一个劳动文化团体。抗战爆发后,劳协先迁武汉,继迁重庆。在1939年12月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朱学范取代陆京士当选为理事长,年会还接纳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劳协团体会员,但这时拥有实权的书记长一职仍掌握在右派手里。在劳协1943年3月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上,易礼容担任了书记长。他积极配合朱学范理事长的进步行动,加强同解放区工会的团结,逐步改变了劳协的结构与面貌。

易礼容上任后,吸收思想进步的青年为组织股干事;在工人活动分子中选拔骨干;直接发展个人会员,到1945年,已有个人会员1.5万人。依靠这批积极分子,劳协于1946年上半年相继建立了汽车工人、机器工人、被服工人和印刷工人这四个全国性的职业工会。从1943年起,劳协接受美国工会捐款举办工人福利事业,受益人数达40余万;兴办工人文化补习学校49所,工人夜校40多所;资助从沦陷区、战区来大后方从事战时生产的技术工人一万多名,募集并筹措4300万元救济失业工人。易礼容还从美方捐款中拨出一部分给解放区工会。抗战胜利后,劳协参与重庆市劳资纠纷调解,进行了三次全市性的反失业斗争,动员了200多家工厂的3万多工人参加,获得一定胜利。劳协影响不断扩大,两年内团体会员由44个增至86个,会员人数超过200万。

劳协还重视开展政治斗争。它一开始就注意参加国际工会活动,争取国际支援,积极谋求同解放区工会组成统一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会议。会刊《中国工人》在重庆、上海、香港三地共出版96期,每期发行2万份,遍及全国各地。而最具历史意义的,是1946年1月30日旧政协闭幕前夕发表的二十三条政治主张。它是劳协历史上首次公开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在易礼容主持下,由徐弦、秦牧执笔起草的,内容分三部分:政治方面主张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召开民选的国民大会,扩大政府基础,军队国家化,惩办贪官污吏等;经济方面要求保护民营工业,迅速恢复光复区工业生产,解决土地问题,提高农民生活等;劳工方面强调工人自由组织工会,成立全国工会联合会,工人有罢工、游行与参加管理的权利,改善工人生活及工作条件等。

“二十三条”的发表是劳协政治上的一大进步,也标志着易礼容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彻底决裂。国民党反动派视他为眼中钉,对易礼容相继发出逮捕令及通缉令。1946年“八六”大逮捕前夕,易礼容在汽车工人工会会员的掩护下逃离重庆,于同年11月辗转抵达香港。

此时,已在香港的朱学范与易礼容商议后,将劳协总部迁至香港。在港两年半时间内,朱学范仍主要从事国际活动,随后于1948年2月赴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易礼容则在香港建立劳协领导机构,召集内地部分劳协骨干去港工作或在港短期轮训,恢复《中国工人》(丛刊)的出版,指导劳协干部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与迫害工人的斗争。这批骨干积极联系当地劳协会员及工人积极分子,为护厂护矿、迎接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有的人英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协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全总。朱学范被选为总工会副主席,易礼容当选为常务执行委员兼劳动保护部部长。1949年11月在解放了的北京举行的劳协代表会议,正式宣告中国劳动协会结束。易礼容在异常复杂与艰难的环境中为劳协工作了六年,同他有过接触的劳协工作人员,对他均有较高评价。

1949年5月易礼容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

应中共电邀,从香港来到北平,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从第二届至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届(第八届),他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或常务委员。

易礼容在全国总工会任职的三年(1949—1952)中,工作十分勤奋,勇于提出意见。他关心和爱护青年干部的成长,带领他们学习苏联工会工作经验。他还主持研究起草了《工会基层委员会劳动保护工作条例》及《工会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工作条例》两项法规,对基层工会劳动保护与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1952年易礼容调至全国政协任副秘书长,为政协各项工作及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出过不少积极建议。易礼容非常关怀大革命时期湖南革命烈士的遗属,想方设法为他们争取抚恤、提高补贴和安排工作,解决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与长期困难。

易礼容还在1949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自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十年浩劫中,易礼容难逃厄运,于1968年11月5日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遭受非人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但易礼容不畏强权,始终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肯陷害好人。他入狱时已年满70岁,由于心态平和,每天坚持锻炼,虽关押六年半,出狱时已77岁高龄,仍身体康健。易礼容的冤案,到1978年邓小平、胡耀邦主持工作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这一年,他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仍连任常委。到第八届时,因已近95岁,才仅任全国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易礼容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为国家大计建言献策。1995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70周年,他作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应邀出席全总4月30日上午举行的纪念大会,接着去全总职工之家聚餐、照相,下午三四点钟才回家,自己走上三楼。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政治活动,时年97岁,之后遵从医嘱不再下楼。易礼容晚年最大爱好是买书、读书,订阅各种报刊,涉猎甚广。

易礼容于1997年3月28日病逝,终年99岁。按中国传统算法,可说是活了一世纪。一生历经沧桑,风云变幻,波涛汹涌,极不寻常。

(责任编辑 李晨)

我见到的陈伯达

● 甘惜分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实为权倾一时的霸主。呼风唤雨，号令中国。他能逼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也能迫害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能随意点名批这个批那个，其能量可谓不小。不过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时间很短，他的权力很快就被比陈伯达更大的野心家江青所篡夺，江青才是真正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地位衰落，改而投奔林彪之门。但他的外表却正如他自称的那样，是个“小小老百姓”，是个“书生”。

（一）

我与陈伯达其人素无交往，高攀不上。但几十年历史机缘中，也曾偶有接触，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把这些影像的片断连接起来，也能略观其人。

1938年2月我初到延安，行囊中带了几本书，那是路过重庆书肆购得的。其中一本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另一本就是陈伯达的《真理的追求》。买李达那本书，我是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它一直放在我的随身挂包内带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什么买了《真理的追求》？而且带到延安？动机是什么，现在想不起来。大概是受陈伯达文笔的感染，从书架取下略读几页，觉得这位作者思想酣畅，文笔斐然，不像一般理论著作那么晦涩，就带到延安。这本书后来不知所终，也未见过别人有这本书。

那时我才二十来岁，知识甚浅，只有一番渴求革命理论的欲望而已，买陈伯达的书，并非对他有深刻的了解，完全出自偶然。也许是那本书名吸引了我，想在这本书中对真理“追求”一番。

（二）

1938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偶然看到墙上一纸布告，陈伯达举办“三民主义讲座”，时间为每星期日，地点在大边沟某号窑洞陈的住宅前，愿听者可自动前去。

这时陈伯达在延安已颇有名气，我又早已读过他的《真理的追求》。三民主义是什么，虽然早在小学生时代就天天必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国民党统治时代“党”和“国”不分，把党歌当作国歌了）也粗知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无非小孩子念经，跟着唱念而已。现在到延安又进一步从毛泽东著述中了解到三民主义与中共最低纲领基本一致，陈伯达的专题讲座，何不前去听听。

陈住的窑洞前有小块平地，听讲者可以自带坐具，也可以坐在地上听讲，自动前来听讲的人大约八九位，稀稀拉拉，彼此不认识。陈伯达出来了，距我一二尺，他站着，我们坐着，我们是仰面看他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学者：个子不高，微胖，穿一身普通蓝色制服和一双棉鞋，戴一顶棉帽，面色健康，皮肤较粗糙，外貌上看不出什么特点。他一开口说话，其特点就突出了。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他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完全是“外国语言”，瞧瞧左右，也都在东张西望，似乎都不大懂。他口头常用“暴动”二字，我听起来就是这个字音，什么“暴动”，不明白。听了两个钟头，下课，各自告退。

第二天去不去呢？犹豫半天，还是决定再去，名人讲课嘛，细细听，总可以听出点名堂来。谁知依然如故，毫无所获。来听讲的人也少了二三位。

下课以后,我问身边同志“暴动”什么意思?他们似乎也不大懂,猜想说“大概是‘矛盾’吧”。天哪!我豁然开朗,中国社会有几天“矛盾”,这不明明白白吗?从此我告别了这位陈教授,其他听讲座的人是否还照样去,我再也不问了,反正是讲座,去不去自便。由此我领悟一点:一个人的文才和口才才是两码事,陈伯达文章流利而口才讷讷,我只读其文其书,再也不愿听他讲话了。怪不得“文化大革命”中这位“大政治家”对群众讲话必有人为他当翻译了。中国也真大,写一样的字,却发出不同的口音,有如外语。不过这第一次相见,陈伯达倒留给我以朴实无华的学者印象,丝毫看不出他后来的变化。他的“三民主义讲座”,后来出版改为《三民主义概论》。后来又再版,改称《论孙中山主义》,都是延安解放社印刷发行。

(三)

此后,陈伯达在延安报刊上发表的长短文章越来越多。后来我调晋绥解放区工作,与延安只一条黄河之隔,从延安《解放日报》上,经常读到他的作品,特别是他批判重庆蒋介石集团那些文章和小册子,文笔流畅泼辣,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很有气势。现在我还记得他批判“精神总动员”之文(篇名已忘记)和《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等,都是一时传颂,很受大家赞赏。显然在延安十来年,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不但政治上、思想上受毛泽东指导,文风也显然学习毛泽东。毛泽东笔下那种高屋建瓴、大气磅礴之势,陈伯达必然日日揣摩,心领神会,他的延安时期之文,可以说是他一生的高峰之作。这都不能不归功于毛泽东的耳提面命和为他精心修改。《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文近十万字,四天写成,据说陈伯达有时边写边哭起来。毛泽东读了原稿,大为赞赏,立即批示全文付印。1970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痛斥陈伯达的“天才论”,说几十年来就没有同这位“天才理论家”合作过。我看此话也过份了,至少在延安那几年,毛泽东同陈伯达就合作得很好。

但陈伯达在解放战争时候也有败笔,为害不小。大约是1947年康生和陈伯达从延安转移到

晋绥边区领导土地改革运动《晋绥日报》发表陈伯达的长文《有事同群众商量》。从题目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从其效果看,却为“左倾”思潮煽风点火。那时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还比较平稳,广大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不但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大大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但随着运动深入,逐渐出现极左情绪,一些勇敢分子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走贫雇农路线”等等,这就不仅打击了其他革命阶级和革命人士,甚至也打击了中农,使贫雇农陷于孤立。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极左思潮和自发论。当时某些领导干部和报纸编辑记者也附和这种思潮,宣传这种思潮,使解放区杀人过多,工商业凋敝,学校关门,社会秩序不稳。

这时,报纸上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有事同群众商量》,大字标题,十分醒目。此文为上述那些已经不能再“左”的思潮火上加油,一切都要同群众商量,而不提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不提党的总路线,不提革命统一战线,不提党的全面的农村政策,不提在依靠贫雇农同时必须团结中农以及团结所有革命阶级和革命力量。陈伯达片面提贫雇农路线,显然是附和时尚,只同贫雇农商量,这就给“左”倾思潮加温,破坏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此后不久毛泽东从陕北渡过黄河,路经晋绥,在干部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同陈伯达的“有事同群众商量”是对立的。陈伯达这种貌似革命而实为破坏革命的“有事同群众商量”,在1947年的土地改革中,干了一件坏事。

(四)

1948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前往西柏坡途中,在晋绥停留几天,住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蔡家崖村,但陈伯达却没有与这大队人马同住在一起。毛泽东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陆定一参加了这次谈话,陈伯达始终未露面。有一天,晴空高照,我正在《晋绥日报》驻地高家村(此地距蔡家崖15里)处理稿件。忽

然,飞机轰鸣,由远而近,我放下纸笔,跑出窑洞,见院内乱七八糟的竹竿上晒着白色的被子、衣服。这些白色衣被正好暴露此地是我方党政机关,正是敌人轰炸的目标,我们必须赶紧收拾这些晾晒物。我见隔壁的窑洞房门虚掩着,不知里面住的是谁,就推门进去高喊:防空警戒,快收拾院里东西!我一踏进门槛,愣了,窑洞内光线虽不甚好,但一眼就看见躺在炕上的一个微胖的男人,他急急起身,正是陈伯达,他夫人急忙走出门外收拾晾晒的衣服。

我不知所措,只说声“对不起”,退了出来,没有叫一声老师。就像一个不知情偶尔撞进门去报警的局外人,这是一次偶遇。

不过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没有住进蔡家崖去同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一起,而单独住进《晋绥日报》驻地,而且是悄悄而来,我们都未察觉。陈伯达也没有利用这次住在晋绥日报社的短暂机会同记者编辑们说说话,了解一点下情,他们夫妇蹲在窑洞里足不出户,何时离去,我们也不知道。

(五)

进了北京的陈伯达,无关的人员是很少见到他了。但北京虽大,人海如潮,却也能狭路相逢。我有一次竟在荣宝斋碰到陈伯达。那是上世纪60年代,离“文革”暴风雨不远了。



“文革”中陈伯达(左)和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在一起

荣宝斋是我常去的古文物市场,看看字画而已,很少购买。有一个星期天,我忽然看见陈伯达在那里认真欣赏,只他一人,并无随从,也未进入内厅待以上宾,大概接待员还不认识这位中央要员,怠慢了。厅里人很少,就我两人,我在一边看这看那,他在那边问真问假。我没有走过去向他自报是他“三民主义讲座”的学生,他也未曾注意到我这个数十年前的听众,他肯定不认识我了。他倒是仍不改本色,并未穿呢制大衣,总是那身臃肿棉衣裤和棉鞋帽,一口闽南方言。我倒是颇有感慨,官至政治局,还是单人匹马出来行动(门外有无汽车我未注意),也难得,不减艰苦奋斗作风,像个基层干部。我对他还颇为敬佩。

(六)

文革风暴乍起,我不敢想象,陈伯达这个书呆子(那时还不知道他的野心家一面)怎能撑起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这个局面。自古以来的造反头头大都是草莽英雄,都是揭竿而起,挥戈四方。陈伯达拿起笔杆子打人骂人,倒还可以,至于叱咤风云,驰骋天下,怕未必是他的本行。加上口音障碍,说起话来别人也听不懂,他也始终不改,这种人要充当“文化大革命”的领头羊、中国革命领袖,恐怕是不自量力,也可能是上边用错了人。

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出了事,我大为惊讶。想不到陈伯达这样一个耍笔杆子的文弱书生

竟成了一个大大野心家。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同志们谈起陈伯达在“文革”初期那种狂言恣肆、动辄给人栽赃上纲的丑态,实在叫人难以置信。林彪事件揭开之后,我才逐渐醒悟:一个人一旦有了权力,如果不善于使用这个权力,人是会变的,变成飞扬跋扈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要随时警惕,任何人只能顺应时代浪涛,做他应当做而又力所能及的事情,陈伯达显然是站错了位置。

1973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又玩起了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其矛头所向,颇为迷离模糊,看起来一场全国性的政治浪潮

又将再起。“文化大革命”初期那场打砸抢、破四旧的恶浪又隐隐再现,我想起我家中那张陈伯达写的大字。

这张陈伯达手迹是偶然到我手中的。

1964年我一个老朋友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她的女儿含泪对我说:“甘叔叔,我妈妈的遗物,你看中哪一件,可以取回去作个纪念。”我不假思索地告诉她:“别的不要,我只要你家墙上陈伯达写的那张字。”我轻易地得到了这张字,宝贝似的珍藏起来。

这是一张什么字呢?一张条幅,只写了两个楷书大字“克己”。这两个字是浙江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向陈伯达讨要来的,装裱起来,颇为中看。这位同志后来把这张字转送给了我这位朋友,她也很喜欢这两个字。快进入老年的人,出于对人生的醒悟,总是注意克制自己,把名利之类的事情看的很淡,所以她把这张字挂在客房内,既欣赏书法,又警惕人生。陈伯达虽不是书法家,笔下也有相当功底,楷书“克己”二字苍劲有力,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吸引力。这张字在我家墙上也挂了几年。历史上的名人字画,大概都是这样传来传去。

“文革”初期,我的家曾被造反派抄了四次,损失不小。陈伯达这张“克己”条幅,造反派是没有注意呢?还是因“伯达”二字署名而不敢妄动呢?那时陈伯达是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大人物,谁敢动他一根毫毛?所以他的字在我家中安然无恙。

1973年的反击右倾回潮,形势逆转,陈伯达已同林彪一起扫进历史垃圾堆,人人得而诛之。我却“窝藏”陈伯达的手迹,那罪名还了得!我想转移出去,而我的亲友都有“问题”,都在农村改造,谁能收留这种“赃物”。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最后还是决心把它毁掉,以免引起无妄之灾。我把这张条幅从书橱里找出来,撕得粉碎,扔进厕所马桶里冲走了。

(七)

后来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一分子受审判刑又刑满释放出狱,最后郁郁而死。在这一过程中,陈伯达留给人们什么印象呢?

在我看来,陈伯达是个两面人物。一方面他是一个学术人物,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的获罪是由于他在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之间钻来钻去,讨一杯羹。如果他不作政治钻营,下决心清贫自守,向古代中国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学习,他也许在中国学术史上还能作出一些贡献,至少不至于落到身败名裂的地步。陈伯达在那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犯中不同于其他人,他是一个比较有学问的人,他不同于姚文元。姚文元也是一个文人,但他无非是上海滩上一个因缘时会的文痞罢了。他从主子那里讨个题目,或领会意图,然后回家寻章摘句,凑成篇章,向上请赏。他是主子的一条狗,主子要他咬谁,他就咬谁,他咬吴晗,咬周扬,咬陶铸,咬刘少奇,最后还将咬谁,人民都看得很清楚。陈伯达再投机,还不会堕落到姚文元那种地步。至于江青,是个大野心家,陈伯达哪是她的对手。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江青是副组长,副组长领导组长,甚至抛开组长,自行其是,这大概是天下少见。

总之,陈伯达是个自卑而又不安于自卑的书生,他不懂政治而又被卷入政治漩涡,最后被漩涡卷进无底深渊。

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废言的传统,我们是否也可以把陈伯达著作择其精华编成文集,让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参考。据我所看到的陈伯达著作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大约有几十篇,即使其中个别地方并非都完全正确,也可全文收入,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一个真实的陈伯达。注意不要改动他的文章,以存其真。社会在发展,一个人也在发展,一个人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和思维,他离不开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他的论著就是他那个时代在他的思维中的反映。后人用后来的眼光去修改前人的著作这不仅是对前人的歪曲,也是对时代的犯罪。我们不是已经犯过不少这种错误吗?不要再犯了。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更正

本刊今年第2期第6页照片说明应为:
楚青与粟裕秘书鞠开

孙大午访问记

● 周 勃

今年 49 岁的孙大午,是中国第一位拥有亿万身价而“越位”放言的民营企业家,被传媒称为“农民英雄”,因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宣讲“三农问题”获得知识界的认同。2003 年 5 月 27 日被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拘捕入狱 5 个多月,在国际和大陆媒体、特别是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后“控辩双方”达成妥协,孙以“判三缓四”的形式出狱。在接受记者访问中,孙大午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创业和结识知识界的经过,介绍了入狱出狱的过程,并发表了对“三农问题”和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最新思考和看法。

拆庙养和尚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

周:据悉,在目前巨额的金融市场上,我国的农村经济和民营企业可融资的份额还很小,而且大多是以传统的民间私人借贷为主,但国企和暗箱操作的银行借贷却占了很大的份额,请你谈一谈这方面的现状和解决方法。

孙:其实农村的资金都被吸收去建“东方明珠”了,建大城市了。人们总是看到税费对农民的剥夺,其实这种税费的剥夺在我看来还是小数,真正的剥夺是农民辛苦攒起来的看病的钱、建房的钱被信用社、被邮政储蓄吸走了。这是一种经济上的剥夺。还有一种就是对劳动力的剥夺,对劳动力的限制,即农民想干点什么,处处都有阻拦。我想本来对于农民来说,从事养殖、种植、加工是一条龙的产业化的活动,是企业的行为。可现在你就只有一个种植的行为,你的土地不能挪为他用,对农民的束缚非常大。我给你讲细致点,比如大午集团,它是个什么路呢?大午之路就是自力更生、互惠互利、互为带动、循序渐进、滚动发展之路。互惠

互利,即这个地方很穷,可它有两个资源,一是有劳动力,另一个是有粮食。那么我们就借农民的粮食,先让农民把玉米存在这儿,按 5 毛钱一斤作个价,三个月或半年以后给你付款,如果 3 个月后,玉米价涨了,涨到了一斤 8 毛钱,到时候我们就按 8 毛钱给你。随高不随低,这样一来既保障农民的利益,我们企业也不吃亏。对于农民来说挺合适的,粮食放到我这儿,价格有保障。对企业来说,这些玉米就是加工饲料的原材料,我们先用赊来的玉米加工着,等玉米涨价了,我们的饲料也就跟着涨价,这样不用向银行贷款,企业就取得了一笔流动资金,企业就起来了。然后再集合村里农民的剩余劳动力,这就是大午集团起步的原始过程。

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我的主张就是缩县减乡村自治。缩县就是说现在县里的机构太庞大了,要缩小它。一个县就有 60 个局委办,压缩到十几个就行了。减乡:原来一个乡镇有 2 万到 3 万人口,大的乡镇也就是 4 万人口,而减少后的乡镇,起点就要 4 万到 10 万人口,你山区土地面积大,人口可以少一点,4 万左右。人口密集区 10 万就可以,要这么多乡镇有什么用呢?比如徐水 50 万人口,10 个乡镇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减轻农民对乡镇这一级的负担。那么乡镇减少了以后,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中心镇,一个县城有着 5 个到 6 个中心镇,这就是城市的雏形。农村完全放开,实行村自治,具体实施办法就是县、乡拆庙养和尚。你没有这个庙了,和尚去哪?养起来了,你原先开多少钱,现在还开多少钱,哪怕再多给你点儿奖励,再给你点下岗费,还给你工资再往上提多少。这个好处是一次性了结,这个机构不会再庞大了,它不会再滋生另外的附着人员,你知道,一个土地局,它需要 40 个人的编制,可现在 400 人都不止啊,可

它还在扩大。所以你把这个机构拆掉,把这些和尚养起来,国家开始算账,可能要亏,用不了一两年国家会取得巨大的收益。农村自治放开以后,它会万马奔腾,会各显其能,农村各行各业能人不少。现在咱们国家,尤其是高层,特别累啊,农村是个大包袱,苦思冥想,怎么解决农民问题,怎么帮助农民,怎么让农民富裕起来。实际上你不要想了,你们把农民放开,农民自己就富裕起来了。

民营企业缺乏活动空间和合法空间

周:你觉得你的那场官司对民营企业和金融制度会带来何种影响和启示?

孙:民营企业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有多大的活动空间和合法空间?咱见到的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判决书中这个“非法”两字频率相当高,我就想,合法的空间在哪里?起码在现有的框架中是较少或没有的。这是第一个层面。再说第二个层面,从历史上说,民间借贷是草根借贷,是现代金融、现代银行制度的起缘。如果国家发展民营经济或者民营银行,应该是在民间借贷的基础上发展才是扎实的。

周:你认为民间自发金融行为在这一块儿应该是鼓励和培育,而不应该是打压?

孙:应该是发展的,而不是打击压制的。这种草根金融是最原始的、最古老的,也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前身和基础。

周: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实业家,请谈谈你创业时的情况?谈一些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事件或阶段,我觉得这对于年轻人或者后来者,还是比较有借鉴意义的。

孙:我的企业有几个关键期,一个是1985年的起步期,当时是五户农民,一股金就是2000块钱,一共是1万块钱,可当年就赔了1万6,全赔进去了。当时我在银行工作,事先我给贷了2万块钱,这下本利都赔上了,厂子也就倒了。

周:当时你们厂子做的是做什么?

孙:就是养猪场和饲料厂,开始饲料质量很好,后来“萝卜快了不洗泥”,质量不行了,就倒闭了,关张了。我就退了出来,我还在银行上班,我就说,你们4户弄2万块钱贷款我来承担着,可以往后续贷,什么时候企业缓过来了,你再还。结果

没有人敢挑这个担子,我就说让我家属把这事担起来,你们4户都撤出去。因为我家属是个妇女,又当厂长,又当会计,不可能搞股份制,你们的2000块钱,我完全退给你们,亏损的由我来承担,他们很高兴,就一块儿吃的散伙饭。我们就养了1000只鸡,滚动发展起来了。这个转折点说明了人要有宽容之心,当时农民都很穷,2000块钱多么不容易。我让我家属全部承担起来,团结了人心,取得了当时的人和。从那时起,我家属和孩子就住在那儿了,我每天骑自行车下班后往回赶帮着家里干活,后来又买了摩托车。一直到1989年,这就是比较大的转变。第二个转折点是88年底的时候,已经有70、80个工人,资产可能有上百万了,当时没有评估。企业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我上班来回跑,太累了,家属她也太累了,我便辞职了,这是第二个转折点。我回来以后,规模大了,这些“虫子”们就来了,工商啊、税务啊、土地啊、卫生啊都来了,就开始出现法律冲突,在冲突中,企业壮大了,这也是我自我完善的过程,之所以在5个多月的监狱中,没有什么事,也得益于他们的监督。在与政府打官司的时候,你首先得检查你自己,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夫妇一直是靠工资生活,每月一人2000块钱。我没有其他什么嗜好,就连我的父母都靠自己劳动吃饭。如果我有幕后交易,也就不会有今天了,我的企业也不是今天这样子,我与他们的关系也不是现在这样。查了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这种动机和行为,我很坦然,他们也很坦然。

周:你当时从银行辞职回来,承包这块地,在当时是出格的事。那时候好多人打破头,为了要一个公职和商品粮户口指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孙:我觉得利用职权,把家属带出去,找一个舒服的工作,这种活法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的价值观在于奋斗,不在于我的寄生生活。我可能到处流浪,也可能在开荒中失败。但这毕竟是我的追求,是我的奋斗,自己种地,自己刨食吃。动物的本能是什么呢?猪往前走,鸡往后刨嘛。作为人,不劳动、寄生,哪有自己奋斗得来的更享受、更幸福。人生的价值在于劳动的价值,在于你给社会奉献的价值,而不在于你索取的价值。我刚才说了,人生的价值取向不一样,当一个人想有所追求的时候,

当一个人想被金丝笼养着的时候,而这两点在同时介于愿意和不愿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在部队、在银行、在机关都算不得志,你自己想的,你自己想做的,都好像与别人格格不入,这种情况下我就愿意开荒来了。

在某种意义上,我还是个能人,你个性特别强,想做点事,人家别人也想做点事,人家是趋利避害,尽可能圆滑,而我这个人个性比较强,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良知不愿受丝毫的压抑或者委屈。平时别人说不出的话,我就说得出来,我不愿说瞎话。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时间长了就会吃大亏。这很简单,尤其在官场,大家都在奉承一个人的时候,你装不出来这个笑脸。当一个人很委屈的时候,你怎么都不忍落井下石,只能去帮助他。显然,当时在单位我个人在价值取向上,在为人处事上,存在着很多障碍。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不如找一个自己的空间,比如开荒地,别人谁能管得着,虽然累、苦,但有一种释放的感觉。

有人告诉我:你是第一次来中南海吧,这也是最后一次!

周:据说你是因为那次在中南海的直言得罪了地方政府,请讲讲你在中南海会议上发言的那次情景?

孙:好像是1998年吧,当时有山东、河北等三个省的基层代表在中南海座谈农村问题。我看到虚假的数字,就一连两次给中央领导写了条子要求发言,当时每个代表规定10分钟发言,而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说农民的收入没有那么高,讲了我所掌握的真实的情况和数据,我觉得能有这个机会我就要讲实话。中央领导当时也都认真地听我讲,这对改变农村政策还是起了些作用。但这次可能得罪了一些人,因为刚出中南海有人就告诉我:你是第一次来中南海吧,这也是最后一次!

周:我认为,你出事这件事还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就是告诉人们,我不和权力结盟,不违心地做事,不搞歪门斜道经营,照样能创造财富,这点很重要的。你看现在,一大批企业家,在人面前的时候会讲,我没办法,我也很恨官僚,但是为了生存,我只能跟他们妥协。然后在背后又做着肮脏的交易。你的行为动摇了一批一边做非法的事,一边

为自己的行为、心理解脱的问题富豪们自欺欺人的心理基础。另外一个,作为一个社会稳固、富裕的基础,特别在向民主化过渡的时期,特别需要一个中产阶级。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良性的中产阶级,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导致了中产阶级天然地依附权力。而一旦中产阶级获得财产,就会更加拥护专制,走向民主的反面。而你没有这些乌七八糟东西却做到了财富的积累,只要有一个个案存在,问题富豪们就不能这样讲,你若这样讲,就完全是在为自己解脱。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孙:事情是这么个事情,是事实,但不能这么看,像我这样财富比较干净,财富积累没有官商勾结。但我这种做法可以称道,但不可以学。

周:为什么不能学呢?

孙:我,孙大午就在这儿摆着的,就是事实,但是你不能让别人也这么做,这么做,是行不通的。我刚才说过我这是能人经济,比如说我孙大午学过三年法律,学过四年语言文学,我能打官司,我有口才,我能和你辩。但你不能要求别人都能这样,这做不到。所以说,做这件事情,走这条正路,非常难。并不是人们不愿意走这条道,而是在现实社会中你走不通。所以我理解其他的企业家。企业家的心是相通的,即使说企业家的财富积累有原罪,那也是市场原罪,也不单是企业家的原罪。那么为什么我说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呢?我相信他们也有一把辛酸泪,他们也有难言之隐,他们也不愿意走红道或者黑道,他们也愿意如我一样走正道。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支持我、同情我,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心也一样是向善的,是向正义的,这是无可置疑的。我这次从狱中出来,看到的是方方面面的企业家对我的支持,不管是官商勾结的、弄虚作假的(制造)假冒伪劣的企业家都有一把辛酸泪。他们后来对我讲,你孙大午是对的,我们也没有错,我们走你这条路走不通。

周:但是这个事情,我还是坚持责任不可推卸。只要你在经营中向恶的非法势力妥协,你就必须会付出代价的,这不是道德高调,因为只要你妥协了,你就要付出代价,如果全社会都大面积地妥协,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可言了。现在你公司的股权和产权结构是什么形式?

孙:产权是独资的、私有企业,曾经搞过股份

制,像那种保息分红的,入股自愿、退股自由的股份,但是银行查处过。我出事后,山东一家银行说让我搞股份制、合作制,那它的概念是什么?让不让农民承担风险,不让农民承担风险,真正的股份制搞得了吗?我要评估资产,老百姓认可不认可你的资产是真实的,再说你的资产那么大,老百姓一家拿出3万5万来,在这里起个什么作用?行不通。那么你要搞合作制,保息分红,那才叫巧立名目,变换手法,才叫真正的犯罪。

关在单身小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

周: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发生时的那个情况吗?

孙:那天原来的政协副主席给我打电话,我正在开会,他说新来的县委书记要请我吃饭,我感到很高兴,甚至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就赶快安排好工作,赶到鸿燕大酒店,在那儿并没有见到县委书记,只有便衣和警察,他们一拥而上,我便失去自由了。当时我没有惊慌失措,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自己也不是被坏人绑架了,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公安局和检察院的。我当时以为是审查审查,就会放了我,没有想到一逮就逮了我5个月,最后还要开庭审判我。

周:在监狱里,你都干了些什么?

孙:在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是看书,一开始关小号时不让我看书,监狱里面也没啥,我也呆得住,就是最早关单人小号时有点难受。人为什么要有思想呢?有思想是多么的难受!关在单身小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后来我就让他们给我一本初中英语,15天后到了大号,就能借到书了,看了几十本书,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中国通史》,还有《孙中山》。

周:在你被关的这5个月中,你过去的一些想法是否有所改变?监狱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既会让人思考、反省,又会令人走向反面。有很多人的天性是比较善良的,但被关后,他会变得很狠,如那些“二进宫”“三进宫”的人,而一些人会有很大的反省,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修正,甚至改变了性情。

孙:我没有。我很从容,也很镇定,它来源于信

念和信仰,我也犹豫过,反省过,我做错了没有?最后否定了,我没做错。在里面时,我不相信会开庭审判我,这出乎我的意外,因为我没有做错,如果真要审判,就像阳春时节下暴风雨一样,不合时宜。因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十六大也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国家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的春天,在这个时候抓我,就好像春天下冰雹,不合时宜。我相信我没有做错。现在审判我的结局,我也看到了,就是审判我的也受到全社会的审判,乃至全世界的审判。我很从容,很镇定,在里边我看了很多书,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好像一晃就过去了。在监狱的时候,说判我10年,最少也得6年,我真的没往心里去。不管生与死,你就面对吧。

周:在监狱里你对你的企业未来发展有什么思考?

孙:公安局长找我谈话,说大午集团1300多人,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当时给我很震惊的感觉,真弄垮了你又怎么样?后来知道影响不大,县长、副县长、书记他们一去公司,知道集团没受多大伤害,都很奇怪,连检察长也说,要是别的企业早就垮了,何况还抓了你的两个弟弟和财务处长。所以我不担心。

周:在监狱里,你对农村金融、农村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思考?

孙:农村的金融现在处在一种真空状态或一种半真空状态,农村没有金融可言,也就没有管理可言,没有金融,也就是没有流通。现在农村借贷都是违法,借款超过150户,就能立案。显然,现在的金融制度过度垄断,是倒退了,很不适合农村的发展。在监狱的时候,新华社的黄全权采访过我,说抓我进来的罪名是“非法集资”,这我不同意。首先要问一句,对我们这样的农村私营企业,有“合法”集资渠道吗?我们分析过,正常的渠道我们确实走不通,风险也太大,比如说,我们的1千亩葡萄园,市县都立了项,也给批了600万元贷款额度,但是,办了三年,就是办不下来,用了上万块钱公关,就是到不了位,后来一些知道底细的市领导给我点透了,这件事不可能办下来,因为必须要有10%—15%的回扣,我不是坚决不给,但得有个适量,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就贷不到款,我不敢这么做,而且做这些事非得我自己出面,可我又做不来。眼下只有两类企业能贷出款,一是领导树立的

样板工程；另一类就是“用钱借贷”、“送礼回扣”，所以有的企业拿出甚至50%的回扣去贷款。这类贷款一旦贷出来，还可能再还吗？中央应当看到为什么下面贷款损失这么大，无法追究。根子在管理体制。因为有部门垄断，就不可能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现在既后悔，又不后悔。后悔就是太自信、太自负，以为抠对了法律字眼。不后悔就是我干了一件正事，我没贪、没占，没有挪用一分钱。

周：在一个很集中的时间阶段里，你较频繁地到大学去演讲、发文章，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和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相识，并把你的观念推到公众面前的？

孙：五六年以前，我与农业部、农协会联系，希望建一个农村培训基地，由我出钱，不让国家出钱，这样中国农协会搞了一个全国科教兴村培训基地。这样，每期都有部长、司长、专家学者来讲课，我就用车接来，给他们讲课费，我就做了8期，这就打下了基础了。这不，去年又在我这儿开了“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这么一来就认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他们就觉得我讲的是实践的，殊途同归，这样就有了共同语言。

茅于軾的“孙大午做了件违法的好事”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周：你对“非法”两字是不是感到深受伤害？

孙：以前认为是非法的、有伤害的，但现在我认为没有伤害的。因为大家理解我这样做的事。尤其是茅于軾说“孙大午做了件违法的好事”。但有时我也想，这非法与合法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些问题也没有理顺，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从法律上就没有理顺，一是从程序上没有理顺，二是从法理上没有说清楚。从程序上没有理顺，比如说，这种违法行为是不是与银行有关，就由银行来管，我们是不是可以和银行打行政官司。银行来查、来罚款，说你违规了，人民银行是个金融监

管部门。如果认为我们没有违规，我们完全有诉讼权利。好像从法律程序上银行并没有给我处罚，马上就进入刑事诉讼。而这种情况不仅在金融部门，在其他部门都有这种现状存在。比如在土地、工商都有这种现象。事实上他们完全随时可以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你。如果他们不愿与你打行政官司，比如偷税，即使你从来没有偷税，他们也可以把你抓起来，这样行政诉讼就没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我想今后是不是先从行政诉讼开始，然后发现了什么重大问题再递交到刑事上去，即先解决民事和经济问题，给企业一个较平等的申辩机会。

第二个问题（民间借贷）从法理上没有界定清楚，就是说，借一户是合法，借10户是合法的，借100户就是违法了。比如我的企业有4000多人，和我孙大午沾亲的，比如借孙二午的钱是合法的，那么借二午的亲戚家的钱，比如他岳母的钱，由二午去借，那是不是就违法了？这就说不清楚了，就是，你不能认为和董事长沾亲的，就是合法的，不沾亲的就是违法的，这些问题也说不清楚。那么我想，这个借款只要是熟人和朋友，你能借出来，他也愿意借给你，只要能真正地确实表达，那么就符合民法，是自愿的。可是现在说符合民法，但又不符合金融法，不符合刑法，所以说在法理上也有问题的。

周：在开庭时你放声大哭，当时是一种什么感觉？



孙大午在他兴建的公园里的孙中山塑像前

孙：很复杂，说不出来，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起诉我的人、审判我的人都表示能理解我，肯定我的为人和企业，这些钱（集资）我也没往自己身上花一分，可是我又要接受审判，我自己觉得无罪，公诉人也说孙大午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为人正派，但是不能不接受法律的审判，我自己百感交集，觉得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我又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深化改革，要完善市场经济，一种不合时宜，就像春天下冰雹一样的不合时宜。

周：你想没想到你被关押后各界有这么多人支持你、声援你？

孙：当时在里面我还不知道，后来出来我知道这些学者公众，包括我周围的乡亲们能对我那么好，我没想到。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周围的乡亲和学者们给了我这么多的支持、肯定和同情。我真的很感动（孙低头良久）。我出来后觉得自己要努力工作，回报社会和这些有良知的人。

其实我也做过和官员沟通这方面的努力

周：据说你并不是如一些媒体讲的那样一直没有和政府职能部门沟通，其实你也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孙：是的，我也做着这方面的努力，只是我个人性格使然，加之我从事的农牧业利润又非常低，又是政府支持的行业，赚钱又较少，我在和外面交往时，仅限吃顿饭什么的，基本没有给什么人送过礼。我也想和他们搞好关系，可是现在这些机构也多，涉及的面也大，我就没有和这些官员及时沟通关系，这个责任在我。

周：经过这次事件之后，你将如何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你认为，政府和企业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现状又是如何？

孙：我想像，当然是理想化的，比方说和银行的关系，应当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关系，你帮我贷款，我能还你本息，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至于政府部门，真正要实现政府官员就是人民公仆，政府就是为人民和企业服务的。当然是我们所盼望的。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

但就我个人和企业来讲，在这方面往后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社会一直在发展，逐渐我们之间

的关系会越来越融洽的。政府也在思考，企业也在思考，我相信社会会走向进步的。

周：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人一直在讲你是一个敢于向潜规则挑战的企业家，但这会影响你企业的发展，有人讲好的企业家应该像水一样因势利导，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孙：说企业家就像水一样的，我不大理解，因为水是没有骨头的，而人是有骨气、有追求的。随波逐流当然好了，我没有傻到用鸡蛋去碰石头，也没有挑战潜规则，我只是想有尊严地去发展，性格使然。至于判我有罪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为了企业的发展，为了我有正常的工作环境，一切就等历史去说吧。

周：你出事时抄走的东西都是些什么？现在有没有返回给你，若没有，你将怎么办？

孙：有我的笔记本电脑，里面有我的资料、手稿和多年的读书笔记，还有各种各样的合同，还有300多万的现金，也没有手续，领导最近让我写过一些报告，他们答应研究。那些钱我认为是小事，可那些手稿和合同对我确实很重要，因为那中间有我多年的心血。

周：最近问题富豪屡屡出现，当然这些人的自身原因自不待说，请你讲讲社会应该对企业家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外部环境，使他们逃离“创业原罪”？

孙：我觉得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家的保护，因为企业家的原罪大都是市场经济的原罪。我们虽然搞的是市场经济，但在转轨期，往往又是审批型机制，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基本上来源于此，就是说对于职能部门你不润滑他就不动。第二，如果是单位违法或犯罪，不应该把企业一把手抓起来，比如说刘晓庆，关押了400多天，到最后连个被告都不是，既然是单位犯罪，就应该单位派代表去应诉，这样可能公平一些，也可能减少职能部门犯错误的机会，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企业和企业家不受无辜的损失和伤害。

周：请描述一下大午城的未来？

孙：我讲的大午城是一个和谐的概念，在这里肯定有穷有富，但是这个差别只体现在生产资料上，而不是体现在生活资料上，在尊严上是人人平等的，生活质量上不能有太多的差异，人与人之间是种祥和的关系。（责任编辑 徐庆全）

甲申再祭

● 章立凡

夏历甲申新春又近。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1644)年春三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队伍杀入北京,结束了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创立的大明王朝,自己坐了龙庭,改国号“大顺”。农民起义的“学生”夺了“老师”的帝祚,算是封建社会的一条“历史周期律”。

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上认为天子圣明而官吏昏暗,李自成《登极诏》中评价崇祯皇帝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炆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崇祯登基后忧心国事,宵衣旰食,落了个“辛辛苦苦十七年,一朝吊死煤山前”的结局,原因就在于体制不行,培养出来的尽是亡国之臣,他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只好跟着当亡国之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属于“家族所有制”,“王臣”只是这个家族的奴仆,受命管理疆土人民,管得不好,“大家长”是有权撤换惩处的。但奴仆也有本事合伙欺骗皇上,盘根错节,尾大不掉,崇祯就是吃了这帮家奴的大亏。

王朝末世,天下纷纷,农民起义成为鼎革的动力,但真正能坐定天下的,毕竟只有一家一姓。可惜“大顺”大不顺,李自成登极,并未汲取前朝之鉴,迅速腐败。不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氏走上覆亡之路,中原成为大清天下。

综观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兴替,莫不与农民问题有关。顾炎武曾经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一个王朝的灭亡,首先从道义上的灭亡开始,道义灭亡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肯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而最终罹受覆舟灭顶之灾的,则是统治者自身。

辛亥革命后皇冠落地,由封建走向共和,政治体制已变,何以国民党最终还是丢失了大陆呢?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有四:

一、国民党以党治国,党国不分,政党与政权不分,实行的是“权力集团所有制”。与封建社会的“家天下”不同,党内的各级权力阶层(不包括普通党员)是集体的君主,对于“天下”人人有份,权力共同维护,利益大家分享。实质上是封建“会党政治”,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整饬吏治比一家一姓的君主制更加困难。一旦发生普遍的腐败,党的上层无力回天,蒋经国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失败,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二、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孙中山的“省长民选”主张,蒋介石根本没有实施过。他长期以“训政”名义,搞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宪政,镇压舆论监督,推行特务政治。“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只是一句空话。民主不存,共和安在?如此政权,焉能不长。

三、背弃诺言,忽视农民。农民的利益诉求,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敢忽视的。“平均地权”的承诺,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革命成功之后,这一诺言未予实践,原因在于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之一是大地主。共产党之战胜国民党,正在于满足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渴望。国民党50年代初才接受失败教训,在台湾以赎买方式实施土改,但也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四、抗战胜利,腐败加速。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想消灭了共产党再抵御日本侵略。但外患太急,未及消灭中共就发生“西安事变”,被迫中止“安内”方略。抗战胜利,“攘外”结束,共产党已发展壮大,消灭不掉了,使他终生引为恨事。而国民党的大小官吏,在大后方“茹素”八年,一旦回到原先的“失地”,无不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鲸吞公私财产,搞得民不堪命,财政崩溃。故国民党亡国,表面上败于军事,根本上亡于腐败。

腐败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习惯于将国家名器视为战利品,因为在他们眼里,天下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选出来的。

封建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是以求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不少国民党官员,忘记了中山陵前

“天下为公”的垂训,以为本党先烈流血牺牲换得政权,加上“老子抗战八年整”的功劳,就有资格予取予求,尽情攫取胜利后的红利,也是一种扩大了帝王思想。

自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后,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皆有连载,各解放区还印了单行本。毛泽东同志同年在延安的两次讲演中特别谈及此文,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

弹指之间,又过去了六十年。对于一个用“三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政权而言,“胜利时的骄傲”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是避免了。但能否彻底摆脱“周期律”,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老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深思。

历史巨轮前,难为行路客。三百六十年中的匆匆过客们,尚飨。

2004年1月12日 风雨读书楼

(责任编辑 吴 思)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历史转折的前奏》在“文革”十年内乱中,1975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作者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富有激情的文笔叙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许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斯大林》本书由苏联新闻社出版社1989年出版,作者曾任苏联国防部军事研究所所长。在洋洋上百万字、1470页的巨著里,作者以详实的史料,勾画出一个革命者转化为独裁者的历史,考察了这个人的带血痕的时代。这是一个谎言、残暴、冷酷、梦想、巨大的悲剧和巨大的成就交织在一起的时代。书中充满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这一切记录都源于扎实可靠的原始档案。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从皇帝官僚到土匪和小民,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利害考量,发展出独特的生存策略。本书以明清和民国历史为本,剖析了各阶层的获利模式和反抗策略,揭示出买命和卖命的逻辑,挖出了各种规则背后的终极规则。行文生动平易,读来让人后悔:我怎么没看透呢?

《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下两册)本书是一本史料汇编,作者的阵容极其强大:从毛泽东、董必武到张国焘、陈公博,从张闻天到李德生和“林办”的秘书,中共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风云变幻,听亲历者娓娓道来,分量和实感自是不同。书中还穿插了一些考证,例如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率等等。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历史转折的前奏	程中原 夏杏珍	38.0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4.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3.80	4.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斯大林(上中下册)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78.00	7.00
动荡岁月秘闻	温乐群等	72.00	8.00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66-1978)	杨胜群 田松年	27.00	4.00
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下)	李 剑	49.80	6.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5.00
断桅扬帆——蒙冤25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4.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 秀	12.50	3.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4.00
改革风云中的万里	张广友	20.00	4.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凌志军	25.00	4.00
25年——1978—2002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4.00
我向百姓说实话	李昌平	20.00	4.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影剧之王田汉——			
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	张耀杰	25.00	4.00
戏剧大师曹禺——			
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	张耀杰	20.00	4.00
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	林 希	25.00	4.00
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	张 帆	25.00	4.00
中国人物年鉴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	158.00	6.00
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戎向东	29.80	4.00
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论点	张国华	28.00	4.00

以史为鉴 继续清除封建专制传统

● 陆亨俊

在 2003 年 11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学习会上,学习的内容是 15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考察。海外舆论对中国领导人集体学习世界历史觉得很有新意,特别是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不但在 19 世纪鸦片战争后在世界上落后了,而且在 15 世纪以后就已经开始落后了。对于这个说法,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观点。这里谈谈我在学习中的一些体会。

—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光辉的过去。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宋朝(公元 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一幅《清明上河图》写不尽 12 世纪初宋都汴京的繁华景象。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在科技方面,中国的拱桥、建筑物用的托架、航海用的指南针、船舰的踏水轮、使用火药、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技术,以及炼钢炉和水力纺织机,“都在宋出现。自此以后,中国再无如此杰出表现”。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写道:“11 世纪后期,中国的(华北)已经拥有巨大的炼铁工业,每年生产约 12.5 万吨……这个生产数字比 7 个世纪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要多得多。”到 15 世纪初,中国的国力还是相当强盛的。1420 年时,明朝海军的记录,当时拥有 1350 艘战舰,其中包括 400 艘大型战舰和 250 艘远航舰。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可是在这以后,中国的历史就出现了停滞和曲折。从客观上来说,是两次异族入侵的大破坏。一次是 1127 年(靖康二年),金兵攻陷汴京(开封),大肆破坏抢掠,富庶繁华的情景都烟消云

散。临撤退时还俘虏了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两个皇帝,以及皇妃、皇室成员、大臣和各种工匠一万四千多人,分七批押送北上(徽宗死于黑龙江)。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野蛮施虐于文明的恶行。再加上多年的战争,宋朝的文明只能衰落缩小到东南去(临安(杭州))了。

第二次是蒙古统治者的入侵。蒙古统治者的野蛮和残暴是人们很难想象的。铁骑所到之处玉石俱焚。在入侵印度攻陷德里后,屠杀居民近十万人,并掠夺大量战利品;攻陷花刺子模首都乌尔健赤时,全城抢掠后夷为废墟播种燕麦;特别是 1258 年攻陷巴格达,在城内抢掠七天,居民被杀的达数十万人,当时巴格达是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个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阿拉伯古城遭到彻底破坏,无数的艺术珍品被捣毁,许多华丽建筑被焚烧。这些资料都引自《世界通史》,周一良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蒙古统治者攻入金国的中都(今北京)后也大肆烧杀。金国灭亡了北宋以后,就在今天北京西客站边的莲花池附近建城(即金中都)和皇宫(会城门是一个城门)。由于金兵从南方掳了大批工匠,金皇宫完全仿照宋朝汴京的皇宫,十分豪华、壮丽,蒙古统治者一来全部烧光(后来蒙古也在此建都,那就在金中都的西北另建)。在全国范围内受到的大破坏那就无法计算了。

经历了这两次浩劫,中华文明的元气大伤,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其政策就趋于内向和保守。

二

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为黑暗时代。一方面是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教会神权之中,另一方面,战

祸不断,从1099年到1254年,先后发动了八次“十字军东征”,打了一个半世纪的仗,接着又是英国和法国的“百年战争”(从1337到1453年),简直打得昏天黑地。再加上频繁发生的饥荒和瘟疫、黑热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

可是就在15世纪之初开始,欧洲出现了新的转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影响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都在欧洲发生了。欧洲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

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又说:“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文艺复兴时代所表现的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人们通常称为“人文主义”。其特征是歌颂世俗而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喻。肯定“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宗教改革实质上是人性的回归,也是人性从神学的禁锢中的一次解放。

《中国科技史》作者英国的李约瑟说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形成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成套”的事件,四件事情前后发生彼此关联。这确实是“有识者之言”。这样,欧洲的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走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在《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一文中说:“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主义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教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于是,在经济上,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古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们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在这同时,欧洲在思想领域里也出现了一场伟大的飞跃。17世纪以后,英法等国出现了一批“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继承文艺复兴的传统,为近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英国的约

翰·洛克(1632—1704)在《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中论证了私有财产的充分自由和不可侵犯性,认为这是人类天赋的权利,国家的产生和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1755)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滥用职权。卢梭(1712—1778)在《民约论》等著作中认为,“人生而平等的,为了维护自由平等,人们需要某种大家都遵守的‘社会契约’”。他还提出“主权在民”的学说,主张立法权属于人民。

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下,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各种社会思潮空前繁荣,人民为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斗争不但在欧洲各国兴起,而且波及新大陆。1776年美国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在《独立宣言》中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把“自由、平等、博爱”视为人类的理想目标。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在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同时,《共产党宣言》又郑重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欧洲在大步前进,它把曾经领先世界的北非和亚洲的文明古国都甩在后面。中国从此明显地掉队了。

三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与欧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记录。

著名学者顾准写道:“我国的春秋时代,始于公元前722年,终于前481年,计242年,截头去尾那200年正好是公元前7、6世纪”,“雅典民主全盛时代的那两个世纪,恰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可是在这一时期以后,“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书同文,车同轨”,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体制。总体上来说,对当时的社会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但是也有不少副作用。一百年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文化上的专制打下基础。中国历史上从此再也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了。

第二次背道而驰的是在15世纪以后。从英

国的《大宪章》、“光荣革命”到各国资产阶级的兴起,都是限制和监督国王和政府的权力的。三权分立、人民选举成为历史潮流。而中国却进一步集权,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什么都要管,什么也都可以管。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谈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时写道:“最大的特色乃极度的中央集权……在世界历史中并无这样的例子”,而且“其影响所及,至今未衰”。为了维护其集权体制,单有纪律还不够,还依靠恐怖政治,建立特务组织。在欧洲人面向海洋、发展商业的时候,朱元璋却宣布海禁与抑商。告示全国军民不许泛海,甚至规定商人不许穿绸纱。明朝第三个皇帝成祖朱棣放松一些,第五个皇帝宣宗又回到了保守。到末代皇帝朱由检刚愎自用,大权独揽,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七个宰相,众叛亲离,最后只有一个太监陪他吊死在煤山(北京景山)。

明朝的集权专制可说是集大成了。可是到了清朝更变本加厉。几天之内,“留发不留头”,专横之极。明王朝的子弟有的被封王后派驻外地,如燕王在燕京,宁王在江西等,结果,有的就在地起兵造反。清朝改了这个制度,子弟封王也只能在北京,连自己的亲属也不敢相信。所以京城里就多了一大批王府,更集中了。更厉害的是“文字狱”。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文字狱不断,不但作者获罪,而且出资者、刻版者、印刷者、销售者以及读者都受罚,或处死、或流放、或发配为奴。有的一案可株连几百人。文化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这种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性已完全被扭曲。高官也自称“奴才”,朝里朝外都是一批大大小小的奴才,到处都是叩头跪拜,“万岁英明”。说实在的,那时有人还以能做奴才为荣,有更多人还做不了奴才呢。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天赋人权”,或“人人生而平等”,那不但是“对牛弹琴”,而且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就地正法。

当时欧洲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正是一片兴盛,人才辈出。可以列举出从哥白尼到牛顿、瓦特;从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到歌德、席勒,普希金、托尔斯泰,还有贝多芬、肖邦、斯特劳斯等等一大串巨匠的名字。中国有谁?我们也

有过唐诗、宋词、元曲、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辉煌一时,可是明清以后有什么?只有一部《红楼梦》!甚至原来中国的科技成就也“变了味”。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必不可少的仪器,可是中国在郑和下西洋以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最主要的用途是看风水,盖房修坟。火药在《水浒》里就有轰天雷凌振,用来做土炮(那时是北宋)。但是以后也没有多大长进。明末袁崇焕用大炮打伤努尔哈齐(不久他就死了)的是通过澳门进口的葡萄牙的“红衣大炮”,国产的已经不行了。火药主要用于做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爆竹。造纸和印刷更糟,许多书不让印,印得最多的是看看今天是否是黄道吉日还是不宜出行的“老皇历”。

好了,别说了,太令人泄气了,我们难道没有好的吗?清朝不是还有“康乾盛世”吗?乾隆爷还有“十大武功”呢!《剑桥中国晚清史》说,中国在18世纪经历了三件历史性的大事:一是版图扩大了一倍;二是人口增加了一倍;三是欧洲人的到来。与明朝相比,东北一大片划进来了,那里是满族的老家当然归清廷,蒙古(包括外蒙和内蒙)、新疆、西藏,以及川西、青海一部分也进入了大清帝国的版图,还有黑龙江以北的60万平方公里和新疆西北的一片(后来都被沙俄强占去了)也属中国。当然,中国版图扩大、多民族融合,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清朝的拓疆有的与康熙有关,有些与乾隆有关。所谓“十大武功”主要是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侵缅甸、侵安南(越南)、侵廓尔喀(即尼泊尔,先后两次);对内所谓平大小金川(凉山彝族起义)两次,定回疆(天山南麓的穆斯林),特别是两次平准噶尔(天山北麓),大开杀戒。据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说,乾隆十九年,清兵发动了“屠杀性的大剿杀”,“准噶尔”族人口直接间接被杀者40余万,占全数十分之七,其他十分之三尽逃入俄境”。真厉害!这些欺侮弱小国家和民族的行径今天再不能那么自豪了吧?吕振羽说:“清廷不断对外侵略的结果,一方面,不只直接消耗兵力,且消耗国库,增加人民负担,反而扩大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些都是“伟大功勋”掩盖下的血淋淋的事实。

事实上,到了乾隆年间,表面上还是“盛

世”，实际上已是外强中干、腐朽不堪。1793年，英国派特使来华谈扩大贸易等问题，受到冷遇。使团中有人评论说，这是一个“如此反对进步、反对科学、反对事业精神”的国家。

四

指出中国从15世纪后已开始落后了，这与原来说的从19世纪鸦片战争后因为列强侵略中国才落后有什么区别吗？有的，有很重要的区别。

现在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中国是怎么被打败的？过去常说是英国的“炮利船坚”，清兵虽然勇敢，但指挥不当。这确是重要原因，但是深入一步想一想：当时清兵80万，英兵8000人，可中国却输得这么惨，最后还割地赔款。前几年有的历史学家就指出，在战争开始前胜败已经很清楚了。因为这是一场先进的、向上的资本主义和落后的、停滞的封建专制主义之间的一场战争；是科学技术和愚昧迷信、是知己知彼和妄自尊大之间的一场战争。双方的差距不单是武器和兵法，差距是一个时代！

近一二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寻求中国的富强之道。“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提出了“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的口号，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道，德赛两位先生把西洋人从黑暗中救出来；“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可是在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独裁统治下，这场启蒙运动受到严重的挫折。30年代为民主事业献身的杨杏佛先生曾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争取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但是长期以来，严重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专制主义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民主与科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03年3月号的《炎黄春秋》刊登的《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文章尖锐地指出，由于我党“反对封

建主义的任务没有完成”，导致“文革”十年封建主义复辟”。早在1980年6月，李维汉指出：“我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这是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大暴露。”他还说，他曾向邓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这一课，并由他来补”。小平同志在当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明确地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

20多年过去了，李维汉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这些话，我们今天读来仍是多么亲切和深刻啊。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小平同志不是一般的提封建主义而是用“封建专制传统”，很值得我们深刻领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有共同处（主要是生产关系），也有不同处。欧洲的封建社会是分散割据的、各自为政的。意大利是1861年统一的，德国是1871年才统一的。迄今也不过1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就统一了，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大一统”专制集权可说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欧洲从16世纪中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出现到19世纪现代国家的形成，其中还反反复复，共经历了300多年。而我国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算起，到建国不过30年，到现在也不到一个世纪，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三忠于”那一套也不是偶然的。这实际上反映封建专制主义在我国还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的。这种封建专制传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民主与监督，就必然是个人崇拜和腐败的温床。

岁月悠悠，历史昭昭。从15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经历的兴衰荣辱，留给我们许多自豪，也留下太多的反思，更给我们留下痛苦的自我批判。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我们将怎样面对这个世界呢？《尚书》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我们要顺乎民意，迎头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忆 赫 洵 同 志

● 刘导生

赫洵原名赫智莹（1912—1983），生于吉林省，是我在北平师大附中的同学，建国后曾任吉林省科委主任。他虽然没有显赫的地位，不为人所知，但在1983年为李大钊同志移墓时，报上见过他的大名。因为他在1932年参加中共并担任“革命互济会”的秘书，1933年为李大钊同志送葬时写过大钊同志的墓碑。1983年中共中央决定为大钊同志移葬并举行隆重的移葬仪式，邓小平同志为李大钊同志题写了长篇纪念碑文，并将赫洵所题写的墓碑出土展出，设立李大钊同志烈士纪念馆。这时经检查发现赫洵患有白血病，回吉林后不久即逝世。

1931年赫洵考取师大附中高中文科二年级插班生，我们正好同班，彼此一见如故。至此，开始了我们同志式的来往。他参加党所领导的赤色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经常为被捕和遇难的同志及其家属做营救和救济工作，我以共青团的身份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虽然两个组织不允许发生横向关系，但由于经常相处，尤其是他有时和他的妻子何怡萍在我姑母刘静君家借住，我们同住在一起，自然就有了更多的深入了解。

1933年春，革命互济会被国民党破坏，其领导人被捕。这时，赫洵向我提出，能否到外地找个地方避避风。于是我托山东曲阜师范的教员陶次汝同志在曲阜找了空房三间，他住了大约一个月左右才回北平。后来，赫洵需要筹措生活费而先回了东北，他的妻子在北平待产。

1933年夏北平的学校放暑假，此时何怡萍已生一男孩，赫洵要我送何回哈尔滨夫妇团聚。当时因北平世界语联盟的负责人 Salik6 世界语

名字）被捕叛变，我是北大世界语联盟的负责人，随时有被捕的危险，要及早躲避。正好借送何怡萍回哈尔滨的机会，我们扮做姐弟关系同行，以免引起日寇注意。这时东北三省已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两年，满清的末代皇帝溥仪为“满洲国”的皇帝，此时正逢日本天皇的弟弟“执府御”巡视满洲，警戒十分严密。一路上被搜身多次，我亲身受到日本警察凶狠对待，真正体验了亡国奴的滋味。总算平安的到达哈尔滨和赫洵相见。

返平后，我和赫洵仍经常保持联系。为了避免敌人信检，大多用新文字书写。新文字即汉语拼音，30年代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党员，为了对在远东工作的华工进行文化教育，消灭文盲，又不至忘掉民族传统，为他们创造的拼音文字。

1935年“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之后不久，我几次写信劝赫快来北平。他错误地认为满洲更需要革命，要求我替他找党的关系。

我当时正好担任北平民先队部秘书长，每周都和黄敬同志见面，他当时代表中共市委领导“民先”，我写材料报告赫的情况请他报告北方局，以便转告中共满洲省委找他接关系，但没有办成。1938年4月12日赫即遭日本宪兵逮捕，这时他正在哈尔滨东亚学院教书。

赫的被捕经过，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和青年电车工人李永昌常来往。赫认为此人反对日寇侵略中国，有爱国思想，将李作为他的工作对象。在李被调往外地时，赫还给他路费、大衣之类，并送站告别。后李永昌暴露被捕，并将赫供出。1938年4月12日赫正在家中吃午饭，突然有人自称来查电表，闯进室内检查，赫被宪兵捕去。先关押



刘导生(左)与赫洵 1932 年摄于北平)

在南岗一个暗无寸光的地下室里,审讯人员均为日本人,刑讯逼供,用电刑最为痛苦,不能忍受时满地打滚,身上破皮多处。第二次再用电刑审讯时,先揭破处干痂,更是疼痛难忍,以致晕死过去,不得已只好承认在北平时参加过共产党,有抗日行动。之后,赫被转送道里法院,第四天强行判决监禁 15 年。

转送法院后,允许家属探视,何怡萍拖着三个孩子进入监牢,不知花了多少贿赂才允许几分钟接见。这时何告诉丈夫唯一一件事,就是赫被捕是由于李永昌叛变,出卖了赫洵。当然,这个情节也早为赫所料。

判刑后不久,即将赫转送到吉林监狱服刑。何怡萍闻讯后,为了营救赫洵,将家搬到吉林,为便于探视,不时送点吃的和日常用品。

赫洵在狱中,虽然被判了 15 年徒刑,想来想去,把牢底坐穿的勇气是可贵的;但早日出狱多为革命做些工作,更是他渴望的。因而他千方百计地争取后者——越狱。首先,他认识了狱中的杂役于树功。于曾是北平的学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朱瑞(解放战争时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的炮兵司令)同学。由于于常提着消毒水到狱中检查卫生,赫和他混的很熟,通过他又和狱中青年医生赵公民(原名赵绍先,建国后曾任吉林省卫

生厅副厅长)认识,发现赵有抗日救国思想,逐渐取得互相信任,成为知交。

赵公民晋升为监狱中医官,又是新婚,家属也住在吉林,何怡萍常和她来往(不时送些礼品),成为朋友。何看时机成熟,就和赫策划逃跑计划,在狱中必须经过赵的决策和计谋;逃出监牢后如何隐蔽及筹款逃回北平,这一步步筹

划细致工作,都需要何的精心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只欠东风。这就要看赵公民如何和赫共同扮演这一幕险剧了。

赫洵在狱中为脱逃做准备,首先注意改正因带脚镣而一步一歪的走路姿势,免得出狱后被敌人发现;同时抓紧对赵公民医生的教育工作,两个人的抗日爱国思想溶为一体之后,便共同策划如何逃出监狱。

1939 年秋的一天,赵公民伪称赫洵患肺结核,需要到医院拍片子,做最后确认,骗取监狱长批准。当时,让赫换上普通服装由赵陪同前往,因为赵公民有家属在吉林,狱长也比较放心。哪知他们一走出监狱,即按何姐早已准备的方案,由何姐准备好化妆服装、证件、路费及火车票,乘大车先到家乡的高粱地里藏起来,经过一番策划,再分头先后奔向北平。由于他们知道我姑母(名刘静君,曾在香山慈幼院任女子师范部国文教员)家的住址,旧地重游,自然带着惊喜而又恐惧的心情和故人相遇。

姑母不顾全家人的生命危险,坚持掩护赫洵等被日伪通缉的革命同志。这时,派到北平做地下党工作的杨春圃也在姑母家掩护,他听说由东北逃出这两个人,保持高度警惕拒绝见面,要我姑母找赫洵写出详细报告后再作研究。赵公民是医

生，由姑母介绍到大粪场一个老乡那里暂时隐蔽。不久，因为他是由反革命阵营中投向革命，很快被介绍到平西抗日根据地为我八路军服务；对赫经过严格审查，除阅读他的报告外，还进行多次谈话，才转送至平西根据地，参加工作。

这里还需要介绍一下何怡萍的简单经历，何怡萍，吉林人，生于何年不详（大概长赫洵一二岁），据说她的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的顾问，在东北算是望族。何曾与赫洵的哥哥订婚。赫的哥哥患有重病，农村有一种迷信的风俗，男方病重，要及早成婚，才能免除病灾，这叫做“冲喜”，便把何怡萍娶过了门。结果，“冲喜”不但没能救了丈夫，反而促使丈夫早死，何成了寡妇。在这种悲惨的结局下，何坚决离家读书，婆婆不同意，也无能为力。何乃随赫洵同时到京读书，考入北平第一女中，同时参加“革命互济会”，人精明能干。赫称她为何姐，我们和他们相识的同志，也跟着叫她为何姐，“何姐”之名也就成为通称。后来，赫与何二人相爱，结为夫妻。现在看来，这是爱情的自然结合，合理合法。但在当时，以封建的伦理道德看，这是有违人伦的。所以，他们很久不告诉家人，特别是赫的母亲，她大概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后来何姐为了营救赫洵，把婆婆和三个孩子接到吉林安家。这是带有戏剧性的一幕。

赫洵脱逃到北平转到根据地后，何姐带着婆婆及三个孩子于1940年也到达北平。

当时我姑母已带着孩子转入根据地，何姐找到“革命互济会”的老同志王刚（又名王家勋）。王是开业的医生，东北人，热心助人，我们常有来往。王后来也转入平西根据地，曾任聂荣臻同志的保健医生，2003年以97岁高龄逝世。当时何姐由王刚介绍到某医

院任护工，月收入20元。凭这点收入养活五口之家，实在困难。何当时兼任党的地下交通，组织并无补贴，幸亏王刚个人尚能不时小有补助，才得以维持最低生活。何姐不幸于1942年7月被日本宪兵捕去，虽酷刑拷打，仍坚贞不屈，最后以死抗争，以丝袜系在窗上自缢身死，完成了她一生的英雄事业。赫洵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听到这一噩耗，定会痛苦万分，也一定会为有这样英勇不屈的革命伴侣而自豪。

1943年1月，由王刚同志帮助将赫的老太太及三个孩子送回长春。

回忆起赫洵和何姐，使我感到无比沉痛！他们都是我的亲密战友和同志，何姐的壮烈牺牲，更使我感到她可亲可敬。她青年时代的机智勇敢，热情好客的形象，时时浮在我的眼前。同时我联想到我在师大附中高三时的同学郝培壮，我们同在一个团支部。他于1930年的“八一”游行被捕出狱后即被调往东北，在满洲省委做团的工作，不久即被东北军阀张作霖抓去枪杀。七十三年前的这些往事，如今还历历在目。今天我国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由千万人的鲜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那些为祖国独立自由英勇献身的仁人志士！

（刘导生，90岁，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责任编辑 李 晨）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近年合订本

通 告

2003年合订本将于
2004年1月份装订完毕，如
购买合订本，请将书款汇至
我社发行部

1997年合订本：简装 无 精装 56元
1999年合订本：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0年合订本：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1年合订本：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2年合订本：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3年合订本：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以上均免收邮费并挂号邮寄）

再谈项英与皖南事变

● 李维民 王辅一

1941年1月15日,即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尚未与皖南被围、突围人员取得任何联系,对新四军皖南部队伤亡、被俘情况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匆匆发出了一个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认为“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并加以“不服从中央”、“阳奉阴违”、“自寻绝路”等罪名,而且与叛徒张国焘相提并论。从此,项、袁的革命业绩,包括他们对创建和发展新四军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被一笔抹煞。但这个决定并不是最后的决定,因为这个文件的最后一条写道:“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可至今已六十多年,经历了十次党的代表大会,均未讨论议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史学界和新四军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评价项英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根据小平同志指示,中美双方达成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协议后,由我方重新撰写我党我军历史和人物条目。有一天,胡绳同志主持召开讨论编写中的一些问题。姜椿芳、刘尊棋、李琦、廖盖隆等一二十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中央档案馆刚刚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报。李维民在会上提出,这些电报充分证明了当年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全部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请示在项英条目中应当如何表述。当时重新评价项英的条件尚不成熟,富有经验的胡绳同志表态说:“既然是简明百



项英

科全书,字数不能太长,皖南事变的事就不要写了。”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项英的条目中,没有提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1982年,开始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王辅一负责撰写项英条目。对于皖南事变问题如何表述,经过许多同志集体讨论,1984年12月先后经胡绳、余秋里、杨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纠正了当年的片面指责。后来,王辅一根据中央和军委审定的项英条目的基本评价,写出42万字的《项英

传》,1995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13日,经党中央批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吴邦国、曾庆红、张震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评价。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关于如何评价项英和皖南事变的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可是2003年8月在央视一台播出的《新四军》电视剧,继续沿用片面指责项英的错误观点,在北移的时机、路线等问题上,给人以中央三令五申,叶挺每每提出正确主

张,却被项英一一否决的印象,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误导了广大观众。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写此文以正视听。

关于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皖南部队何时北移,如何北移,选择什么路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虽然中央早有新四军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但由于情况瞬息万变,指示也是不断变化的。仅在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的前两个月内,项英就接到过各种不同的指示。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国民党方面,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第二天,即11月10日,毛主席致电叶、项,要叶挺去与顾祝同谈北移问题时,要以要求国民党两个军停止东进,不要进攻皖东,为谈判“第一位问题”。11月21日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同日,毛主席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我早要北移,但是偏要再拖一两个月。”11月24日,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希夷(即叶挺)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但11月30日,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分析:“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开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同日,毛、朱致电叶、项:“你们29日的布置很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12月3日,毛主席打电报问项英:“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12月6日,中央又确定项英先去重庆,然后和周恩来一起于1941年1月15日前到延安参加“七大”。12月14日,中央给叶、项指示:“(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发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

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有,但你们仍需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12月18日中央指示:“项英)、曾山)二人暂勿离开军队。”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12月25日,毛主席发的通报还认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采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然而皖南的形势已日趋严重,由于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区之内,叶挺曾多次去见顾祝同、上官云相,商定了军部北移的路线、时间等问题。但顾祝同忽然改变态度,项英急电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中央接到项英电报后,于12月26日复电项英等,没有回答项英的请示,只是严厉地批评:“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12月29日项英又接指示:“(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项英与叶挺等决定1941年1月4日全部北移,并得到中央的同意,7日在转移途中遭到8万国民党军大规模的进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上述经过说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和决策失误的并不止项英一人,把皖南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项英是不公正的。虽然《新四军》电视剧在一些具体方面试图从正面塑造项英的形象,但在皖南事变这个关键问题以及进军敌后和部队建设等许多重要问题上歪曲和贬低了项英。电视剧还把事变前从未当过项英随从

副官的孙厚忠(真名刘厚总)安排在项英身边,并虚构了项英袒护刘厚总的许多情节,目的是说明项英革命警惕性不高,用人不当,自食其果。事实是,皖南事变前,项英身边根本就没有副官,刘厚总是在副官处第三科管木工班和饲养班的副官,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刘厚总偶然遇到项英一行,才和项英一起行动。刘厚总经不起两个多月艰苦环境的考验,起了图财害命之心,于3月14日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携款潜逃。其结局也不是被电视剧虚构的余秀英打死,而是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报功,遭到冷遇和长期监禁。

项英是一位革命意志非常坚定的革命家,深受指战员尊敬和爱戴。1930年12月底,项英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决定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年1月16日,在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后的第二天,他就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以非凡的革命胆识和勇气,纠正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肃AB团扩大化的错误,提出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尽管遭到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反对,其苏区中央局代理书

(上接69页)渡江,控制了江北沿江的三江营、嘶马、大桥、吴家桥一带,建立了东西40余里、南北20余里的桥头堡,与扬中跳板连成一片,为日后新四军陆续渡江铺设了安全通道。

(四)

为了实现党中央赋予新四军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1939年10月下旬,叶飞率领江抗部队西撤至扬中整训待机。10月底江抗与挺纵合编,组成了新的战斗序列。管文蔚、叶飞任合编后挺纵正副司令员,张藩任参谋长,陈时夫、吉洛(姬鹏飞)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四个团。合编后的挺纵战斗力大大增强,在日后的1940年6月下旬郭村保卫战中,挺纵以两个多团彻底打败了顽敌13个团的进攻,军威大振。

1940年1月2日,挺纵除留一个加强连在扬中坚持外,全部渡江到达江都境内。加上1939年冬陶勇率领新四军4团团部和2营渡江,与挺纵3团组成苏皖支队,至此新四军已有4000多人到了江北。陈毅也在1940年6月下旬第四次到达

记和军委主席职务被撤销,但历史证明项英纠正打AB团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是正确的,是长期被埋没的一大历史功绩。1934年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中央领导人都随主力部队走了,项英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他作为留在苏区的第一把手,和陈毅等同志一起,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项英正直无私,原则性很强。1939年5月,他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扬帆那里了解到蓝藻(即江青)在上海时表现不好,在政治上、生活作风上都有问题。项英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反映,并讲到此人不宜做毛主席的夫人。此时江青已与毛泽东结合,项英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会得罪人,但他直言不讳,这种远见卓识和刚正不阿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 李晨)

江北。1940年7月上旬,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2团、新6团等主力部队,经扬中跳板渡江到达江都吴家桥,与挺纵和苏皖支队会合。在此之前,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已先期渡江。从此在陈毅、粟裕领导下,投入了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管文蔚也同时开始了新的征程。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苏中行政公署主任、苏中区党委常委、苏中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7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11纵队司令员、华中指挥部司令员、苏北军区司令员等职。建国前后,历任苏南区党委副书记、第一副书记,苏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苏南行政公署主任等职。江苏建省后,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

管文蔚1955年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和处理,蒙冤26年,仍丹心向党、矢志不渝,继续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任江苏省委顾问,省长待遇。

(责任编辑 李晨)

管文蔚与新四军东进

● 潘祝平

200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26集《新四军》纪实电视片,展现了当年新四军光辉的战斗历程,使广大收视观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但这部电视片也有不足之处,有一些重要史实失实,其中有的严重失实。

众所周知,1938年6月新四军东进苏南茅山地区后,管文蔚即与陈毅取得联系,随即将创建的3000多人的抗日武装和一大块抗日游击基地,毫无保留地交给党。对新四军在苏南站稳脚跟向东向北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已经光荣载入党史军史史册的重要史实。

然而在这部电视片中,这一重要史实却变得面目全非。变成新四军东进茅山地区后又收编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游击队,其自封的司令名叫古无畏,被收编前曾在新四军先遣支队破坏铁道出轨的日军列车上抢夺物资,被收编后在参加新丰火车站的战斗中不听指挥等等。如果电视片以谐音古无畏替代管文蔚,则不仅严重失实,而且有损管文蔚光辉的历史形象。

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一重要史实的始末真相,现将管文蔚早期投身革命,新四军东进前组织地方抗日武装,新四军东进后的重大贡献等介绍于后。

(一)

管文蔚是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白区领导过学运工运和农运等革命斗争,自1927年10月起,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先后担任丹阳县委书记、江苏省委镇江特派员、武进县委书记、苏常特委巡视员及金坛、无锡县委书记等职,出生入死历尽艰辛。1930年4月8日因内奸告密被捕,坐牢7年多,在敌酷刑下,掩护组织,营救同志,坚持斗争,坚贞不屈。

1937年5月出狱后不久,淞沪“八一三”抗战爆发,接着江南大地相继遭到日寇铁蹄蹂躏。管文蔚当时虽然与党失去联系,但仍牢记共产党员的使命,揭竿而起,先在家乡组织了丹阳地区第一个抗日自卫团——倪山自卫团,动员组织群众保卫家乡。在其影响和推动下,丹北各地抗日自卫团纷纷建立。1938年2月,丹阳抗日自卫总团成立,管文蔚任总团长,很快发展到25000多人,其中武装骨干队伍3000多人。

自卫总团在辖区内,肃清汉奸特务和土匪,并赶走反共扰民不抗日的国民党和其他杂牌武装。打击日寇,破路拆桥,火烧谏壁大桥,断敌交通,袭击日军车队,毁车毙敌。这些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在江南敌后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影响很大。日寇多次对丹北地区疯狂报复扫荡,并重金悬赏捉拿管文蔚。当时远在苏北的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也将管文蔚视为眼中钉,先后悬赏5千元和5万元大洋取管文蔚脑袋。

管文蔚依靠群众牢牢站稳了脚跟。在新四军东进前,不仅已拥有3000多人的抗日武装,还控制了从镇江东乡到武进(常州)北乡方圆数百里的抗日游击基地,人口过百万。在此基地内,既无日寇据点和伪组织,也不存在国民党的党政机构。国民党留下的保甲制已被全部废除,由各乡自卫团长主持政务。管文蔚还重新任命了镇江、丹阳、武进三县县长。这块抗日游击基地,在当时的江南敌后,成了沙漠中的一块绿洲,让人看到了希望。

(二)

1938年4月下旬,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5月19日进入苏南敌后,6月15日在下蜀火车站附近破坏铁道使敌一列车出轨,6月17日在韦岗伏击日军大获全胜。1938年

5月上旬,陈毅率领新四军1支队从皖南东进,先头部队于6月8日在溧水新桥与先遣支队会合;6月13日,陈毅率领后续部队进入茅山地区,在溧阳竹箠与粟裕会合。随后新四军2支队也紧接着东进。

管文蔚获知这些消息后兴奋不已,渴望已久的亲人已近在眼前。于是在1938年6月中旬派人前往茅山附近找新四军,见到了陈毅,带回了陈毅的指示。接着管文蔚写了一封长信派专人送给陈毅,诚心表示要将丹北抗日武装交给党。

陈毅东进后,也在按照陈云的指点,竭力打听管文蔚(误名为祝同)这位当年白区无锡县委书记的下落。现在联系上了,于是在6月下旬即派新四军2团政治处主任肖国生和1营营长段焕竞,带领1营前往丹北与管文蔚接头。管文蔚与党失去联系已7年半,现在党派队伍来找他,如同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感激万分。作为此次接头的“见面礼”,还共同商定攻打新丰火车站,于7月1日深夜发起突袭,歼灭日军40余人,首次协同作战告捷。

1938年7月上旬,陈毅在丹阳延陵附近约见管文蔚,交给管文蔚巩固丹北发展江北的任务。7月下旬陈毅派新四军1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到丹北,授予管文蔚部丹阳抗日游击纵队番号,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管文蔚为纵队司令。

1938年9月,刘炎带领郭猛、张震东等20多名军政骨干,再次到丹北帮助整编队伍,将丹阳

抗日游击纵队整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管文蔚任纵队司令员,张震东任参谋长,郭猛任政治部主任,将原来的3个大队扩编为4个支队(相当于团)。为了摆脱国民党的限制,便于向东向北发展,挺纵对外不用新四军番号,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

接着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1支队又先后派魏天禄、贺敏学、龙树林、陈时夫、吉洛(姬鹏飞)、惠浴宇、刘文学等资深军政干部到挺纵工作,加强了党对挺纵的领导。1938年10月成立挺纵党委,陈时夫任书记、管文蔚任副书记(经党中央批准1938年8月恢复了党籍)。

经过整训建党和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挺纵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

(三)

1938年10月初,陈毅首次到丹北,与管文蔚商讨北进的作战方案。为了实现党中央“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东进的任务已交给叶飞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北进的任务由管文蔚的挺纵承担。管文蔚提出的北进作战方案是,拿下长江中的第二大岛——扬中岛,与早先被挺纵2支队攻占的新老洲岛一起,作为部队北进渡江的跳板,并在江北建立桥头堡。这一作战方案与陈毅的意图不谋而合。

为实现北进的作战方案,管文蔚于1938年

10月6日率领挺纵一部,攻占了扬中县城三茅镇、老郎街、八字桥等城镇。因敌情有变,为避免损失,3天后陈毅急令挺纵暂时主动撤出扬中岛。不久陈毅再次来到丹北与管文蔚会晤,重新商定了北进的作战方案。经过充分准备,1939年4月初,管文蔚令挺纵1、2支队第二次攻打扬中,打下了扬中县城及其他集镇,全歼顽敌贾长富团,控制了全岛,从此牢牢守住了这块江中跳板。管文蔚同时派出3、4支队及1支队一部分头(下转67页)



1938年陈毅(左)与管文蔚在丹阳

宋亦英的诗书画

● 江鲲池

北京出版的《中国妇女名人录》、《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中国作家辞典》、《当代国画辞典》、《中国专家人才库》,合肥出版的《安徽当代美术家人名、作品图录》、《安徽美术五十年》、《安徽省妇女儿童数据库》等辞书中,均载有《宋亦英》条目。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香港有关方面邀请大陆一百位诗词家赴港观光的名单上,宋亦英的名字也赫然在目。

一个人的名字在这样多的辞书中出现,受到人们如此瞩目和尊敬,这还是少有的。

—

宋亦英为何许人也。

清代诗人赵翼有两句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本文介绍的宋亦英,正是一位新时代的才人。

宋亦英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上个世纪40年代在白色恐怖时期的上海参加共产党。从此她把毕生精力与才华献给革命事业。宋亦英今年85岁了,她两耳全聋,两眼几近失明,双腿瘫痪,只能靠轮椅行动。但她仍孜孜不倦,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风云,以她手中的笔来写激昂的诗篇,寄托对国家对党的深情热爱。因此,她被人们广为传誉,赞扬她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诗书画三绝的当代才人。

宋亦英祖籍安徽歙县,1919年出生于芜湖一个破落盐商家庭。父亲虽是商人,但有相当的文化修养。母亲刘素更是一位博通经史、雅擅诗词颇有才华的女性。宋亦英在这样一个书香味很浓的环境中长大,尤其是在母亲吟哦声中领会到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境界,从小就学会作诗。11岁时她根据老师的命题《日暮蝉声》写了第一首

诗:“日暮槐荫处,蝉鸣不住声。随风问别院,饮露自身清。”不久,她又写了一首《中秋夜月》,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明月如银,觉夜凉凉如水;桂风轻拂,掩额发而生香。”情景交融,天衣无缝,令她的老师赞叹不已。可她当年才是一个十多岁娇羞垂髫的小姑娘,才华就如此出众了。

1934年,15岁的宋亦英考取北平艺术科职业学校。次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壮怀激烈的革命斗争场面,极大地震撼了宋亦英的心灵,使从幼年就崇拜秋瑾的她,更加激发了爱国情怀,立下报效国家的志愿。1936年秋,她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北平艺职以后,又南下考入苏州美专深造,1942年于苏州研究生班毕业,此时她在绘画上已很有些根底了。

“八一三”事变前夕,宋亦英趁暑假来到上海,不料次日就因日寇战火致使交通中断,与家庭失去联系,只得暂时客居上海。在这段时间里,她目睹沦陷后的上海人民身受外敌入侵的痛苦,写诗表达此时的心情:“烽烟遍地疮痍满,鼙鼓声中血流多”;“安危天下谁曾问,风雨楼头窃自忧”。她年轻的心为自己和国家泣血了,急切于寻找报国救亡之路。

就是这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宋亦英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尤其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介绍她看了不少党内的进步书刊,使她更坚定了追求真理的决心。1944年,她的同乡石原皋受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的委托,到上海为根据地采购物资,结识了宋亦英。他向宋亦英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根据地的许多情况,尤其是向她介绍了毛泽东和毛泽东写的诗词,更激起她对毛泽东这位伟人的由衷敬佩。特别是喜读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之后,更是惊羨不已。她曾写了一首《心降》,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铁板铜琶唱大江,即论诗亦足心降。”又盛赞《沁园春·雪》是“磅礴情文,枵权肝肺,浑洒天然不用雕。”宋亦英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盏耀眼的明灯,更加明确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她一心向往加入毛泽东的革命队伍。

1945年7月,经吴文瑞、洪琪介绍,宋亦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担任交通联络工作。她的家成为皖南游击区党组织与华东局联系的上海秘密联络点之一。

日本投降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国共两党“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在国统区残酷迫害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特务横行,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工人纷纷示威抗议,宋亦英因是地下党员,不好公开暴露身份。但她用笔杆战斗,连续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许多杂文诗歌,如《诗人节感言》、《为无声的中国而歌》和古风《断指路》等,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进步刊物、抓壮丁、迫害进步人士等种种暴行。她还在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上发表新诗《哭泣李公朴先生》,诗中写道:“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谁个不爱国?你们,一个个都枪毙?!”

1948年1月的一天,宋亦英到石原皋住处汇报工作,正说着,一群宪兵突然到石的住处搜查,石原皋被捕,宋亦英也被押到宪兵司令部。由于她事先早有准备,已将有关秘密文件统统烧掉了,所以特务到她的住处搜查时,一点证据也没有,而审问她时,宋亦英更是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无懈可击,国民党不得不将她放了。但时隔不久,敌人又要来抓她,看来她在上海无法工作了,经皖南游击区党委同意,她立即转入皖南游击区工作,这是1948年春天的事。

皖南游击区是皖南事变后仍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一个地区,地处国民党心脏(沪、宁、杭)交汇边区,斗争环境恶劣。而来自大城市看似柔弱的宋亦英,却以满腔激情不畏艰险参加游击区的工作。她运用她写诗和绘画的才能,在宣传工作

方面发挥她的特长。她画了一种图文并茂的战士课本,在游击队战士中深受欢迎。后来又调到《黄山报》任美术编辑。不久,皖南地委成立文工队,宋亦英又调任指导员。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她都用她的笔写诗作画,鼓舞群众,使文艺美术为革命工作服务,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凡是在游击队所涉足到的山村,老百姓都知道部队里有一位能书善画的才女。淮海大捷后,解放大军渡江指日可待,消息传到游击区,群情激奋,都极盼全国早日解放,宋亦英在转战行军途中,豪情满怀地写了两首《西江月》。其中一首云:“战局秋风落叶,棋杆黑白兴衰,谁王谁寇早安排,看尔猖狂能再!百万雄师待命,千年枷锁应开,遮天帆橹正南来,助我翻江倒海。”这首诗表达了游击区军民企盼即将到来的胜利的无限豪情,在皖南山区到处传诵。

二

1949年解放后,皖南皖北合并,1952年安徽正式建省。宋亦英被任命为安徽省美术工作室主任,负责安徽省美术工作30多年。宋亦英深知安徽省在美术教育方面比较落后,美术力量也比较薄弱,所以她负责美术工作以后,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大力培养过硬的美术业务人才。争取一切机会抽调美术人员和老艺人,到北京、上海、杭州等著名的美术学院和单位深造。1956年,她调任省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后,仍然尽力为培养业余



人民大会堂的迎客松铁画屏风



宋亦英

美术人才作努力,尤其是在挖掘民间艺术传统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安徽的民间工艺美术具有优秀的传统,如徽派版画、徽州砖雕、徽州木雕、芜湖铁画、界首陶器、阜阳剪纸、民间挑花及特色年画,都流传久远,是丰富的艺术宝藏。但由于多年战乱,解放前民不聊生,这些民间艺术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宋亦英在省委领导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搜集、挖掘和宣传工作,使安徽工艺美术大放异彩。如她在几濒艺绝人亡的芜湖铁画艺人中,发现了艺技高超的储炎庆等老艺人后,立即组织了一批美术力量,结合铁画艺术及其它一批特种工艺美术特点进行培训辅导,使这些老艺人成为振兴安徽工艺美术事业的奠基者。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宋亦英根据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意见,构思设计,由画家、老艺人共同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制作的巨幅“迎客松”铁画屏风,后被誉为国宝。

人民大会堂建成后,如何布置好安徽厅,是安徽省美术水平和成果的综合展现。当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对此非常重视,在宋亦英的建议下,调集来大批特种工艺美术专家从事设计制造工作。其中突出引人注目的是由宋亦英设计的铁画大屏风“迎客松”的设计图案。它以铁画的简练线条与白色衬底的强烈对比,突出大方、庄重、开阔、峭丽的艺术特色,使人感到铁画上松树伸出的松针虬枝,像是伸出热情的巨臂欢迎来自四方的贵宾,既反映了黄山的特色,也体

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曾希圣对这个设计非常满意,欣然挥毫为这幅屏风题写了“迎客松”三个雄健而风雅的大字。该件由著名画家安徽师范大学王石岑教授画松,由老铁画艺人锻制。制成后,“迎客松”屏风挺立于安徽厅进口处,非常显目气派。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都要在“迎客松”前合影。现在这座屏风已被移至中央首长专门接待外宾和摄影的场所,我们还可以经常在荧屏上看到它的英姿。

宋亦英为安徽厅所作的贡献,不仅是设计了“迎客松”铁画屏风,许多工艺品的制作、装潢、陈列等表现手法也都倾注了她大量的心血,体现了她的艺术才华。比如她仿效福建厅的网扣窗帘,利用一种极薄的白色素纱,喷上静电植绒的花卉图案。因为植绒部分不透明,所以悬挂起来的窗帘上花枝竹影,透过月光般素纱的迎风摇曳,仿佛月夜园林,极具诗情画意。

安徽厅施工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到安徽厅观赏。当他看到“迎客松”铁画大屏风时,大为赞赏说:“这个屏风做得太好了!有政治气派,有艺术魅力,是美与力的最佳结合。”当他看到制作十分精美的窗帘后,问这幅窗帘是谁设计的,赖少其(时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告诉总理这是一位叫宋亦英的女同志设计的,他还告诉总理:“宋亦英是一位女才子,诗也写得好。”总理听后很高兴地说:“安徽人杰地灵,是出人才的地方啊!”

三

宋亦英在诗词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世人瞩目,诗词界格外推崇。70年来,她创作的诗词2000余首,已出版有《宋亦英诗词选》、《宋亦英集》、《春草堂吟稿》等专集。她在诗词两者之间,尤以词为学界推重,广受赞誉。曾担任安徽省委第二书记、亦为一位德高望重、诗词学修养高深的长者张恺帆,就称赞宋亦英的填词写得极好。陈毅元帅的诗友、老诗人汪继光也赞她填的词“字字珠玑,堪称当代李清照”。

而更可贵的是宋亦英不仅自幼年就喜欢写诗填词,且篇篇佳作,绝无无病呻吟之篇。她写的诗词立意都与所处时代的大背景相合,给人以强烈的时代感、亲切感和启发、激励人向上的感受。她的诗词的主旋律,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

《宋亦英诗词选》的开篇第一首,为诗人66年前写的一首绝句《述怀》:“不作邯郸梦,何惊万户侯。愿为湛卢剑,斩尽佞人头。”这种睥睨世俗、豪气通天的诗句,表现了她对黑暗旧社会的强烈愤慨和立身处世的态度,如果不看诗后所注写作的年份为1936年,谁能相信这样慷慨激昂、振聩启蒙的诗章,竟出自一个18岁的女学生之手。

后来有人问宋亦英小小的年纪如何写出如此气度不凡的诗来,她的回答是真诚而谦逊的:“我虽然那时年纪不大,但思想比较成熟。主要是当时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自己有爱国忧民的满腔热血,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思想就自然流露于诗词之中了。”

1948年,宋亦英从上海转入皖南游击区工作,艰苦的敌后斗争岁月,使她政治上更加成熟,写出抒发以苦为乐的情操和另一番情趣的战斗诗篇。1949年农历上元,皖南游击队解放了绩溪县大镇上庄村(胡适故里),她参加祝捷大会后,激动地填写了一首《贺新郎》:“夹道扶携争一睹,谊比家人情切。更絮语,终宵难歇。多少血仇多少恨,向亲人未诉声先咽。天下事,匹夫有责。”既反映了游击区军民鱼水的情谊,也表达了自己献身革命的情怀。这“匹夫有责”是宋亦英长期恪守的革命信念,常使她诗兴勃发,落笔成章,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录。她常说:“我不是为写诗而写诗。我所写的诗词都是与我所走过的革命道路紧密相连的。没有党,没有革命,不要说写诗,连我这个人也不一定能存在。”

新中国成立之后,宋亦英负责全省美术工作,曾担任过省美术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和政协常委等社会职务。但她不论工作多纷繁,始终不忘讴歌和记录时代旋律的责任感,用笔写出大量辞新句质的古体诗词。有对大好河山的吟咏,有对党和领袖的歌颂,有感时言事的抒发,有对人民群众创造业绩的赞美……人们从这些旷达、豪放、清新、隽永的字里行间,深切地感受到她对

国家、对党、对人民的无比深厚的赤子之心。1976年1月,一代伟人周恩来逝世,她一腔悲愤,一倾千里,写出了著名的《沁园春·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一词,其中“功在人心不在碑”一句,在社会上广为传诵,成为悼念周总理的绝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宋亦英激情满怀,挥笔写就《喜读三中全会公报》一诗:“猿鹤虫沙劫大悲,廿年事与愿终还。春催北国晴消冻,雪压南枝怒放梅。石烂海枯天有眼,花明柳暗水生辉。微躯莫道黄昏近,愿学春蚕继吐丝。”一股对肃“左”的喜悦之情和自己愿为实践全会所确定的正确路线之志,跃然纸上。

时代前进的步伐,宋亦英都要用诗词记载下来。香港回归时,她连写了《沁园春》、《金缕曲》两首词抒发感慨,热情歌颂香港回归是“重振国威,别开生面,两制同存一国先”的伟大胜利。

有人曾研究过宋亦英的诗词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而宋亦英在她《宋亦英诗词集》的后记中写道:“我的一生备经坎坷曲折,尝尽世味之酸甜苦辣,所以在我的笔下,便自然流露出各种不同情调的作品。”是的,人们在她的诗词中,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宋亦英“我之为我”的豪放派、婉约派兼而有之的艺术风格。

宋亦英的诗词发表在国内外诗词刊物上的不下数千首,香港、澳门、美国旧金山等地都常发表她的作品。她是安徽省诗词学会领导人之一,还是中华诗词学会的理事。

宋亦英在书法上的成就,也不亚于诗词。只是近年她年老体衰,眼力不济,书法作品就不多了。我曾请教诗人、书法家徐味老,对宋亦英书法应作何评价。徐老说:“宋亦英的书法根底很深,有她独特的风格。她的隶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沉重厚实,秀中有刚,同她的诗词书画浑然成一艺术整体,充满书卷气,而无丝毫匠气。凡是看过她书法的人,都默默地感受到极高的艺术享受。”

如今,年高85岁的宋亦英老人还在忙碌着。她克服一般人难以想像的耳聋、双目几近失明、双腿不能站立和诸多老年性疾病所造成的困难,抓紧时间作勇猛的冲刺——整理自1993年以来她写的所有诗词,准备再出版第四本诗词集。我坚信宋亦英老人必定能实现她的愿望!

(责任编辑 方 徨)

明朝李东阳暗斗阉党

● 颜秋桦

—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湖南茶陵县陇阡（今高陇镇陇集村）人。明洪武五年起，茶陵属湖广长沙府，因此人们又称他李长沙或李茶陵。

《茶陵州志·杂志篇》载：东阳四岁能作径尺书，景帝召之，抱膝上，赐果钞。有一次父亲带他进宫考神童。东阳人小足短，跨不过门槛，考官笑道“神童足短”，东阳随口对答“天子门高”。临考时，东阳坐上考席，其父站立旁边，考官出一上联：“子坐父立，礼乎？”东阳立时为对：“嫂溺叔援，权也。”（由《孟子·离娄·淳于》引申）此时景帝正在品尝御膳房的螃蟹，遂以螃蟹为题出一上联：“螃蟹浑身甲冑，”东阳略加思索，则对以“蜘蛛满腹经纶”。景帝喜而赞道：“是儿他日作宰相。”

天顺八年（1464），东阳殿试中进士，至正德七年（1512）止，立朝五十年。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户部、吏部尚书、华盖

殿大学士、内阁首辅（宰相）等，参与内阁机务长达十八年。

李东阳不仅是明朝的著名政治家，同时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当时许多有文学才能的人就环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文学流派，因为他是茶陵人，因此这个文学流派被当时人称为茶陵诗派。

对李东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贬之者谓：“李东阳……宦官刘瑾专权时依附周旋，为时人所非议。”但明清以来时时都有人出面慷慨陈词反对这种“非议”。因此，这个是非非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澄清。现在该是正本清源，分清是非、黑白的时候了。

二

明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朱 樞崩驾，太子朱厚照嗣位当了武宗皇帝。这时的明武宗年仅十五岁，登上皇位无疑是挂个虚名，代他行使职权的是个名叫刘瑾的宦官。

初，刘瑾本在东宫伺候太子朱厚照。由于他善作角抵俳艺之戏，深受太子宠信。而今太

子厚照当了皇帝，自然要将刘瑾之辈的俳艺班子带去伴驾。这俳艺班还有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共八人，时人称之为“八党”或“八虎”。“八党”之首的刘瑾也就由伴随太子玩俳艺转为执掌皇权了。

刘瑾篡了皇权之后目空一切，连内阁的刘健、谢迁、李东阳这三位顾命老臣的忠言都不愿听取，他经常矫旨胡作非为，满朝官员和天下黎庶都恨之入骨。这时司礼掌印太监王岳等人作了铲除“八虎”的密议，不幸泄密，刘瑾乃矫旨将王岳等充发南京，并派其党羽将他们暗害于途中。掌印太监之权也就落到了刘瑾手上。从此，无论大臣奏折、边关文书、官吏任免、圣旨传发等全由刘氏一人独裁（《明史·刘瑾用事》）。

三

阉党称霸，祸国殃民。据《馆阁漫录》载，这时的局势是：“盗贼纵横、边夷猖獗、财匮民穷、怨访交作。内外臣仆方且持禄固宠，乘机作弊……”

李东阳等三位顾命老臣遂“昧死”向上先后呈递了“四不可”、“政事厥失十事”等进谏书,所得到的回音不外是“事待斟酌而行”之类的空话。值此景况,人们深知朝政腐败,积重难返。东阳、刘健、谢迁便于正德元年十月同时上疏乞休。詎料其结果是“健、迁罢,东阳独留”(《怀麓堂全集·狄惠文公李文正公论》)。嗣后,东阳仍多次疏乞致仕,总未得到钦准。于是,他面对“主少国疑,四方多事”(《怀麓堂全集·求退录》)的现状,最后决定采取“潜移默夺”之法,与刘瑾阉党苦心周旋,以图保全善类,阴庇天下(《怀麓堂全集·李东阳列传》)。这便是某些人对李东阳进行“非议”的由来,这些“非议”可归纳为三大论点:

(一) 贪慕爵禄”论

有人抓住“健、迁罢,东阳独留”这一事实,咬定东阳之“独留”是为了“贪慕爵禄”、“留恋相位”。《李东阳列传》称:“健等即日辞位,而东阳独留……其潜移默夺……而气节之士多非之。”这些“气节之士”纷纷给东阳致函、投诗,有的议论,有的讽刺,有的谤讪。

李东阳真的是那“贪慕爵禄”的鄙陋之辈么?

首先从李入朝出仕的年限看,他自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至刘、谢致政的正德元年(1506),立朝计四十三年,已任宰辅八年。一个封建王朝的进士,升到了宰相之职,可算是到顶了,还“贪”什么“爵”(像刘瑾之辈贪图皇位则另当别论)?

再从他的主动申请退位致仕看,东阳早在孝宗弘治七年(四十八岁)就已擢升为礼部右侍郎,专管内阁诰敕。次年便主动“疏辞内阁之命”。此后,从弘治十四年(五十五岁)起,先后上疏乞休达二十余次。至正德七年(六十六岁)才批准“致政家居”。足见李东阳对此“相位”并无留恋之心。但又有人说李东阳对官爵地位自是满足,他“独留”的目的是贪图厚禄。

那就再来看看他的利禄观念如何?正德二年八月,皇上敕“李东阳加俸禄一级”;同年……李东阳辞加俸”。正德四年,以纂修《孝庙实录》成,加……李东阳正一品俸……(再次)疏辞”(以上均见《明李文正公年谱》)。

正因如此,这位“立朝五十年”的宰相,待到晚年致仕时,论其家业却贫穷到了“萧然四壁,不足当分宜辈一宴会之费”(《明史·献征录》)的程度。据《明史》本传载,李公致政家居后,要靠为人作“诗文书篆”赚钱以弥补生计。一日,夫人送上纸笔让他作书篆,他倦而不愿提笔。夫人道:“今日能不买鱼待客么?”他这才强振精神“欣然命笔,移时而罢”。一个宰辅之家,却要靠作书篆赚钱买鱼待客。其日常便餐如何?有《藜》《诗后稿·西园秋雨》)诗可证:

藜新尚可蒸,藜老亦堪煮。

明年喜强健,拄杖看秋雨。

特别是《献征录》还有如此记述:李东阳立朝五十年,到寿终正寝时无钱治丧,全靠门

人、故吏凑资始得了却丧事。

(二) 委蛇避祸”论

梁储在《贺阁老西涯公七十诗序》中写道:“西涯李公……鞠躬尽瘁,不避艰险。不幸值奸权干政,又能处之以巽,行之以渐。”

李东阳关于外界对其个人功过是非的舆论素来是无所计较的。譬如当他主文柄时,“何、李蹶弛蹉跎,负材谩骂”;“士林一唱百和,谓西涯文章取熟烂,人物取软靡”,甚至还有人公开写诗呵斥道:“相逢亦骂李西涯”(《怀麓堂稿旧序》)。如此等



明彩塑太监像

等,他都是“俯首长叹而已”(见《明史》本传)。但是,对于阉党有害于天下的种种勾当,李从不“委蛇避祸”,而是挺身而出,激烈抨弹。

这,首先是表现在抨击乱政方面。《玉堂丛话》载:正德元年,吏部尚书焦芳潜通阉党,刘瑾遂将焦拉入内阁用事,并矫旨让他兼管吏部政务,企图上下配合“表里为奸”。对此,李东阳坚决反对,毫不含糊。他以“此二事实难兼摄……吏部所拟升调…今以自拟之,而自可否之邪?”等理由先后驳斥刘、焦,最后迫使焦芳“乃辞部事”。《辅世编》载:正德二年,刘瑾专权,常带领“年尚幼,好逸乐”的武宗驾着宫苑御舟游猎嬉戏,国祸民殃概不顾及。李遂上疏道:“今岁自端阳后,金鼓火炮,声彻都邑……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惧不敢谏。不知祖宗分职,设官朝廷,糜禄养士,将焉用之……”

其次是表现在体恤民情方面,当李东阳发现“贪官污吏,肆虐为奸,民为穷困,嗟叹交作”时,犹能慷慨陈词,为民请命。正德六年二月,皇上诏令在宫廷附近大搞豹房(皇帝之淫乐场所)、寺观建设。一时间,“京城内外,工役浩繁”,人山人海,大兴土木。人力钱财何来?不外是“州邑坐派无遗,民财剥削殆尽”。于是,东阳又向武宗进谏指出:“自古及今,并无禁中创造寺观事例……而财用之费耗,军民之困苦又不足言……俯垂鉴纳,将前项工程即赐停止,其于不急之务,大加减节,以正国体,以慰生民。”正德

七年四月,李又向上启疏:“去冬以来,京师地震有声。霸州及山、陕、福建、云南等处,相继地震。窃闻天人相应,理所当然……即今帑藏空虚,军民穷困,流移不已,盗贼肆行。江西、四川累岁用兵。山东、河南、南北直隶,所至残破,戕害将领、荼毒生灵,侵害京畿。自创业靖难以来,未尝有此……尤望渊衷朗悟”(以上见《馆阁漫录》)。

李东阳诸如此类为民请命的奏疏不胜枚举,世人夸赞他是:上抨乱政于京畿,下援黎民于水火。

正因如此,李东阳便成了刘瑾之辈的眼中钉。他们表面上对其改容起敬,内心里却异常切齿。“八党”们曾多次图谋加害于他。一是夺职降俸,如正德三年,瑾摘《会典》小误,夺廷和与大学士李东阳等俸二级;次年《孝宗实录》成,参与编纂者照例都应加升俸禄,可是刘乃唆使其党羽援引去年《会典》故事,下诏“以刘健等修《会典》糜费,皆夺升职,东阳亦坐降俸”(以上见《明史》本传)。再就是以“文字狱”治罪。据《馆阁漫录》载:《通鉴纂要》成,刘瑾“乃令人摘《通鉴纂要》小疵为东阳等罪,而除誊录官数人名……”后因武宗“有旨勿问”始息事。可见李东阳在阉党专权的境遇中,不但没有“委蛇避祸”,相反,他为了使“天下亦阴受其庇”倒还惹祸伤身了。

(三)阿谀承顺“论

正德三年“八虎”党羽马永成等为了显赫宗室,炫耀门庭,掀起了一股为祖先造大坟、搞盛祭的妖风,并请东阳为之撰

写祭文。同时,刘瑾又想利用宗教蛊惑人心,便在京都朝阳门外创立了祀奉道教的玄真观,也请东阳为他撰写歌功颂德的碑文……凡此种种,明知是些为阉党涂脂抹粉的耻辱事,但东阳还是给他们办了。于是时人更加“多非之”。他们认为这是李东阳向阉党阿谀献媚,甚至是与之同流合污的表现。御史张芹竟向皇上奏劾东阳“阿谀承顺”,侍郎罗玘还致函要与业师西涯公绝交,并“削门生籍”。对此,笔者颇有不同看法:

(1)据《馆阁漫录》载:“(正德元年)请诛瑾等疏,实东阳秉笔……中人皆以为事不由之。故与健等同日具疏求去。”就此,足以说明在刘、谢致仕之前,李东阳早已“秉笔”上疏请求除掉刘瑾等八虎。后因“事不由之”,他又与刘、谢同时具疏乞休。试想,李东阳若是那“阿谀承顺”甚至与阉党同流合污之徒,就必然会与刘瑾意气相投,全力支持“八虎”为非作歹,殃民害国,为何还要秉笔上疏“请诛瑾”?可见他与刘瑾之辈不是同流合污而是生死对头。

(2)有人又说李东阳既然是阉党的对头,阉党们请他撰写那带褒扬性的文字为何不横眉冷对地顶住?常言道:“事非经过不知难。”清礼部侍郎沈德潜对此作了客观的分析:“健、迂诸大臣相次斥逐,东阳之势益孤。计一人之力,欲除君侧而不得,即欲行己志而不能。于是随事隐忍,随事匡维,宁晦其心迹,而不敢标矫矫子之名”(见《怀麓堂全集·李东阳论》)。可见当时李的处境是何等的艰

难。因此他只好将“心迹”隐晦起来,做到对待阉党“外与和而内与辩,阳为调剂而阴护正人”(《怀麓堂旧稿序》)。我们今天只要联系彼时彼事的实际,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对李东阳那遭人“非议”之举就不难理解了。

(3《明李文正公年谱序》称“(文正公)独以一身周旋……而保全善类,诛锄大慝……好议论者,不谅其心,不求其本末,转以其迁延隐忍用为讥议。”这是一段尊重客观事实的公正论述。

笔者认为那些“不谅其心,不求其本末”而“讥议”者,他们只是看到了事体的表象,殊不知东阳这些被人“讥议”之举,原是一种“潜移默夺”的制敌手段。其中包含着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哲理,也就是说东阳为阉党做了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付出了毁坏一己声誉的代价,却取得了迷惑“八党”视听的收获,为“保全善类”“阴庇天下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大局看,他不是失了而是得了,不是亏了而是赢了,不应讥讽谩骂而应钦佩赞誉。且看:正德三年,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奉谕旨修筑边墙,这本是一件“御外患、免战祸、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由于“刘瑾憾一清不附己”,便给他加了个“筑边糜费”的罪名而下诏狱。经东阳等力救才得释罪。此外,还有早已致仕的刘健、谢迁及刘大夏等,“几经危祸皆赖东阳而解”。(《明史·杨一清传》、《刘瑾用事》)

以上是笔者针对某些人

“非议”李东阳所提出的“三论”而选列的部分辩白性史实。最后还要引用《明史·寿少师西涯李公序》的一段话作结:“少师西涯李公……功业在朝廷,德泽在天下,异而不激,和而不同,清恭端靖之节,五十年如一日。”

四

正德五年,宁夏安化王寔鐸叛乱,不几天就打到了陕西。武宗闻讯心急如焚,却又毫无主张。只得与顾命老臣李东阳研究对策,从而决定启用被贬的右都御史杨一清提督军务,派张永为监军。

李东阳深知杨一清与刘瑾有“筑边糜费”冤案之仇,张永虽是阉党太监,但早已跟刘瑾势不两立。于是他事先与一清密议:结交张永,与之合力同心,先平叛乱,再锄阉党。

根据杨、张筹谋,平定叛乱之后,由张永回朝复命,遂趁机向武宗面奏刘瑾阉党妄图篡位害国的不法“十七事”逆罪。武宗如梦初醒,即时传旨将刘瑾逮捕入狱,并从他家中抄出龙袍、玉玺、行刺的匕首等谋反罪证。

刘瑾篡政害国铁证如山,理当问罪伏诛。岂料皇上的诏令却是“谪居凤阳”。

李东阳闻讯甚急,担心日后刘瑾“脱复用,当奈何?”时张永“谋之东阳”。商议后,旋令科道官员揭发刘瑾罪恶,再由永“易疏”上奏,始将刘瑾“凌迟之,三日梟其首”(以上见《刘瑾用事》)。其阉党余孽也一一查

处,祸根始得尽除。

对此,李绂的《李文正公论》赞道:“东阳……其功尤伟者,起用杨文襄一清,使偕张永平寔鐸,固结永,遂诛瑾……其经营苦心,无异梁公也。”(梁公指唐·狄仁杰)

逆瑾既灭,李东阳潜移默夺、阴庇天下的夙志已酬,则于正德七年五月“三疏乞休”,同年十一月“乞致仕,许之”。他在致仕家居之前,犹赋诗(《明李文正公年谱》)抒感:

平地红尘起白波,
直从青衮到黄河。
几州村落人烟少,
千里川原杀气多。
汉帅屡传师出令,
边兵先试凯旋歌。
白头中夜常忧国,
何日苍生息荷戈。

李东阳待到暮年退休时,还在“中夜”忧国忧民,希望祖国的“苍生”卸戈罢战,求得国泰民安。

五

李东阳之“潜移默夺”,费心良苦,五百年来,褒贬不一。笔者愚蒙,不揣冒昧,将其跟刘瑾阉党斗争的史实作此简录,且试发刍议,聊以引玉。但愿能引出“百家争鸣”,以澄清此“潜移默夺”之是非,使当今世人能认识李东阳的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 李 晨)

对《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一文的补正建议

● 陈耳东

贵刊 2003 年第六期刊载《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以下简称《宋文》),是一篇具有史料价值的好文章。拜读再三,倍感亲切。因为我是当时被抢救出来的一名难童,算是一个亲历者。如今 65 年过去了,我亦年逾古稀,回首当年,感慨不已。一方面,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儿童带来严重灾难;另一方面又深感幸运,庆幸宋美龄、邓颖超等一大批妈妈们创办的战时儿童保育机构,也曾惠及于我。这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经历,永远感激中国母亲们的丰功伟绩和她们为此付出的辛劳。

我是河南驻马店农村的穷孩子。1938 年夏刚 12 岁,突遭日军烽火中原而失学。正如《宋文》所说,这时中国军队正在徐州、郑州一线抗击日军,惨烈异常。在家乡到处都能看到从台儿庄前线撤退下来的大批难民,扶老携幼,其状甚惨。加之日机经常飞临驻马店上空轰炸,一幅战争景象降临人间。众多家庭都为孩子的命运担忧。我哥哥在遂平县城当小学教员,得悉上面招收难童,就把我送到天主教堂难童收容所,然后被集中送到武汉中国临时保育院,等待过江向西南大后方转移,可是因年幼想家又跑了回来。至第二年夏,豫南一带也将沦入日军之手,人心慌慌不可终日。哥哥又把我送到设在漯河的难童收容站,不久即被转送到豫西伏牛山区西峡口镇和丁河店,进入宛西战时慈幼院就读,直至 1944 年上半年初中毕业,从而得以考入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学水利。

这里要指出的是,宛西战时慈幼院大概由河南省地方举办,和宋美龄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机构有没有直接领导关系,不得而知。但是通过《宋文》的记叙介绍,看来宛西战时慈幼院,也是宋美龄领导下抢救战时儿童的一部分,是大环境影响下的必然产物。否则,单由河南省盐务局用税款举办与自己业务毫无关系的宛西战时慈幼院是不可能的。到 1940 年 3 月《宋文》列举了各大后方成立起来的难童教养院近 50

所,其中有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举办的 46 所,有基督教会举办的一所,也有个人举办的一所,可是单单漏掉了省级举办的这一部分,如河南省的宛西战时慈幼院(约五六百人)就没列举其中。显然阙如,美中不足。《宋文》作者能在这方面搜集资料,予以补正,就会更全面些。

抗战中救助难童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宋文》扼要介绍了这项工作的发起和发展过程,重现了那段历史,使我们得知当时一场拯救难童的母亲行动,是由 1938 年初集中在武汉的妇女精英们促成的。这里既有邓颖超等中共女党员的首先倡议,又有各方面女界著名人士的积极参与,也有国民党众多女杰的大力支持,更有宋美龄这样高位第一夫人的亲自领导,还有社会各个层面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抗战初期使近 3 万名难童得救,实是国共合作、团结一致、全民抗战的一曲凯歌。它闪耀着人性之光、理性之光和母爱之光,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和光荣!

为此,特建议《宋文》作者谷鸣先生,在此基础上再作努力,编写一部抗日时期救助难童史,奉献社会,用以对后代子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疑是一桩大有裨益的好事。

本刊启事

一、投寄本刊的稿件,内容必须真实,不可虚构。文内重要引语、数据、资料要注明出处。因内容失实及抄袭他人作品引起纠纷和诉讼,责任由作者承担。

二、本刊不采用的稿件不退稿,请作者留底稿。手写长稿要求退稿者,请注明并附足退稿邮资。珍贵照片不要随稿件寄来,待确定稿件采用后,再寄照片。

三、投寄本刊的稿件半年内未接到采用通知,作者可对稿件自行处理。

四、不能一稿多投。投寄本刊稿件不要再投其它报刊。

以上各项,我刊在过去刊登的约稿启事中已作过说明,现予重申,请作者注意。

本刊编辑部

读 者 来 信 摘 登

我们经常收到读者来信,对我刊给予肯定,指出文章中的问题、差错,提出宝贵意见、建议。这是对《炎黄春秋》的爱护,对我们的鞭策,很有益于我们改进工作。谨向关心我们的读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希望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关注《炎黄春秋》,多提批评、建议,以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不辜负社会各界对我刊的厚爱。下面摘登两封近期读者来信。

——编 者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读者,接触贵刊才一年时间,但我很喜欢这本集思想性、知识性于一体的杂志。

第一次见到《炎黄春秋》,就被它雄浑大气的封面、醒目的标题所吸引。那是2003年第一期,记得上面有一篇描写1975年淮河大水灾的文章,使我感触颇深。我知道遇到了一本满足自己求知欲的好杂志,从此我期期不落,篇篇细读,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贵刊刊出的很多文章使人记忆深刻,不仅让我了解了当时的情况,而且让我的心灵产生震撼,如《八一“黑楼”纪事》、《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烈士留下什么》等,使读者感觉到那一段暗无天日的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多么巨大。许多优秀的人才、人民的功臣含冤辞世,那场浩劫,是我党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

“文革”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读者是有点遥远,但通过这些文章,使我们了解真相,加深了认识。这种历史决不能重演。

贵刊还公正、客观地评价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像和朋友谈心一样可信。2003年刊登的几篇有关“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文章,就非常好。陈虽然犯过重大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他也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几封告别信》,陈独秀阐述了自己在那种条件下的无奈,对共产国际的不满,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自疚等。我从其他刊物上也看到过,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也是革命烈士。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位思想家、革命

家,陈独秀也是伟大的。

通过贵刊我还了解到一些平时不容易了解的人和事,如报人成舍我、王云五、恽逸群等人的事迹。他们对待困难和挫折永不气馁的精神给人以启迪。《吴祖光与曹禺的文坛恩怨》、《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等文,也弥补了我知识的欠缺。

还有一些文章我觉得也挺好,如《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二元思维》、《值得自豪的父亲秦川》、《父亲华岗坐牢21年》等,这些文章不仅让人从另一个角度感受人和事的真实,而且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一股爱意浓浓的亲情。

由于我水平有限,以上所说肯定有不少纰漏,还请编辑老师批评指正。作为一名年轻的读者,我相信贵刊会越办越好。

从我读《炎黄春秋》以来,知识面渐宽,和朋友、同事们在一起闲聊时颇有题材。他们惊呼我“进步真快”。当大家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就纷纷看《炎黄春秋》,谈《炎黄春秋》,我们称之为“读研”(读炎)。我们很快乐,觉得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也能享用这样好的杂志,真好。

刘照铭

编辑先生:

新年伊始,拜读了2004年第一期《炎黄春秋》,基本上是“老老实实地讲真话”,在我们这个国度,讲真话就是特别的善特别的美,我爱读《炎黄春秋》!

不过,赞赏之余,也有一点小小遗憾。不是思想上观点上可以求同存异的问题,而是编印差错,举例如下:

第2页左栏倒6行:“纯”当为“毛”。下文的500元才是“纯收入”。第6页中的“栗”当为“粟”。第10页右栏2行:“鼓”当为“彭”。第23页右栏倒16行:“从”当为“众”。“死亡”后最好加“线”字。第60页右栏倒4行:“多一个”与“”。第63页左栏倒3行:“比20世纪如”,“如”当在“比”之后。据下文看,此半句可删去。第70页左栏倒5行:“名”当为“各”。

希望在《怎么办杂志》中加上“力求完美,精益求精”。以此表达我对《炎黄春秋》的真爱。

顾为泉

官员无小节

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二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齐宣王政绩如何,先不管他,为人好像还算老实。孟夫子要他行仁政,他没有耍花枪,做一套,说一套,把什么关心百姓疾苦、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之类的空话挂在嘴上,而是老老实实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又贪财、又好色,还行个什么仁政!倒是孟老先生与好货、好色之徒谈德政,无异与虎谋皮,让人听了哭笑不得。

在齐宣王的时代,君主是世袭的,老百姓没有选择的余地。好货也罢,好色也罢,摊上了,也只好认了,要么等他死,要么有人弑了他,不然,哪怕搞得昏天黑地,也只好由他去“好”。今天已经没有了国君,大大小小的官员虽然依旧存在,但一不是世袭,而是选任;二不是把百姓当畜生的“牧民”者,而是替百姓办事的公仆了。如果再有一个孟夫子要他好好替百姓办事,他也大言不惭地说:“我做不到,我爱钱,我好色。”定会舆论大哗。一旦闹到这步田地,乌纱帽也就戴不牢了,哪怕有人“我意独怜才”,念他鞍前马后紧跟卖力,无奈“众人皆欲杀”,也只好挥泪斩马谡。明乎此,也就知道为什么今天那些贪财好色的官员大抵不会再把这毛病直白地挂在嘴上了。他们的口头声明,照例是一色冠冕堂皇的。

不挂在嘴上,不等于这些痼疾在我国就断了根。从已经公开的许多案例看,官员的落马,还是离不开好货与好色。不过,等到立案审理,这“二竖”已到了膏之下、肓之上,“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了。

为什么当病初起的时候,不能及时施治呢?缺少有效的监督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官员个人品质的评判失衡,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流行的标准,往往是否拥护中央,是否拥护上级或是否拥护某一个领



导人,称之为“大节”,而好货、好色这些事情在他们眼中则视为“小节”。只要“大节”不错,“小节”有亏,不过批评批评了事。官做得越大,对小节越是放松。倒是普通百姓,因为大节如何无足轻重,小节一有失,便成了天大的问题,往往整得呜呼哀哉。

然而,这实在是颠倒了轻重。好色、好货,前者大约从天性中来,后者多半是后天的熏染。对于普通百姓,确可称之为“小节”。如果不闹到月黑杀人、风高放火,一般不会于国家社稷有什么危害,充其量损及一人一家或数人数家而已。官员就不同了。他们手里握着大小不等的公共权力,本来应当用来为百姓做事的,一好货、一好色,便忘乎所以了,为了得到“所好”,便把公共的权力拿去做了交易,付出的却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笑倾城,再笑倾国,过去都说是红颜祸水,其实,真正倾城倾国的不是女人,而是手握大权而又迷于女色的君王或权臣。普通百姓是小节的事情,在官员就是大节,官越大,权越大,其节越大。

不但好货、好色,于一般百姓可能不算什么大事的其他问题,官员也不可轻忽。比如撒个小谎,在普通人或许可以一笑了之,但对官员就不可轻轻放过——既然你在这个不大的问题上可以说谎,谁能保证你在另外重大的问题上不会说谎呢?把关系于国计民生的大权交到一个人不诚实的人手里,能让人放心吗?

官员无小节。这话可能过于绝对。那么换一个说法:对于官员,一切可能导致滥用公共权力的品质、嗜好、行为、习惯,均非小节。对官员的要求应当近于苛,对百姓则只要守法即可。这不是双重标准,而是保证权力不被滥用的需要。诗曰:

大节从严小节松,拉帮笼络助歪风。

官员二竖膏肓入,便是害民败国虫。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2004年新春联谊会在京举办

2004年1月12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京举办了2004年新春联谊会。研究会领导,在京的顾问、理事、会员和企业界人士等共200多人出席。老领导、老将军李运昌、赵建民、李昌、张铨秀、谢振华、李耀文、朱光、李淑铮、胥光义、王定烈、张致祥、蹇先佛、贾若瑜、陶汉章、马玉槐,知名学者任继愈、宋涛、王尧、刘海年、丁守和、陈连开、郭毅生、王世民等到会。

联谊会由常务副会长张文彬主持,常务副会长曲润海汇报了2003年取得的工作成果和2004年的工作安排。常务副会长王俊义汇报了研究会2003年学术工作的成果和2004年学术活动的安排。常务顾问冯征回顾了研究会成立以来的历程,感谢李瑞环、薄一波等同志对研究会的关心和支持,强调要发扬研究会的好作风。2003年研究会领导班子进行了新老交替,新班子工作有成绩。常务顾问杜导正在讲话中说,《炎黄春秋》杂志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和风格,实事求是写历史,老老实实讲真话,希望大家关心、支持,多加监督,多提意见。而后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联谊会始终充满欢快、喜庆、祥和的气氛。

(王科元)



本刊举行新春组稿座谈会

【本刊讯】2月6日,本刊一年一度的新春组稿座谈会在本社召开。本刊部分顾问、特邀编委和作者80多人应邀与会。

座谈会由本社副社长方实主持。社长杜导正首先对读者、作者和各有关方面表示感谢。他说:《炎黄春秋》创办十三年了,它在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方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从不曾动摇过。在宣传思想上,如百家争鸣,也作了可贵的艰难探索。从总体来看,这个杂志较好地体现了政治上爱国大团结,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宣传上,坚持实事求是、不增美不益恶、以史为鉴的办刊宗旨。所刊发的文章国内外的反映是好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反映更好些。在新的一年里,《炎黄春秋》将继续以往做法,体现五个不变:1. 方针、宗旨不变;2. 内容、结构不变;3. 格调、作风不变;4. 为读者、作者服务不变;5. 领导关系、价格不变。在此基础上,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力争把这个刊物办得更好些,多发好文章,特别希望在反对封建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有所建树。

新春组稿座谈会气氛和谐热烈,与会者踊跃发言,为本刊献计献策。杜润生等14位同志(见封二,按发言先后次序)作了发言。他们肯定了《炎黄春秋》一年来所取得的新成绩,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建议,对我们工作中的不足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参加座谈会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守和 于光远 马沛文 王 才 王景山 王戎笙 王尔强 王强华 王春瑜 方 徨 尹 骐 冯 征 冯 健
冯东书 纪希晨 曲润海 朱厚泽 许人俊 刘志琴 刘爱芝 乔福山 齐明昌 庄建平 李一鑫 李 锐 李升旗
李耐因 李维民 李 乔 李 普 杜润生 杜 莉 杨克现 杨天石 杨兆麟 张天来 张广友 张秀平 张文彬
张思之 张惠卿 余焕椿 吴 象 宋本文 狄 沙 陈大斌 陈四益 陈 敏 何家栋 陆亨俊 谷秀敏 严如平
严寄洲 季 音 郎 渝 官伟勋 钟沛璋 金 凤 范敬宜 林 耀 胡绩伟 高 放 袁 鹰 殷 毅 梁 衡
章立凡 赵淮青 舒元璋 曾彦修 程理嘉 鲁 淳 雷 颐 解力夫 薛德震 薛攀皋 戴 煌

本社徐 孔、杨继绳、吴 思、李 晨、徐庆全、赵友慈、底先华、胡竞成等同志参加了会议。

(徐庆全)